

摘錄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德國刑法

……企圖維持任何組織（繼續黨派之存在）者……

……企圖利用出版物及文件之傳佈以影響羣衆者……

處死刑

原序

這一本書，作者是竭力希望能夠寫得客觀一點的，假如前一代所鼓吹過的那種義俠的風尚，以及公平的處置，還是流行於今日的話，那麼他們的政敵，對於這書中所表現着的無數英雄，也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敬佩。作者從許多事情中，看出了舊有的公平處置的意識，確然並沒有消滅。然而，有許多事情是找不出證據的，所以在本書中牽涉到的人物、地點、與日期，大都已经略加更改，使那些懷着惡意的人，也無從索引書中所牽涉的人名與地址。至於書中的『我』，那是不需要否認就是作者自己。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經過詳細調查而得到的事實。這本書，我預備獻給那些爲了他們的理想而受苦的人。

地
下
火

第一章

是黑夜，臥室的窗戶臨靠着翠甫斯底街，起坐室的窗戶卻面對着可隆納特街。每一扇窗子前，放着一挺機關鎗——到漢堡去的西面的進路都給遮住了。這裏便是我們這個小小世界的中心。

我仰天躺着，可是闔不上眼，望着黝黑的屋頂，看來像是一件不很平常的東西。這是二月廿七日的夜間——一個岑寂而平靜的夜間。電話的鈴聲震響了，我拿起聽筒來，發現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喂，我是與杜。國會在焚燒了。政府用無線電報告，說是共產黨放的火。他們說在那所屋子裏抓到一個人，只穿一條褲子，可是那上面卻有着他的共產黨證。」

「那太荒謬了。」

「當然，這完全是納粹幹的事。除掉他們，誰會去做呢？在大選前六天，誰會去做這種事？」

我簡直聽得到奧杜的興奮的呼吸。

在那些日子中，許多人說，他們知道有些人在電話中交談，會被人家偷聽的。

一月三十日，希特勒開始執政。本來郵政和電訊，憲法上也載明人民有自由之權，可是從一月三十日以後，這些以及其他的權限都給褫奪了。因此我即刻停止了談話，跟他約了一個會見的地方，便把電話掛斷了。我想站起來，可是我又依舊躺了下去。黑夜不再岑寂；飛巡隊的車輛在街上瘋狂地馳騁着。飛巡隊——這是一個不吉利的字眼。在和平的民間，夫妻兒女，以及各式的車輛，往來地喧擾着。孩子們失望地尖叫，老婦們急欲奔逃，接着我聽到警察的鐵跟的皮靴聲，和被警察的短棒擊倒者的呻吟；當我聽着這個大城市的喘息，我總覺得好像聽着那些懸在石子的城垣裏的民衆，彷彿睡在鋼骨水泥的棺槨中，發着悲慘的喘息。

漢堡是一個工業的城市；這裏的船埠和工廠，都吞噬着民衆。這裏曾經產生過，而且仍然在產生着許多最堅苦最誠默的過去和未來的領袖，所以這裏在不斷地發生着製造歷史的事件。漢堡素來是德國勞動運動的策源地，在愛爾培船埠的汽笛和汽鍋的鳴聲中，工人的組合舉行了他們第一次會議。

可是一切都得重行開始了。奧古斯脫·倍倍爾的那個系統早已消滅。人也改變了。貧窮、暴橫、和困苦，佔領了這一代。可是道德的條律，例如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對於人道與正義的推崇，依然是不朽的。

國會還在熊熊地焚燒着。國會是隔離得很遠的。那是在柏林，一所黃金的宮闕。我正躺睡在牀上，處於漢堡的衝要的中心，我的心漸漸地沈重起來了。

從牀上跳起來，穿好了衣服，我就走到外面去。今夜這城市是異樣了：跟平時的晚上不同。我即刻能夠說出來；因為那特徵是明顯的。譬如，在平時的夜間，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可憐的娼妓，蹣跚在僻靜的街道上，用她們的媚笑去勾搭行人，甚至是最愁苦的行人。可是，今夜她們都在一簇簇地談論着，宛如白晝間高貴的婦人；她們漠不關心地把幾個年老的紳士都放過了；她們興奮地說着話，演着手勢；她們甚至不去注意那三個夜間巡邏的警察，在以前，不待他們行近，早已躲到幽暗的門下了。而三個警察，也並不注意那些女人。我注意到他們的制帽，都有皮帶紐在領下的，那也是不吉的朕兆哪。

城北角上起了鎗聲。這本沒有什麼希罕；那是平常的事情。如果沒有，人家反以為有什麼

事情要發生了。但是這鎗聲卻並不停。天空中滿佈着黝黑而密集的雲；在這時候，可隆納特街往常總充塞着懦怯的囁嚅聲和沙沙聲，可是現在卻響着一陣一陣堅實的脚步——起初是疏朗的，漸漸地緊密起來。在灰黃而朦朧的燈光之下，出現着成千的男人和女人。他們並不在低語，却在大聲地說話。來的人愈多，過去的也愈多了。他們是多數不戴帽子的。

我站立着不動，讓他們過去。他們需要些什麼呢？他們爲什麼到這裏來呢？誰在領導他們？有些人瞪着眼在瞧我。

從可隆納特街到琴甫斯底街，無數的人羣在流動着。渺小的娼妓，在這巨大的人潮中淹溺了。扭着皮帶佩着手鎗的警察們，不停地在掃開一條可以行走的路。他們與羣衆對望了一會，便一聲不響地各走自己的道路。臉上都顯出驚懼的樣子。

在新琴甫斯底街的彎角處，我轉過身來走進了四季飯店。在地下室的酒排間旁邊，最近成立了一個夜總會，這是漢堡紳士的夜間集會所。一隊小小的樂隊，正在奏着爵士樂，一些客人便在食桌間跳舞。桌布和食桌抹布，都是紅的，而且裝綴得異常的精緻。

城北角上的鎗聲，仍然不時地傳來。那一夜，好幾百人都從牀上跳了起來，而且誰也沒有諫勸他們地，直衝到街上，往來地奔走着，不顧明天還有一天的工作。現在是黑夜，只見一個黝黯的天空。他們究竟在找尋些什麼呢？

他們走過那些警察的面前。皮鞋踏着鋪道，在夜間越顯得沈重。當他們走到琴甫斯底街，脚步都放慢了，跟着便站住在那裏。他們的每一根神經都緊張着，期待着什麼事情要發生，期待着什麼人去指示他們的工作。夜是漆黑的，微微地在刮着風。

可是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人羣無助地站立着，期待着。

我走進了夜總會。這裏仍然與平時一樣地擠滿着客人；也同樣地有着熱鬧與清靜的角落。我在那裏找到了瑪克斯和漢勃忒；奧杜在電話中約定。他們必須迅速地趕到這裏的。可是奧杜自己卻還沒有來。

這一夜，當我顧視周遭，總覺得有些兒沈重與懦怯的預示。而這種感覺，實在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什麼事情把這些工人們從酣睡中驚醒，使他們從牀上躍起來，而在街上靜靜地無休止地奔波呢？什麼事情把我們驅使着呢？我簡直不明白。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國家，我們文

化，甚至全歐洲的命運在今夜都被決定了。我們領袖們的罪孽實在是慘烈的，他們毫沒有知道今夜的足以毀壞我們神經的舉動；他們酣睡着；他們睡在牀上；他們一點也不知道。當他們從睡夢中醒來，便一起給抓去了。罪孽嗎？那真是悲劇哪！

瑪克斯是一個短小的人，穿着一襲摺皺了的灰色外套；頭髮很凌亂，而行動很急遽的。他是漢堡地方一家古老書鋪的夥計。現在他正俯視着桌布，兢兢地在一塊麵包，研成了碎屑。

漢勃忒開始說話了。他正和瑪克斯相反，是一個身材碩大的人，有着一頭梳得很整齊光亮的頭髮，從前額直刷到後邊去的，樣子很坦白而直爽，看去是一個整潔而有趣的人。也許有人會在你跟前反對他；他們以為信任他是不智的；因為他有些兒「不健全」。可是我倒以為對於任何事情都覺得並不神聖的人，總比那些對於任何事情都覺得神聖的人，來得多明白一點事理。我是喜歡漢勃忒的。他是一個天才的演員，在金錢與天才方面都很浪費的，然而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他被大家公認為國會中一個柏林社會主義議員的親密的朋友，那議員在總統宮堡中參與過多次政治的活動，而從不願意把問題弄得棘手，但他自己，卻拒絕參加一切的政黨。

當我們坐在夜總會裏的時候，周圍的人一定以為他漢勃忒帶了兩個老同學來見識見識他所活動的社團。

『好的，好的！』漢勃忒搓着手說。『現在我們可以看些有趣的事情那種遊戲正在進行了。會不會就是戈林他自己把國會焚燒的呢？假如是他做的，那是聰明的！納粹的聲望要降落了。可是底下的火燄引了起來，他仍然會上去的。』

『上去』是一句隱語，在某些圈子中表示被警察抓去的意思。這時候，並不在傾聽他們說話的瑪克斯，忽然很驚訝地望着：『誰上去了呢？』他這樣問。

於是我們都望着奧杜。他很拙笨地在舞客中擠出一條路；這不是他的中心。我卻高興地看着他，因為我對於他，比對任何人都歡喜。他是我的朋友。他的手是粗糙的。失業了六年，在五個月前纔找到一個汽車公司的工人的職位。假如他穿得好一些，同時更能夠注意一點修飾，那麼在這一羣中，他一定會被大家熟識的，因為他有一付矍矍的臉，一個結實的身體，一雙清澈的大眼睛，一張富有決斷的嘴，以及剛毅的笑，完全是一個康健的人。

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夜。這是以後許多危險的夜間的開始，我們坐在那裏的，一起有四個

人；等到那許多夜間告終以後，我們這四個人中，一個是死了，一個是瘋了，另一個卻成就了偉大的人物。

『我們要作些什麼呢？』瑪克斯問。大家都緘默着。漢勃忒卻把身體稍稍向前傾轉一點，這樣答道：『我們一定要切實知道，各政黨所抱的態度。』

音樂隊奏着爵士樂；客人都去跳舞了；我們卻仍然談着話。在一支樂曲終了的時候，我們聽到琴甫斯底街上傳來的合唱。他們在那邊咆哮着：『麵包！麵包！麵包！』街頭的廣場，被警察梭巡驅逐得非常清淨了。

我們向聖保里走去，在米倫索大家分手了。瑪克斯回家。他把靠街的門闔上了，走上樓梯，推開一扇通到他自己寓所的門——那是一組陳設得非常簡單的房間——從廊裏走到他自己的門口，悄悄地把門推開了，扭亮了電燈。不料在他面前站着兩個人，手裏都有手鎗，而且向他瞄着。這樣，他就給抓去了。

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到了夜間，會往那裏去呢？他們是怎樣度過春宵的是不是約了女性去逛公園？是不是到旁的地方去玩耍？他們會不會去跳舞，或者討論人生方面命運方面的

不道德的問題，以消磨長夜呢？不，那是絕對不會的。年紀在二十至三十中間的年青人，既不會跳舞，又不會討論人生問題，他們對於宇宙間大自然的美，毫不注視，而且也毫無感情。古舊的歐洲的年青人，已經轉向於政治。政治於他們，足以代替大自然，愛美，和宗教了。

我只表示了這樣的主張；卻並沒有述及這種發展之是否良好與有利。其實，時勢所趨，年青人也必然會那樣的。在嚴肅的一九三三年，生活在德國的年青人，不僅失去了精神的家庭，而且他們很知道，假如沒有政治的興趣，將會失去未來的機會。

因此，與杜漢勃忒與我，參加了三種不同的政治集團。漢勃忒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是社會民主黨裏一個重要的組合；他以為他們的意義與影響都是很重要的。與杜到船埠去了。我便進了印屈拉咖啡館，那家咖啡館是在漢堡與亞爾杜那鄰近的弗蘭哈特街上。我們三個人都問着，甚至幾百萬人都在那一夜問着同樣的問題：『我們要作些什麼呢？』

歷史也問着這樣的問題：『那一夜究竟作了些什麼呢？』當時德國的政治情形是很難估量的。國會中最右派的國社黨，被大眾反對了十四年，可是在總統的緊急法令之下，居然與國民黨共同取得了政權。所有其他的政黨，自民主黨，社會黨，以至於共產黨，皆被反對了。當與

登堡在一月三十日任命希特勒爲總理之後，「那個領袖」即刻把國會解散而下令三月五日重行改選。

共產黨和社會黨，他們估計着自己候選人祇及全數的一半，而對於反對希特勒這一點，尙未獲得充分的團結。所以，共產黨在一月三十日舉行過一次大規模的總罷工。而社會民主黨，則恪遵民主的條規，靜候着三月五日國家的裁判。

這種裁判，希特勒是不敢期待的。一九三二年九月的大選，顯示出國社黨已臻全盛時期，而其擁護者的人數卻在漸漸地減少。在魏瑪之前，希特勒至少要想有所舉動，以陷害他的敵人。對於他，這實在是「萬分急需」的事。

這便是國會焚燒的緣故。那夜焚燒以後，希特勒政府便斷定國會的縱火案，純係共產黨主犯，而社會黨同謀的。政府並向全國人民詔告，務須與罪犯隔離。爲左派的重要領袖準備了許多時候的拘票，在那一夜發出了；他們所有的報紙，集會，公告，宣言，都給嚴厲地禁止。到今天我們都可以回憶起來，回憶到國社黨統治下的最高法院，判決共產黨對於國會縱火案簡直全無關係，而社會黨更毫不相涉的時候，對於那一夜用民族道德來詆毀敵黨的那種無所顧

忌的樣子，我們不能不目瞪口呆了。

從一月三十日到三月五日這許多天，好像夢魘般地過去。以前的束縛都被掙脫；以前的評價也給破壞了。社會上不再有朋友，昆弟，和公民；祇有用各種蠻橫而狡黠的手段來劫取政權的國社黨，與站在另一面的我們這一羣——各黨派的同志，以及沒有黨派的人。

我們將做些什麼呢？殺戮嗎？吶喊嗎？逃遁嗎？屈服嗎？我們決不能規避的。我們將做些什麼呢？

五千個共產黨領袖和知識份子都在那一夜給抓去了，因此也許應該吶喊，而德國羣衆也許即刻會響應起來的呼聲，終於是沈寂着。但是共產黨對於誣陷他們爲國會縱火犯的「決斷」提出了很嚴重的抗議。而別的黨派，則還沒有明顯的表示。

我們人民，卻被無援地拋撇在國社黨瘋狂的洪水前；被拋撇在德國廣漠的土地上……

印屈拉咖啡館，在虛默克路彎角的弗蘭哈特街上，周圍都是些相仿的咖啡館。你走上了樓梯，便到一間很大的客廳，屋頂下掛着一個氣球似的陰暗的東西。燈光從那東西中照射出來，把整個屋子照成半明的色彩。桌子上也放着陰暗的燈，背後有一個大象的影子，落在兩尊

用銀紙糊成的破碎的佛像間，前面是一隊沒精打采地奏着樂曲的樂隊。客廳中擠滿了人，尤其在中央跳舞的地方。

印屈拉咖啡館吸引了許多從巴倫斐爾特造紙廠，亞爾杜那的水泥廠，以及從亞爾杜那到漢堡這一帶貧苦的女孩子。輪到四點到十一點的女工，她們一散了工就到這裏來；輪到早晨九點到下午四點的，那麼就來得早些，去的也早些。那些女孩子是勞動過度，臉色蒼白；衣服太短；而過長的腿又是沒有樣子的。她們的眼睛，好像小孩子的眼睛，有着一種可怕的急切的欲求，想吃一頓晚餐，想得快樂，想邂逅一個銀幕上的英雄。終宵不輟地跟她們輪流跳舞的是些聖保里的市民，那是專門到船埠附近一家只賣三毛錢門票的電影院裏去看戲的失業者，年青與年老的龜鴿以及水手和同性。還有一兩張桌子，常被黨人所佔據，他們以為冒險到這裏來休憩，實在是相當勇敢的。

這家咖啡館還以特關樓廂放映舊的默片為號召；進去不需門票，而裏面是幾乎完全黑暗的。這裏是泊埠船隻上的中國廚伙和洗衣工人，以及城內中國工人的常到之所。他們跟工廠裏的年輕白種女子一同坐着，當音樂靜止以後，你可以聽到他們的絮語。

我有幾個熟人也常到這裏來。我穿過一排排的桌子，在黑暗中蹣跚着，看見丑角卓別麟映現在我面前的銀幕上。當我從光流中抬頭，什麼都看不清楚了。有人抓住我的手臂，引我到一個座位上。在黑暗中定睛一看，原來我已坐在約翰與史的中間。他們的關係是妻舅，可是各不相助地都已成爲黨的領袖了。我們握了握手。在前面的銀幕上，在比普通桌布稍大一些的銀幕上，一張卓別麟的舊片搖曳着映過了。我向四周看了看。我們坐在三隻一排的甲板椅子上。後面的一排，一個中國人正在跟一個黃髮碧眼的女子低語着；在前面，都是些桌子，因此我們看不清楚前面幾排上是不是還有人。我們的左邊有一堵黯黑的牆，右邊是一條通路。

史的報告，剛巧結束。我聽到他粗暴的聲音：『凡倫丁斯岡街還是很好的。我們必須等待着。』音樂隊奏着探戈舞曲。到處響起了跳舞者的脚步以及談笑的凌亂的聲音。在一條漢堡最古老的街道，凡倫丁斯岡街上，有着華沙區的共產黨辦公室。這一條街，從前住着漢堡的貴族，可是現在已經變成從漢堡的中心到聖保里陋巷間的一條最主要的動脈。有着美麗的花園的貴族舊邸，早已變作有曬場的出租住家了。從地窖到雕飾的樓面的牆壁，已被擊落，這裏就是共產黨的總部和共產黨報漢堡民衆的編輯辦公室。那份報紙就在地下室中印刷的。而

編輯的辦公室，在阿爾杜那也有一處，因此這份報紙即使在普魯士被禁止發行，也仍然可以在漢堡出版；反之，在漢堡被禁止呢，那可以在普魯士發行。

音樂停止了。但是我們還間歇地聽到一種關關之聲。接着便是一陣喇叭聲，於是一對男女出來跳舞了。

「你把總部收拾好了嗎？」我這樣問。

史遲疑着。「我很不安。所有我們跟柏林間的交通都給破壞了，我們簡直跟他們絕對不能夠接觸。我到這裏來了四點鐘，可是還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我猜想他們，一定有大多數人在柏林給抓住了。可是我不明白。既沒有回音，又沒有命令。這倒可怕呢。」

約翰柔和地笑了笑。「沒有什麼可怕，」他說。「反之，事情已在漸趨複雜了。假若你早已神經失常的話，朋友，那麼看着我們開始了這種不法的工作，你將作些什麼呢？難道爲了政敵要我們那樣做，因此就甘願放棄我們十五年來的主張和工作，甚至放棄我們的政黨嗎？我們必須堅決我們的意志。倘若柏林方面的工作停止了，那麼我們還是要進行別處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須將凡倫丁斯岡街的總部收拾起來。即使這次祇是一個不確的警報，我們也

至少得到了一次上裝預演的機會。」

「收拾起來，需要多少時候呢？」我問，因為我明白那些巨大的屋子中，有着幾百個房間與地窖。

「只要三點鐘。其他的東西，即使給查到了也是不妨事的。而且這工作也並不怎樣難，因為在最近兩天中，我們已把一大批東西放開了。」

「有誰知道你拿走那許多東西嗎？有誰釘住你走嗎？」

「連鬼也沒有一個呢。」約翰笑着答。「整區的人都去觀禮了。在那裏，有着納粹的偵探和警察，以及我們的羣衆。他們都準時地站在各個的崗位上，看着一切看得見的東西。我們就把東西裝在四輛卡車上，當然那些偵探即刻打電話去通知指揮機關了。於是我們又把東西從卡車上卸下，調換了汽車，直駛到耶盧沙芬司機的人，都是我們可以信任的同伴。朋友，這件事情很簡單呢。」

約翰緘默了，當電影映完後，我轉過頭來望着他那年青光亮的臉孔。侍女送來了飲料，我們便惠了賬，下面跳舞的伴侶，正在表現他們最終的節目。那裏咆哮起一陣喝采的聲音。我靠

着椅背，默默地沈思着。

我們坐在聖保里最卑陋的地方，雜着許多失意的人，以及孩子們所歡喜的玩意兒。音樂仍然在奏響着。在琴甫斯底，那些在這裏放縱地跳舞的孩子們的父親，戴着工人便帽，興奮地站在那裏嚷，『麵包！』一個碩大的城市，已經沈沈地睡去了。

音樂不斷地奏着。這時候是清晨三時半。一個中國人走來跟一個侍女說，凡倫丁斯岡街正在搜捕，而警察們已經衝入共產黨的總部了。侍女把這頓消息告訴給幾個在下面跳舞的人，我們就從他那裏得來的。卓別麟影片映完之後，銀幕上一片光亮而空無所有。女孩子們和幾個中國人便在我們後面分手了。

史站了起來。『我想去看看，柏林方面有沒有回音。』約翰聳聳他的肩胛。

我們走出了那扇臨靠虛默克路的大門，離開咖啡館。在衣帽室裏，看見一個矮腳的人，戴着便帽，披着紅色的頸巾，站在那裏。他倚靠在衣帽室的牆上，嘴裏啣着一支沒有燃點的香煙。當我們走過時，他望望我們，舉起一根手指，搭上他的帽簷。

『他是誰啊？』史問。

「不知道，」約翰這樣答道，他們兩個人都望着我。

「我倒知道他；在這裏附近的人，都叫他作「公爵」的，」我說着，便站住了。

他們沒有再追究下去。有一次我回過頭來，看見那個傢伙正在跟蹤着我們。他把雙手插在袋子裏，緩緩地吸着煙。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夜。天氣冷得古怪。虛默克路中國咖啡館裏的人，看去都像死了的樣子。從地下室裏走來許多侍者，他們已經把賬結清，所以領帶都已翻下。許多女人從我們面前經過。這一夜她們都徒廢時光，現在只能回到寂寞的閨中了。

在泰爾路的轉角處，我們站立了一會。不久以前，一個中國人在這裏被人刺死，而兇手卻永遠不會抓到的。約翰和史又在談論了。

「柏林——」史先這樣說。

「我可以完全負責的，」約翰答道。在這樣談論之中，他們正式決定將黨的全部機構變成一種非法的祕密組織。

他們都到中央站去招呼人。半點鐘之後，站上的二十隻電話機，却有十二隻都被佔用了。

電話在不斷地接着。我立在中間的大廳中，四周完全是漆黑的。售票房裏的職員大半都已熟睡了；此刻卻又驚醒過來。兩個警察注意着站上這種急驟的行動。當他們最後決定了要有所表示時，一個戴着藝術家帽子的黃色年青人突然伸出他的腳來。被一個警察發覺之後，這年青人即刻向前逃跑。而兩個警察就在後面追逐着。半點鐘過去了，他們畢竟把他抓住，又送到站上來。他的鼻子在淌着血。

從中央站到皮賽平台霍甫的通訊網，本來是工作得很有秩序的。到四點半，一個中央交易所裏的貧苦女工，說起中央站上的公共電話都被割斷了，電話已經停止。職員們便又去睡覺了。如果他們知道自己也會參加這個偉大英勇的組織的誕生時，不知將如何驚愕呢。所有二十隻電話機，現在都已空着了。可是成百成千的不知名姓的羣衆，卻已準備爲着信仰而犧牲一切可愛的東西，犧牲家庭，犧牲快樂，糧食甚至生命，都已從牀上起來。一切都已準備了許久。十分鐘之後，他們都已離開了各人的家。

到了陰霾的清晨，國社黨大舉搜捕的時候，他們房裏已找不到一個黨的職員了。書記們早已出走，連一點痕跡都不留。他們的妻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經到了什麼地方去。納粹的

特務人員當然更不會知道了，雖然在車站，在飛行場，以及漢堡地方一切的出口，他們都會加以嚴密的把守。黨的工作，由非法區領袖負責；整個的機構仍然在運行着。

如果沒有那一切必需的技術附件時，這麼巨大的一個左翼的黨組織，的確不容易推動的。當然，新的組織，一時也不能夠健全。而且現在，要用無線電播音或由一萬個特別通訊員用信札或電話來傳遞消息，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我猜想，國社黨的首腦也很明白我們的難處，甚至想憑藉這種難處來掣肘我們的工作。國社黨徒知道要破壞德國的左翼，只有一個方法，那是要在左翼非法成立之前，即刻動手，要在他們按部就班地將非法組織正式成立之前，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一夜間把那些領袖們趕走。

毫無疑義地，他們是對的。而且，假若你不僅着眼於共產黨，而更看到在高壓下的社會民主黨，以及被國社黨所吸收的民主黨的遭遇，那就更會覺得是對的。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在那一夜間完全給破壞了，因此書記們都已四散。各人再也不能夠接觸。只有少數的人，預先得了警告；不過以漢堡為中心的華沙區的損失，還不算大。那是因為約翰沒有等待柏林的命令就

動手收拾的；他已把握了國會縱火的意義，以及那一夜恐怖的特徵，不太遲緩地發了一道非法的命令。

在漢堡外國新聞的預先指定的封面標題上（二月廿八日出版的晨報，上午五點鐘就發售的），有着一個奇特的印刷上的錯誤。一個搜集革命文獻的人，如果他能夠得到這一份報紙，一定覺得是異常珍貴的。可是到今天，卻難能找到這一份報紙了，即使有一個居住在德國境內的德國人得到了它，大概也要發生嚴重問題呢。

再說我自己吧。二月廿八日早晨九點鐘，我被房東太太喊醒來，她好像有些嬌嗔似地搖醒了我，告訴我報紙上刊着共產黨縱火焚燒國會的消息。這個計劃是運用得非常巧妙的。六千張印着二月廿七日的拘票，早已在幾星期前準備好了。那些拘票安排了幾星期，好像等待着人家到二月廿七日去犯罪的樣子。果然，國會在二月廿七那天着火了，於是一點鐘之後，有六千個罪犯，在早已準備甚至早已填好的拘票的威力之下，被捕，被侮辱，以至於被暗殺。民衆們不能夠也不會得忘記這一件事情，同時，大家都已預想到從那天以後，歐洲的文化，一定會日趨沒落，而基督教國家的道德與法律，也會逐漸地被撕毀了。

● 聖保里是在埠頭上的，是漢堡一個娛樂的區域。

第二章

在大選前的星期六早晨，我起身得很遲。上一個晚間，我實在太忙了。我的書記來叩的我門，告訴我公爵先生有電話給我，必須要我去聽。於是我起來了。這時候我突然覺得有些兒異樣，就問她爲什麼電話鈴聲不響在房裏而在起坐室裏呢。書記說，電話確實接在起坐室。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回家之後，就安排得將電話鈴響在房裏的，這樣看來，在我熟睡之後，一定有人竄進我的起坐室，而把電線接過的。他們的目的，是要阻斷我夜間的電話。因此我明白我已被人監視起來了。

我就囑咐書記將那電話接到房裏來，把門關了，拾起聽筒。

「喂，你是誰啊？」

「我是公爵。我要跟你講一句話，聽着，我一定要。」

「好的，」我這樣回答他。「星期一或是星期二，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喝咖啡去。」

『不，要去就今天去。』

『朋友，你真饞嘴呢！你還要向人家借錢嗎？』於是，不待他回答，我就接下去說：『那麼準定如此。你就等在亞爾斯底·配徹龍的彎角處，那邊一過四點鐘就有報攤的。早安！』

沒精打采地我把電話掛斷了。我料想我的電話已被監視着，而現在，這裏聖保里區一個有名的大騙子卻在招呼我去。

新聞記者到各階層去採訪新聞的權利，我能要求它這樣地擴大嗎？這倒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在這混亂的時代，用個別接觸與交識的方法去採訪新聞，原是新聞記者的權利——不，那簡直是義務——否則就得不到新聞的。真正的問題是在，那些現行的權威者——便是國社黨的新興的統治者——是不是相信我在政治與罪犯圈中結識朋友只是爲了採訪新聞的緣故。而這問題的答案卻有繫於我的安全，甚至我的生命。祇要他們有些相信我已涉足政治時，我便即刻可以失蹤，而參加到成萬個被拘在牢獄，司令部，反省院以及死刑地窖的人羣中。所以最要緊的是，使他們相信我除了新聞記者的任務之外，絕對沒有其他的使命。這與我的事業，有着很大的關係，而足以叫讀者驚愕的我的遭遇，也可以因此解釋明白了。當我在一

九三三年的夏天，被捕到司令部去的時候，他們就已不相信我了。但到那時爲止，我一直公開地在政府的黨派與非法的黨派中間走動着。可是直到今天，德國政府還不知道我到底是一個純粹的新聞記者呢，還是非法組織中的一個主要的臺柱。

對於一個熟悉國際海口的下層生活，以及充滿着流動居民的成千條陋巷中的黑暗情形的新聞記者，工作的機會實在是很多很多的。以我而論，這種機會更多，因爲幾年以來，我不僅知道他們以及充滿着感情的他們灰色的生活，而且，我把那樣的生活，作爲我自己生活的一部，而且不是一小部。我熟悉船埠上的工人，聖保里的市民，以及愛爾培村中的男女。我曾寫下三部小說，就把他們作爲書中的英雄。我知道他們所想的，他們所說的，以及不說話的時候他們所要表達的意思。

當一九三三年春天恐怖時代開始後，愛爾培與濱海的人民就掀起了一番感情的巨浪。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生活在他們中間。我所需要的，是眼睛和耳朵。還有一個良心！

在漢堡亞爾杜那邊界的芬根路上，有着一座精緻的房屋，陳設着緋色絲絨的飾物，桃花心木的傢具，以及厚重的韓幕。在漢堡更舒適的區域磨倫崗街上，有着一家玻璃天面的照相

館，如果你要拍照，你就可以在他們陸地或海面的佈景前照的。現在，芬根路和磨倫岡街，都爆發着熱烈的舉動。

大選前的星期六，三月五日，我正在磨倫岡街。那家照相館裏的攝影師是一個禿頂的矮小的人，從一八九〇年起就已加入了社會黨。他在堡壘中間，曾被囚禁十二年；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六個月以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他慘苦地死在柏林的聖海威醫院裏，遭受了海特曼路挺進隊兵營中兩整天的酷刑。

這一天我看見他的時候，人家正帶給他十六張不同的照片。「我真不能再做了，」他囁囁着。「天保佑，讓我安靜一下吧！我從星期四下午四點鐘開始的工作，到現在只睡過六小時覺呢。今天下午，有一家四個人，走來拍照，我不能不爲他們送去。昨天中午，一個穿雨衣戴雨帽的人，要我爲他在一隻沈船上拍照，他手裏還要拿着一面德國的戰旗。我又不能不爲他趕好。啊，誰肯做我自己的工作呢？」

我們就讓他獨自囁囁去，因爲在說話的時候，他的雙手還是拿着鉗子與擴大鏡在忙碌着的。我把身子稍微俯下一些，想去看看他在忙些什麼。於是我旁邊的一個人，立刻重重地咳嗽

了一陣嗽，響得我倒退了一兩步。他向我道歉，站在我與桌子的中間，可是從鏡子裏面，我已看清了他用巧計來遮飾的勾當了。我現在知道這個老傢伙正在偽造德國的護照。

照在鏡子裏的我的臉孔上，我想一定暴露着目擊這種違背法紀破壞秩序的事情時的表情。那個人撞到我身上來，用一種使我不能忘掉的粗獷的語調說：『你已從鏡子中窺破我們在這裏玩的把戲了。雖然「玩」也不是一個恰適的字眼。不過老實說，我們——我們也很願意那麼做。』

他們告訴我這個矮小的傢伙是精於偽造護照的，他造得叫人辨不出是假的來，因為他的護照印在與正式護照同樣的紙張上，而那種紙張，是有一個在政府印務局裏做工的社會黨同伴，整網地給他的。

『只要有誰肯幫助我，弄好那一家四個人的照片就好了，』那個偽造護照的傢伙又在囁囁着，但是他畢竟還是一個攝影師，我就禁不住笑了。其實，他所說的一家四個人以及戴雨帽的郵差，也都跟這偽造護照者玩着同樣的把戲；他們都需要着相當的代價。只是，唯一的不同的點是在他們的目的只爲虛榮，而那個矮小的人，冒着生命的鋒鏑，無代價地工作，卻是爲了

他的信仰，雖然他也並不是任何黨派的份子。

他們提醒他明天中午，必須預備好多少張護照。放在那裏的相片，都給謹慎地移過了。我們便走了出來。我在愛斯潑萊納特街爲他們設了一個秘密辦公處；那個一同跟我出來的人，先到芬根路，我就等會兒再去。

在路上，我注意到街道中充滿着奇異的景象。成百的羣衆，從郊外擁塞到城中。有時候擠得連鋪道都給塞住了。每一個星期六下午，城中雖也往往擁塞着這樣多的人羣，可是那種興奮的空氣，熱烈的情緒，總不及今天的厲害。到處是制服，褐色的襯衣，卍字，警察。

在愛斯潑萊納特街的辦公室中，他們從一個很有經驗的英國記者那裏，探聽到社會民主黨的重要份子已到漢堡來舉行秘密會議的消息。我看到那個英國人的興奮的信。在那些日子，每一個新聞記者都是異常興奮的。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正在準備些什麼；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將要發生些什麼。幾天以前，有些英國朋友要求我供給一些新聞給他們。這真像是在火線中的樣子。

爲了他們，也爲了我自己，我想去採訪這次社會民主黨秘密會議的消息。我用最直接的

方法，在公共電話處打了一個電話給溫特立奇漢堡社會民主黨報漢堡聲的編輯。我們約定今晚在蘭心大戲院對面的甘賽商場裏見面。

於是我走到芬根路，上了二樓，在女僕的出入口捺了鈴。一開門，我被引進了起坐室，那是一個陳設着紅絲絨的舊貨傢具的房間。在磨倫街照相館裏見過的那個人，正靜靜地坐在沙發的角裏。他看去很勞頓；彷彿每一個時候都要睡着的樣子。跟我說話的是一個年輕美麗的黃髮碧眼的女人；她說着德國的俚語。她也訴說着工作過度的苦楚。『卡爾和我』她說，『工作得簡直沒有一刻兒停止的。假如有這麼一兩個人來幫助的話，事情要容易得多了。我知道有人——』

『不可能的，』那個人把大半個身子沈沒在沙發中，這樣說着。『到大選過後我們纔可以提出這個話；到那個時候我們怕也不敢再去冒險了。而且，我也並不覺得你是怎樣忙碌啊。』

他數着自己帶來的照片。『十二張，』他說。『你那邊還有八張。一起就有二十張。你能夠趕好嗎？』

『還有屈拉勞帶來的四張怎樣呢？』那個年輕的女人說。

『那一個屈拉勞？』

『就是愛姆斯波且爾區的屈拉勞。他說他是一個連絡社會勞工黨的人。』

坐在沙發裏的那個人，驀然站立了起來。『讓我看看他帶來的照片。』

女人把四張東西授了過去。

『屈拉勞那傢伙要到什麼時候纔回來呢？』

『大約七點鐘。』那女人若有所待地望着我。

我看看我的錶。六點一刻。

那個人又望了望照片，然後說，『假如你肯聽忠告的話，就把這些收拾起來，即刻拿走。千萬不要等到七點。甚至不要等到六點半。這裏還有禍殃呢。』

女人像求恕似地望了一望四周的人。她的臉孔，顯得不很愉快。『卡爾怎樣了呢？』她問。

『也許他工作完畢之後，回到這裏，而被抓去呢？你現在吩咐我，有什麼用？實在你也用不着吩咐什麼的。』

那個人聳聳肩，走進門裏去了。「我不想跟你辯論，當然也不來吩咐你什麼。」
「但是卡爾——」小女人現在哭了起來，臉色完全蒼白，身子也在戰慄着了。

我把她帶了走。那個人把已經完成與沒有完成的護照和相片都藏好了。對着遺放在那裏的工具，他最後又惋惜地看了看。我對那個女人說。「你的卡爾大概已經聽到了他同伴的忠告，我們這裏的朋友或者是錯誤的。今天晚上你不妨再回來，也許你會發現一切都仍安然無恙呢。」

我們離開了那所屋子。在諾勃斯忒他打了一個電話給什麼人。十分鐘之後，有一個佩帶着鋼盔團徽章的工人，站在我們剛纔走出的那所房子對面的一家櫃臺前。他拖住卡爾，警告他。六點五十分，飛巡隊果然到這裏把守起來了。

後來，據共產黨的偵緝組報告，在琴甫斯底國社黨偽造護照的機房裏，有着非常精巧的工具，現在用着的，就是兩部從芬根路運去的機器。我覺得那倒是值得注意的，尤其因為芬根路的屋子，曾被普通警察搜查過，而且裏邊的東西，都被沒收了的緣故。這好像是，普通的警察把偽造護照的工具，移交給國社黨似的。

愛姆斯波且爾區的屈拉勞，現在已被監視着。

國社黨的規矩是這樣的，當他們發現了夥伴中間有什麼叛變的案子，那就訴諸舊式的中世紀式的法庭；於是那叛變者，或者判處死刑，或者宣告無罪。共產黨方面呢，假若發現了有誰作着奸細的時候，就讓他仍然留在黨裏，只是好好的監視着。所以屈拉勞仍然是黨裏的一份子。不過他作着跟社會勞工黨取得連絡的人。這是使我跟那一方面的人也都混熟的暗示。

社會勞工黨是由社會民主黨中左派份子所組成的一個小黨，他們是介乎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在近乎五百個區分部中，吸收了五萬個黨員的樣子。他們在柏林，在勃萊斯勞，在漢堡，在薩克桑尼，算最有力了。我會幾次打電話給一位跟他們頗為熟稔的律師，可是沒有找得到。

四點鐘前，我經過琴甫斯底，走到亞爾斯底·配微龍去，那邊我跟公爵約好了的。亞爾斯底浴着初春的寒冷的陽光。在寒冷而清澈的空氣中，流蕩着一縷腥味，蔚藍的天穹，從海岸直伸到那邊的地平線。是的，我想，我實在是做着一件奇特的事情。我不是爲了生活而寫作，卻是

爲了寫作而生活。甚至我願意把一切都拋開呢。

像每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一樣，亞爾斯底·配微龍早已擠滿了客人。因爲坐着太冷，所以大家擁在裏邊，圍着桌子談笑，後面便是樂隊。有些年老的人，坐在他們坐慣了的座位上，還有一些家屬，一些天真爛漫的女孩子。這地方實在擁擠得很。中間我有很多相識的人。我就向四周看着，找尋着。

有人在招呼我。那是公爵。他變得很快哪！他剛修過指甲，刮過鬍鬚，臉色紅噴噴的；面前是一杯白蘭地，他現在正端相着他的指甲。我看他已經喝了點酒，但是看上去他似乎還能喝得很多。在後面角落裏，漢勃忒招呼着我了。

『這裏怎樣啊？』我問。公爵撇開了正在賞贊的指甲，可是沒有回答。我坐了下來；他望着我，突然輕輕地可是動人地說，『我對於你是有用的。』

『你真的幾歲了？』我問他。

『二十九。你當然是知道的。警察也知道呢。我跟你說老實話。我對那些弟兄們說，「現在是沒有時間去顧及女人，骸炭，以及那一類的東西了。生活應該切實。所以我們不能不做點兒

事業。」

『你是坐過監牢的，』我說。

『當然啦，』他回答道，『爲什麼那樣問我？你知道那爲什麼嗎？我要告訴你，什麼時候你來，你來看我，你知道……』

『是的，那我知道。』

他慢慢地接下去說着。『假如不是像你這樣一個作家，有誰會瞭解我們這種人呢？但是話又要說回來了——我跟弟兄們說過，「弟兄，』我說，「一切都拋開。現在的生活，應該是切實的。」』

『你說現在生活切實了，那怎麼講呢？』

『我告訴你，——那納粹。不，我不想告訴你了。』

『爲什麼又不想了呢？』

『因爲他們是不在乎的，除非——』他把嗓子壓低了下來——『現在已沒有人敢說這是如何腐敗了。』

音樂隊奏着維尼斯華爾滋舞曲。坐在我們鄰桌的一個老婦人，一個接一個地吃着餅。

「你把我拉到這裏來，難道只爲了告訴我這個嗎？」我問他。「你爲什麼不去參加左派政黨呢？」

「我要參加啊。但是他們不要像我這等坐過監牢的人。天曉得，他們不要我說的話，他們一句都不相信。」

「那麼，你爲什麼跟我接近呢？」

「你是瞭解我們這種情形的。我知道你是的，你瞭解我們，同時我們也瞭解你。我要跟你一起攪那玩意兒，你也跟我玩。我知道。所以我跟你接近的。我跟弟兄們說，「弟兄」我說——」

「你們聖保里的一羣人，曉得你跟我接近嗎？多少有些兒冒險呢，是不是會不會他們有人——？」

「不會的，那些弟兄們只以爲我到什麼地方去活動了。內中的情形，他們一點也不會得知道。沒有人跟蹤我的啊。而且，那些弟兄們——你知道他們是怎麼的……」

「但是，我們能夠一起做些什麼呢？」

那個矮胖的傢伙沈默了一會，低下頭去望他自己的腳。於是他又抬頭望着我說：『你可以信任我。』

『好的，』我就立刻那樣說，把我的手伸了出來，橫過桌子。『你現在應該知道我已信任你了。』

他的臉色並沒有改變，可是我知道他感覺些什麼。他放下了我的手，把我警視一下，喝完了一杯白蘭地，蹣動他的椅子，直到撞着我的右側，於是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樣東西，露出一半。那是一支六·三五的連發手鎗。

在那些日子，這樣佩帶着兇器，露出了一長條東西，很容易被人家抓去的。任何時候，街上散開了哨兵線，從頭到腳地檢查行人。公爵嘻開着嘴笑了一笑，又把手鎗藏好，從他背心口袋裏摸出一張卡片。那是有着他姓名和照相的挺進隊的卡片。我細細地察看了一下，確實是真的。纔又還了給他。

『我是挺進隊的隊員，』他靜靜地說，『所以我能夠佩一支鎗。我加入那個隊伍，沒有多久，可是所有的活動，游行，演講，監視，我都參與過了。而且聽他們說，我還會受獎勵呢。請你留出』

一個地址，讓我供給你新聞，或者請你到我那裏來看看我。我是不肯把新聞供給任何人的。可是聖保里的我的弟兄們，會替我探聽一切消息的。」

我遲疑了一下。「這裏左近的琴甫斯底的電話箱，你知道嗎？在那電話簿的二百三十四頁上，請寫一個口令，字要寫得很小，每一個字的第三個字母都要除去，沒有稱謂，也不必具名的。第二天，把你上一天寫的東西擦抹乾淨。那裏也許可以傳遞什麼訊息。不過要萬分的小心，因為電話間的牆壁，好像是透明的呢。朋友，留意你的脚步，祝福你！」

我又跟他握了握手，惠了賬，當時就決定今天到他那裏去找他。於是我上去了……

漢勃忒跟一個黃髮碧眼的女人，坐在一個桌子上。他向我點點頭，我纔走近過去，他介紹給我那個女人，說是他的同事，女演員皮小姐。她看來非常機警，而且很鎮靜。

「剛纔跟你談話的是誰啊？」漢勃忒問我。

他爲什麼這樣問我呢？你若捲入了政治的漩渦，人家一定不會這樣問你的。那女人正在注意着音樂。

「哦，那是一個下層階級的人，在骸炭裏發了一筆財，想做紳士了。」我這樣答。

那女人望了我一眼，又回過頭去。「我相信他是一個政治上的朋友咧，」她輕輕地說。我笑了。突然，漢勃忒也笑了起來，但是有點勉強的。

「我要打個電話去。糟，已經是五點鐘了！」皮小姐驟然激動起來。她向我們致了歉意，就立起了身。等她走了不久，漢勃忒就開始罵我。「你這笨賊，」他這樣罵着。「你應該知道公爵是挺進隊裏的人。她是納粹，她一定以為你跟他交好是太滑稽的。現在，她去打電話給他們，把他監視起來了。」

我即刻站起身，去找公爵，跟他絮語了一陣。他明白了，我纔回到漢勃忒那裏。當我重新坐好，皮小姐回來了；她微笑着。於是瀏覽四周，一看公爵已經不見；她這懊惱是非常明顯的。原來漢勃忒的話，畢竟沒有錯。

「好怪的天氣，是不是？」她說。「好像要下陣雨；那電光——」

她沒有再說下去，我看她的眼睛，表示着驚訝。我就跟着她看去，想不到公爵又出現在這裏，而且正在向我們的桌子走來了。我表示要想站起來迎上去的樣子。皮小姐即刻這樣那樣的問着我，叫我留在座位上答覆她。

公爵遲疑地走近我們的桌子；他的手段，實在是高妙的。「請原諒，」我對皮小姐說。「我叫他帶一點東西，那傢伙現在帶來了。」我張開了手，他給我一樣東西，我在口袋裏搜索一下，授給他一個馬克，於是他又走開了。大家不說一句話。

鄰桌的人，也沒有注意到這一件事。音樂繼續奏着，侍者在桌子中間推擠出他的路來。

「他給你什麼？」皮小姐粗鄙地問我。

「那一個啊？」我裝作驚異的神色。「什麼啊……？」公爵早已去了。皮小姐立起身來，好像要去追他的樣子。我就給她看我那個握緊的拳頭，而且問他，「你猜那裏面有些什麼？」於是她慢慢地攤了開來。她就搶去我手裏的白紙包，把它打開，看着那中間的粉末。

「骸炭，」她囁囁着，我覺得她的語氣中，充滿着失望。她以為那是一定牽涉政治的。「你要這個來做什麼呢？」

「那是爲了一個女朋友，」我嘻笑着。「她要上癮呢。」

「你贊成嗎？」

「好管閒事的女人，」——漢勃忒也嘻笑着——「應該要被攔的。」

這時候，一個年老矮小的，裝着一隻木腳的跛子，從桌子間走着過來了；他好像在找什麼人。皮小姐一看見他，就站了起來，告訴我們，她要去招呼那個『老同事』，便向着他走去。他們就開始談起話來。

『那個傢伙，』漢勃忒輕輕地告訴我，『是納粹祕密警察中一個最厲害的傢伙。他的名字叫梅歐，那個木腳是真的。在漢堡，他並沒有名氣。他是從特列斯屯來的，在那裏，他做了許多破壞的工作。他是極有能力的。他那樣哄騙着皮，是很對的。』

對於那個正在跟皮小姐談話的人，我曾仔細地端相了一下。看他樣子，真像一個殘廢的小丑。

皮小姐回來了，我們三個人又繼續閒談了半點鐘。

後來，就在那天三月四日，我跟漢堡市長彼得生先生約好了的。彼得生是漢堡氏族的一員，在這大城市中，非常有名，而且為大家所愛戴的，在德意志共和國中，他是一個重要的臺柱。當民主黨一度佔有勢力的時候，他是一個重要的委員，甚至做過總統的候選人。現在他被舉為社會民主黨的市長。他的言論與力量，在此危機四伏的時代頗有不小的貢獻，他是德國有

數的人物。

據他自己說，對於當前的政局，並沒有若何不順遂的主張。『自從國會焚燒以後，國社黨對於大眾輿論的脅迫，徒然使他們自己受損害，』他這樣說。『德國人民，現在都能夠自由思想了，假如有人要褫奪他們思想與行動的權限，他們即刻會起來反抗的。』

我就敘述前任巴本內閣總理在勃利孟的演講詞。『那一次演講，他說——我從記憶中搜尋出來——『要復興德國，必須從下層着手，就是要民衆們再信仰上帝，信仰領袖。那個呢，市長先生，』我說，『意思是要下層的民衆，再做他們主子的動物，就是這一句話而已。』

『當然，』彼得生先生沈思着說，『假如在英國，有人說出這種話來，一定會給羣衆拖下講臺的。』

『然而在這裏，在你們民主的進化的德國，聽衆們都沒有把巴本拖下講臺；他們還稱讚他呢。』

我的訪問，到這裏爲止，兩個黨代表走了上來。我仍然留着。彼得生先生說，那一夜柏林事情，他絕對沒有料到。而且，對於挺進隊員在普次登所施的毒辣的鎮壓，以及與登堡總統從

國社黨徒手裏逃到陶勃列滋的萊斯威去的消息，他也沒有聽到的。

他們請他鼓吹一下，爲了挽救民主的厄運，爭取人民的自由和權利。他們向他呼籲，對於一個理想主義的老人，他們提出了這樣的請求。可是他像其餘的朋友們一樣，異常疲累，也像其餘的典型的民主黨人一樣，答覆了他們。他是一個民主黨徒，所以一定要等待大選的結果。假如國社黨勝利了，那麼，爲了他是民主黨徒，也一定會服從多數的。

我很高興地辭出了，我又得到了另一種解我迷惑的言論。彼得生可算是德國的一個最誠懇的政治家。不必鬥爭，他會放棄他以往的主張。

很快地吃了一餐飯，我就到甘賽商場去找奧杜。那位社會勞工黨的律師，我希望他一起跟我吃飯的，却是至今還沒有打到電話。當我碰到奧杜，就覺得他臉色蒼白，眼睛發燒，好像有點寒熱。他訴說着工作如何繁忙，簡直把他頭都攪昏了。我就想到了卡依叟，他是怎樣一個人呢？

我們在放映烏發巨片的劇場休息室裏：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外面等候着幾百個要看下一班電影的觀衆。我不高興讓人家看見我跟奧杜在這裏。奧杜是一個鮮明的政治的人物，

而我是希望永遠『沒有關係』的。所以我們拿了門票，走進戲院，在廊裏來往地踱着。

我覺得卡依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在那些日子，這種問題都足以引起奧杜懷疑的。卡依叟？我記得他是一個矮小的人，看去好像沒有成年，他曾當過共產黨民衆報的印刷幹事，後來在商會裏找到了一個職位。

『卡依叟有什麼壞處呢？』我問。

奧杜聳了聳肩膀。『你知道，擔任監視工作的，和擔任區部領袖的人，有幾個是並不熟識的，就要他們如此才行。他們的任務，是在監視領袖與黨裏的高級人員。而他們中間，就有一個人對於卡依叟有些不好的批評。於是，』奧杜殘酷地笑着，『我向區部領袖提出暗示，作為預防的方策。假如你注意過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和平主義者，或者反法西斯派的份子——』

我想制止他，可是不等我開口，奧杜已經向我表示歉意了。『請你不必激動！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告訴我的，』他大聲地說着。『我知道你不是騎牆派。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一個奸細會把最信任他的人，謀害殘殺的。就是那麼一回事，是不是？』

『只憑一點懷疑，你就把一個老同志像卡依叟的，侮辱得如此，』我靜靜地說。

「我們不能再講客氣，再用感情了。我們在鬥爭！如果我們對於卡依叟的懷疑是對的，那麼他就會危害我們幾百個領袖。他認識得很多。我們不能不懷疑。對於任何人都應該懷疑的。我們應該照着他們的知識程度，和危害力量，懷疑每一個人。」

我離開了奧杜，走進電影院。我確實看着銀幕，可是對於飛快地閃動着的影片，簡直一點沒有感覺。一所碩大的屋子，可以容納幾千個觀眾的，現在已經擠滿了。我時刻地聽到觀眾在譁笑。我便閉上了眼睛。我注意着他們譁笑的時候，即使不是全體，也總有大部分人在笑；決沒有單獨的笑聲。此刻，我是雜在幾千的觀眾中，坐在電影院裏的座位上。這是星期六，三月四日，晚上十點鐘。在一所黑暗的屋子中，映着影片，奏着音樂。當我閉着眼睛，靜靜地坐着的時候，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到明天，我們這國家中，不知還會發生什麼事？外面，幾百處燈光，照耀着這樣幾個大字——

改變一切

亞陶爾夫·希特勒

跟這同樣的標語，揭示在公告處，塗抹在牆壁上，也印刷在滿街散發的幾百萬張傳單中。

明天就可以決定了。而這裏，電影院裏的觀衆，卻正在譁笑着。

我不能再耐了。站了起來，經過座位中的鋪道，離開那屋子。在附近一家咖啡館中，有着電話機。我就招呼那個會想邀請吃飯的律師，他跟社會勞工黨的領袖，非常接近的。豈知那邊的回話是，他已經離開這城市了。

跟溫特立奇約會的時間，還有一點鐘，我就沿着凡倫丁斯岡街和惠爾希姆路，走到甘奇尾泰爾去。黑夜中摸索着這種彎曲骯髒的小巷，實在是相當危險的，可是今夜，四周有點兒神祕。連鬼都沒有。一個咧。陋巷間的房屋，看去彷彿是劫後城市中的殘餘。幾乎沒有一個屋子裏，有着些微的光亮。警察也沒有，幾盞街燈，也像往常一樣，給人家用石子摔破了。

我的脚步發着遲鈍的聲音，我的心感覺得沉重。我知道住在這些陋巷中的人。我知道他們的生活，同時我也覺得自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是貧苦中最貧苦的人，是流氓與無賴。我知道他們感覺些什麼，也知道他們在黑暗的廚房中，昏黃的油燈畔，緊閉的窗戶下，談論着些什麼。

我走到萊登瑪區的一所屋子前，敲着門，毫無阻難地進去了。公爵的蜜披是一個骯髒的

黑洞，但也是他的王國呢。只有他一個人，桌上是一盞燃亮的油燈。爐火還在冒着煙。牆角裏掛着一套挺進隊的褐色的制服，以及那天下午在亞爾斯底·配微龍穿的一套衣裳。

我們握了握手。燈邊放着一支手鎗。公爵埋在一隻破舊的沙發中，頸項裏圍着一條污穢的紅巾；眼睛在發燒着。

『我已經坐了兩年四個月的監牢了，』他說。『我販賣麻醉劑。我也得到了我所需的。』
『我的妻——但是現在，』他突然問我，『這怎麼樣呢？』

『我不很懂得你，一個納粹的國家，對於你又有什麼不同呢？那是一定不會改變你什麼的。』

『你錯了，朋友，你錯了。你以為只有戴單眼鏡拿支票簿的人，纔能思索嗎？容許我告訴你，我的意見，好不好？』

『你說。』

『好的，我覺得這個世界實在太糟了，所以我只想到怎樣照料我自己。可是我每一次那麼做的時候，頭上就給人家擱了一下。而每一次被擱之後，我的矜持與憤怒，更使我堅定了。有』

人說：這世界安排得很好，也並不糟，所以他們攔我，而且在停下手來讓我喘息的時候，就問我有沒有看清。現在我知道他們的膂力很強，可以支持下去，而我却不能忍受了，於是我說這世界是很好的。世界上有着兩種人：一種是攔人家的，另一種是被人家攔的，被攔者的任務，就是如何使他自己成爲攔人家的人。於是我就施展那偷盜的行爲，當我明白自己比同伴們更聰明又更強悍，就做了他們的頭腦了。慢慢的，他們都已習慣。這種好環境，我覺得很適宜於販賣骯髒的。雖然不需要我去，但我常常去看我的顧客們。當然，這東西我們決不會給工人和雇員的。你大致也明白我的意思；我們只給攔人家者而不給那被攔的人。假如我們發現被攔者也沾染了那種不好的習慣，我們就恐嚇他說，要是不戒除就要報告警察。但是我說過，我自己也常常去看那些顧客們。我告訴他，我爲了某種原因，這東西就要斷絕來路了。那我對你說，去看他們的臉孔，實在是非常有趣的。他們的臉孔，完全是一副攔人家者的臉孔哪！

『請你原諒，我怎麼變得多囉嗦了。可是，那也實在叫我興奮呢。你懂嗎？這中間我是非常矜持的，你知道。那些攔人家的人，朋友，我已經說過了。』

他緘默下來。他的強勁削瘦的面龐，有時候並不難看，甚至頗能夠表示一種類似溫和的

神色。而現在，則是異常嚴酷的，他的一雙眼睛，流露着一種從時時被人家監視追逐中得來的機警與尖銳。爲什麼一個仁慈而溫和的面龐，突然會變得兇狠與嚴酷呢？

『現在你覺得思想改變了嗎？』我問。

『我也實在說不出來，不過當我說了之後，我相信你一定會懂得的。你看，這世界是充滿着被擱的人。而現在，情形卻在改變了。在蘇聯，他們把擱人者送進了監獄，雖然我想，假如連萬能的上帝也跟他們一起送進監獄，那是實在太可憐的，但是那也是他們幹的事情。無論如何，在世界的各處，擱人者都已跳了起來。他們又「玩着」防賊的把戲。可是突然地他們轉過了身，向大家哭訴，說他們被人重擊，實在他們自己也是被擱階級，因而彼此都應該聯合起來。我是講着納粹。他們是屬於擱人階級的，但是他們冒充着被擱階級。那只要看明天他們選舉的佈告。這是什麼意思呢？被擱者會舉擱他的人，死人會舉殺他的兇手，木虱會舉消滅他的毒蟲。現在你看着——他很悲慘地說着，叫我心悸；他是那樣的嚴肅——『他們會破壞我們的組織，被擱階級的組織，變成受難者的組織，變成我們的——』他思索着一個適當的字眼，當他說出來的時候，我知道他已經想出了——『變成我們的分派。』』

「可是現在太遲了，」公爵接下去說。「我們不能攔他們，只能恨他們，以及把血冷凍。他們已經日暮途窮；他們自己知道了，我們也知道了。這是最後的孤注一擲，也是最冒險的一擲。我現在並沒有想到使幾百個家庭崩潰的事情。我們已——不，抱歉，我已——不能不鬥爭，真的鬥爭了。我不能夠用言語來表達我所有的意思，但你一定懂得什麼東西驅使我如此的。你明白那是什麼東西。那是什麼啊？」他不等什麼回答，即刻接下去說了。「這是沒有關係的。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一定要做一點事。我只知道自己不能不做。幾百萬的人都跟我一樣，然而他們仍然是很感情的，也沒有把事情看清楚。假如你懂得我的話，那你知道他們還沒有準備呢。」

「我祇信任我自己所知道的東西。知道牠比信任牠更好。知識不能克服我們的時候，纔用信仰。這仍然是每一個人的事情。我又變得多囉嗦了。但你一定知道我是確然思索的。我不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因為，假如有一點道德的話，那也是擱人階級的道德。當被擱階級也有他們的道德時，我纔會成爲一個有道德的人。在那時以前，我只設法拯救這世界，這世界很糟，有一天會被毀滅，因此——但你現在都明白了。」

隔了很久，我纔說：『那你爲什麼不把這一切交給那班人，讓他們去決定，去執行呢？』

他思索了一會，纔回答我。『我不能，我也不願。這是我自己的事情，這是我們有思想有感覺的，也是被擱的人的事情。』他的聲音，被強烈的感情激動得有些戰慄了，接着就像辯解似的說，『我把自己所想的，表達出來，這還是第一次。』

『那我就很想知道你，爲什麼又參加了納粹呢？』

公爵很和悅的把手鎗拿在手裏，站立起來。他把靠近火爐的一隻抽屜拉了開來，將手鎗放好，取出一紮紙張。我看得有些詫異，他雖然沒有加入共產黨，可是在黨立的馬克斯學校裏却讀過十二種功課。『在一個健全的社會裏，』他突然這樣說，『每一個人都有飯吃，有很好的設備，沒有六百萬飢餓的大衆，因此——你注意這個因此——他們比不上能夠吃飽肚子的人的有價值，這樣你就知道我是怎樣一種奇特的人了。』

我看看我的錶，應該走了。公爵告訴我，他是亞爾杜那的李希忒部的挺進隊隊員。

我們又握了握手。我警告他注意梅歐，是從特列斯屯來的那個裝着木脚的人。

我很疲累，不能再走了。黑暗的街中，是連呼吸都不能聽到的岑寂。到處都有暴風部隊派

出的隊伍，穿着制服，荷着鎗，背着行囊，在街中大踏步地行走。德國的中心，在今夜不是柏林，而是漢堡這一個偉大的城市。

我在關心大戲院對面的甘賽商場裏，遇見了漢堡聲的溫特立奇先生。我們的話談得很簡短。我知道柏林的社會民主黨員，正在商會辦公室後面的納蓋爾斯惠奇總部開會，而在老的黨員，多數是主張和希特勒妥協的。他們的名字，他也告訴我。約納·歐倫達特，北方社會民主黨的權威，就是主張議和的一個。年輕的黨員，却很有力地反對他，罵他是奸細。他們準備着動武的。

『大規模的暴動，』溫特立奇這樣說，我可以看見他仍然憑靠在綠色郵筒上。『他們都同意宣佈一次大規模的暴動。』

他的聲音顫抖了。他木立了一會。夜色很暗，一顆星都沒有，但我已經看出他在哭泣了。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寓所。

● 中世紀式的惠爾法庭，是一種秘密政黨的裁判所，召集和判決都是很秘密的。在中世紀的德國造成許多

處的恐怖，好像華爾脫·司各脫在麥斯丹的安娜中所描寫的那樣。

● 甘奇尼泰爾是漢堡著名的陋巷區，那個字，原來也是「狹巷的區域」的意思。

第三章

星期天，三月五日，是一個灰暗蕭條的日子。中午光景，我的房東太太上來了。我再三叮嚀她（要她一定服從的）不許讓任何一個「激烈份子」走進我房裏來。然而在這大選的星期日，竟把海因滋·尼格爾引進了房裏，這真無怪我要暴跳了。尼格爾是柏林激烈的知識份子領袖之一，也是在國會失火那一夜從國社黨的嚴密鎮壓下微幸地逃出來的一人。現在，他從柏林與漢堡間的克列滋，騎自行車到這裏的。

「你來作什麼呢？」

尼格爾坐了下來。「柏林的地獄，比較鬆弛了，」他呻吟着。「他們壓迫共產黨，可是只給社會黨一道命令。假如他們也把社會黨壓迫，那倒可以造成一次大規模的暴動，說不定左派會勝利。但是現在，他們只攻擊共產黨，對於社會黨祇送了一道「友誼的」警告。因此，社會黨徒以為，只要對納粹儘量容忍，跟共產黨儘量遠離，他們的黨，目前還可以存在。其結果，左派的

一個最後勝利的機會也完了。這是可怕的，一種悲劇的嘲弄。」

「你能把柏林的經過情形，作一簡略的敘述嗎？」

尼格爾是一個辯證法唯物論的專家。充其量是一個「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特別在左派的過激份子中，是被大家所咒詛甚至被迫害的。然而他居然保持了她的地位。他把柏林的情形，給我一個總括的敘述。共產黨的總部，蒲牢·潑萊滋的侍從室，給警察佔據了兩星期。共產黨却在柏林運用非法的機構，秘密地工作。但是那些日子，還不需要非法活動呢。所以其結果，非法的與合法的組織中間，發生了明顯的磨擦。有些合法的組織，固然還在活動，然而尚有許多，在那一夜國會失火被國社黨掃蕩以後，已經全部瓦解了。

有人在敲門，進來的是海克梅珊，我的房東太太。「請原諒，」她囁囁着，「我知道你那裏來了一位客人，」於是她端詳着尼格爾先生。

「客人，是的！」我說。「你難道已經完全忘記了嗎，我的縫衣匠茅思先生？」

「呃，在星期日做工的嗎？」海克梅珊夫人說，她顯然在懷疑我有一個從柏林來的客人。「是的，就是他啊！只要他能做的，他都做。你有什麼需要修補的東西嗎？時勢真不好呢，你

知道。」

「請你修補鮑斯先生的裤子吧。」考慮了一下之後，海克梅珊太太纔這樣說。她去了，可是只隔半响，她又拿着一條裤子進來。尼格爾把裤子掛在臂膊上，說第二天補好它。

房東太太去了，我們兩個人大笑了一陣。但是我的笑是勉強的。

「真的你爲什麼來找我啊？」

「那你一定是懂得的，我想跟黨人接觸咧。但是我卻找不到他們。凡倫丁斯岡街的總部裏，一個人都沒有；其他的辦公處都封閉了，我所認識的，昨天還在在一起的同志們，也跟我一樣地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來找我呢？」我驚異地問他。「你一定明白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

他打斷了我的話。「我不讓你這樣說。我曾冒着生命的鋒鏑，而且我準備再冒險。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同志。不過對於我總是一樣的。我知道大家都很信任你，而且你的交遊——因爲你是一個記者——是相當地廣的。你預備把我交給警察嗎？你是一個記者，不是？那就是說，你是一個道學家。幫助我，正是你的義務啊。你一定像我一樣明白這個的。」

「我將盡力幫助你。星期二早上十一點到十一點半，請你到愛斯潑萊納特街二十號愛克斯醫生處。這是他診察的時間。告訴看護婦，你是什麼人，你把證明書也帶着。」

「但是——」

「朋友，」我這樣制止他說。「我是瞭解你的，但也許沒有人再能瞭解你呢。不過雖然我很歡喜跟你見面，請你以後不要再到這裏來，便是你到愛克斯醫生那裏去之前，也請你仔細看看周圍有沒有人。」

客人走了。他腋下挾着一大疊報紙，但我仍然捏住了鮑斯先生的袴子。

我出去看看，大選進行得怎樣了。投票處設在劇場對面的地下咖啡館裏。那裏沒有什麼人。我就投了我的選舉票。還打電話給一個英國同事，談起社會民主黨的執行會議，以及會議的結果。

突然我起了一個念頭。我走進餐廳，喊了一客點心；從那扇接連着的小門裏，我可以望見投票處的房間。在那裏，除了監選員坐在一張特別的桌子邊以外，還有七八個年青的人，面前攤着一張很長的名單。各大政黨都派代表到全國每一個投票處，拿着一張那一區選舉人的

名單。選舉人把票子投了以後，他們便從名單中劃去一個名字，於是剩下來的就是那批沒有投票的人。下午三四點鐘，那張名單就給送交黨部。他們把那些名字審查一下，如果發現有黨員或是與黨表示同情的人，便派人到他們家裏去，勸他們出去投票。

我看着那些年青的人，直到三點半鐘。那是很容易辨認的；那個少婦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學生是國社黨員；藝術家是中央黨員，還有一個年青的女工是共產黨員。

三點半鐘光景，他們陸續出去了。我就跟住那個共產黨員。共產黨在那時，雖然在名義上並不正式禁止，但也並不允許活動，所以我若緊跟住她，那就可以發現那個非法政黨的工作機關。

她走進了一家我所熟識的咖啡館。那麼，這裏就是工作場所了。我站在外面。天在下雨。片刻之間，青年們從四面跑來。即刻卻又走了出去。他們在追蹤着沒有投票的人。兩個警察緩緩地踱過了。

突然地有一個人從咖啡館裏出來，好像我在那裏認識的。不過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勃魯諾，是一個學生，在開會時常常發言的。我又跟住了他。

他搭電車，我乘汽車去追他，向着溫特許特。他跳了下來，在雨中走着，捲起他的領帶，一路吹着口哨。我把車錢付了，轉過頭來，却已不見了他。但他只能轉彎走去，因為這裏除了一個很大的公園之外，沒有一個可以讓他直衝進去的門口。當我急轉過去的時候，幾乎把他撞倒。他立在家門前；他已走上階沿，按着電鈴，正在等待。跟平時的星期日一樣，這裏連鬼都沒有——個的。

『喂，勃魯諾！』我招呼着。他像閃電一般轉過了身。待我走到他跟前，門已開了。

『勃魯諾，好！』我說，『我是跟蹤着你的，』我就告訴他怎樣跟他，以及爲什麼要跟他。我們都站在門口。有人從遠處在走近了。

『進去，進去，』學生囁囁着，把領帶解了下來，走上階沿。他的臉色，非常慘白。『這種事情，』在我們一起上去的時候，他這樣苦苦地說，『這種鬥爭的把戲，跟蹤，偵探，對於你好像是一種玩意兒。但是對於我們——』他突然頓住了。我們走上三樓，房門開着。

我就替他說完了那句話：『——但是對於你們是十分嚴重的。不過，每一個納粹黨人都可以像我一樣跟蹤你們的啊。對於我的事業說起來，那也未見得是一種玩意兒。我只希望自

己能夠於人有利，正好像你們希望於人有利一樣。我已讓你知道，你是如何的粗心，好，現在我要走了。」

「不，請你留着，還要請你原諒，」勃魯諾說着，伸手給我。「我覺得非常懊惱，因為太容易讓人家知道我們的工作機關了。你在這裏，可以碰到許多熟人。也許你可以幫助我們。或者我們可以幫助你。」

我走進了一個寬大富麗的房間，雕飾的牆，鋼的傢具，還有許多美麗的植物。幾年以前，共產黨決定到許列勃花園去進行非法的工作，而且在若干時候以前，他們決定了在危急之時，必須把辦公室和其他房子佈置得十分豪華甚至闊綽。

四五個人圍坐吸煙，默然無語。史的太太瑪莉卿——國會失火的那夜，我們都在印屈拉咖啡館的——看去彷彿異常的膽怯。她丈夫爲了黨的工作，已經到薩爾去了。約翰正在那裏剔着他的煙斗。雨已停止，從很遠的烏倫化斯忒渡頭，我們可以聽到那傳來的音樂。漢堡好像是全世界最安靜的城市。

我很不安，而且不快。我望着周圍的面龐。他們都是十分慘澹的。他們本想與社會民主黨

合作，以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暴動。然而現在，他們覺得不會再有暴動，也不會再有鬥爭了。

如今，只剩下一個微細的希望——就是，等待選舉的結果宣佈以後，無論社會民主黨員或是鋼盔團員也許會來一次暴動。大家知道與登堡總統爲了懼怕納粹，已經躲在堡壘裏受保護了。我們也已知，在很密切的聯盟間，內閣的同僚間，希特勒與登堡間，有着很深的敵意。因此從民主黨以至於共產黨的幾百萬羣衆，每個人都希望着那天下午，弟兄們會來一下痛擊。

於是他們討論着如何在德國進行非法的工作。他們覺得，那些新的非法領袖，絕對不要跟那些常在危險中的老職員接觸，以免危險。這個警備，實在是很聰明的，我即刻找到了許多佐證。那些國社黨員，尤其是作爲補充警察的黨衛團員，竭力在拘捕老職員，希望從他們那裏探到新的非法機關。因此，囚犯們是受到嚴刑拷打的。但是他們不會洩漏，因爲他們洩漏不出什麼來。而嚴刑拷打的另一種目的卻被達到了；整個國家在這種恐怖政策之下，惴惴而慄，便是很勇毅的革命份子和民主黨人，也都停止他們的政治活動了。

這天下午，他們決定，有些知名的職員，務必要逃到德國境內沒有誰知道的地方去。他們可以改名換姓地居住下來，甚至可以參加非法的組織。

「所以，」約翰說，「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具體的辦法。」當時展開了相當的爭辯，最後勃魯諾把大多數人的意思，總括起來，這樣說道：「我們固然能夠擬出這樣一個具體的辦法。但是，讓我們挨過今天和今夜。天啊，我可決不相信我們就會那樣無聲無息地捲入法西斯的浪潮的。我決不會相信！我決不能相信今夜一定有一次鬥爭。那時候——」

他說到這裏停住了，但是我們卻明白他的意思是什麼。我們仍然抽煙。一句話都不說。我告訴他們，尼格爾來找過我，同時我遣他到一處地方去。「我們不能夠讓他到這裏來的。他最好還是到漢諾威或者魯納堡去。那裏纔需要一些有組織經驗的人。在這裏，他也太有名了。」

一會兒天就黑了下來。我們談到縱火問題。國社黨總是非常狡猾的，他們並不把每一個他們所懷疑的敵黨一起拘捕起來。卻把有些嫌疑犯監視着，跟蹤着，從而希望更可以獲得其他的敵黨。在敵黨則用着相反的不容易成功的手段。他們一定要用這種手段，因為這樣纔可

以不致於危害別人。那時候在漢堡區域裏，每一個新任的黨部委員，一定被一個指派的同志暗中跟蹤着的。可是後來，他們覺得太麻煩，而被他們所跟蹤着的人又是非常疏忽，結果就漸漸地鬆懈下來了。爲要避免國社黨的暴力壓迫，他們又想出了一個新的方法——不用人力，金錢與武器的——那是把一切都委之於個人的熱情與果敢，但這種方法，卻爲敵黨所輕視的。

有一天，當約翰被那指派的跟蹤者追獲的時候，——那就是說，他被敵人追獲了——他就走進瑪爾威頓路的褐色房子去拿了一大批國社黨的傳單，出來散發。他把所有的傳單都散完了！

於是又想出了一種交換黨部職員的複雜的辦法。他們就推勃魯諾和約翰去擬具計劃，並且要他們走到另一個房裏去。在我面前，他們都很公開的。對於那種敬意，我很高興地領受了，於是我要求他們我是否也可以表示一點意見，雖然我只是一個『來賓』。他們允許了，我就告訴他們，我是怎樣感激他們這種坦白的態度，因爲這就表示了對於我的信任。

我這幾句簡短的話，卻被一陣鬨堂的笑聲所打斷了，約翰就解釋道，『我們雖然相當地

信任你，但是除了在你面前討論一種未必有助於黨的組織的意見之外，也不希望你再知道些什麼的。我想你應該懂得吧。這不是兒戲的事；這是十二分嚴肅的。我們的敵人，不僅用手槍來殺害我們；而且還用道德的武器呢。他們怎麼用道德的武器，那你自己可以臆測的。這就是我們要找你幫助的原因。我們已給你知道一部分的工作。不過我想你也一定知道社會民主黨甚至納粹的一部分的工作的。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當你報道新聞發表意見的時候，希望你特別注意鬥爭的道德意義。」

我跟大家握了握手，我想我是記着那一次的諾言的。

我常常想客觀，無論調查，無論研究，都要不偏不倚，我自身感受的痛苦，以及我所敬愛的那些人羣所感受的痛苦，我常常想不使牠們給我一點影響。今天我纔明白我以前所知道的。可惡的客觀！可惡的真情的障礙！說什麼懲戒自己的感情，什麼不偏不倚的態度，這充滿着毒害，暗殺，叛逆，獸性，和愚蠢的一切，都應該像疫癘一般地避開的。我個人並不隸屬於任何一個政黨，但是我覺得那些非法地鬥爭，非法地受苦，甚至非法地死亡的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對於信仰，光榮和真理，要比他們的只會利用「道德的詭辯」的敵人，千萬倍的英勇，崇

高，和忠實。

晚上，我到甘奇尾泰爾的一所傾圮的木屋子裏去，那是奧杜居住的地方。幾級峻直的石階，引進他的居室；兩級已經壞掉了。「沒有錢啊，」奧杜往往笑着說，「不能夠把壞掉的修起來。這是我宮堡的壕溝呢。」他住在兩間湫隘幽暗的房裏。一間是廚房，睡着他兩個小孩子；另一間裏，住着奧杜和他的太太。這是他的餐廳，也是他的書室。在這種環境中，他那靠壁放着的，一列弄污了的書，倒是值得一看的。廚房裏沒有一點光亮。孩子們睡熟了。從屋頂綑下來的繩子上，掛着幾件晾灑的衣服，臟臟地飄動，彷彿鬼怪。

奧杜太太坐在起坐室裏看書。我們彼此招呼了一下，我就坐下來休息與思索。黃色的汽油噴射器發着很大的聲音。奧杜在寫字了。

奧杜是我的朋友。他那種迂緩而有力地說話的態態，龐大而嚴肅的臉孔，明澈而沈着的眼睛，以及他天賦的智慧，獲得了人家的信任與尊敬。他是一個自然生成的領袖。我這樣坐着，覺得非常安靜。除了汽油噴射器的潑潑聲，奧杜筆尖的沙沙聲，以及他太太的翻書聲之外，簡

直聽不到其他的聲響。這是暴風雨中的港口。

奧杜擡頭望着我。他在這時候所做的，正是德國北部跟國社黨非法鬥爭中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工作。他所寫的，更與他有着生死的關係。他沒有紀念碑。他的名字也沒有誰知道。當他死去的時候，孩子們還小，而他們的母親卻又不能為他們飼養。但是假使「英雄」這一個崇高的字眼，代表着一種純潔的人，能夠為一切犧牲，能夠與世界鬥爭，又有着信仰與光榮的，那麼奧杜便是一個真正的英雄。崇高的心，堅毅不屈的靈魂，沒有了你，成百的人會畏縮，成千的人會被出賣，成萬的人會失蹤和被毀滅呢！

如果沒有奧杜，那麼德國北部的非法活動還是不會開始的。在今天，幾萬個準備作新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德國公民的人，不可破裂也不可征服地結成了一個有力的組織——那就是這個有信仰的靈魂，這個英勇的革命家的紀念碑。他那愛着他的太太，出賣了他，孩子們得不到麵包。他的名字是誰都沒有知道的。答復他兇手們的鞭笞與蹴踢的，只有輕蔑而已。

奧杜——我的朋友！

他走到我面前，坐到那張攔着我腳的牀沿上，對我瞪視。我知道他要說什麼了。他太太不自然地望着。

『好，』我說，『你要說什麼啊？』

奧杜緘默着；他嚴肅地望着地板。他太太重重地闔上她看書的書。她站立起來了。

『不要走，寶拉；你就在這裏無妨啊，』奧杜輕輕地對她說。於是他轉過頭來，急促地向我說話了。『寶拉有一個弟弟，他常到這裏來，所以明白我們的思想。現在已經參加了黨衛團。』

寶拉過來，坐在她丈夫的旁邊。她是一個瘦小的人，時常慘白和緊張着的，臉形近似蒙古人，生着一對烏黑的美麗的眼睛。『他已經失業四年，』她很急遽地說，『實在他並不是一個正式的納粹。他的參加，完全爲了生活。現在他找到了工作，就覺得很快活了。他還有一個女孩子呢。要是他脫離黨衛團，他就又要失業，他當然不能夠那樣的。奧杜，你也知道的啊。』

奧杜並沒有回答她。『奧杜，』他太太這樣說着，就用手拍他聳着的肩膀。

我的朋友在回過頭去看她；聲音是照例很柔順而清晰的。『寶拉，你知道的，即使他們要我去做指導委員會的主席，我也不會參加他們的黨衛團的。我所要求於我們這一階層的，和

我要求於自己的一樣。這能算過分嗎？」

「也許他並沒有改變他的觀念呢，」我插進了這句話。「在納粹的組織中，很多人是那樣的。他們甚至是被派去的呢！」

「不，不是那麼一回事。我的內弟，常常自稱爲共產黨徒的。如果我們的工作愈趨艱難，他就愈不高興去做。所以在六個月前，他就正式脫離了黨籍。於是他離開這裏，跟納粹混在一起，居然成爲一個黨衛團的團員，跟他們巡行操練了。這樣，他倒得到了職業；他告訴寶拉，以後不能再到這裏來，並且希望她勸我放棄政治的工作。」

我們都緘默下來。汽油噴射器還在發着潑潑的聲音。最後我覺得不能不打破這種岑寂的氣氛了，便緩緩地說：「也許他真是一個被人家說服的納粹呢。」

「也許，」奧杜說。但是寶拉沒有說什麼。

再能夠說什麼呢？寶拉的弟弟頗想結婚，所以無論如何要有一個職業的。這或許是他加入納粹的原因。但是奧杜卻有一個信仰，一種信心，以及一種很深的道德觀念。他爲了牠們而活着；牠們是他的生命。

寶拉愛她的丈夫；但也愛她的弟弟。她們都從一個無產者的家庭中成長起來，是八個挨餓的孩子中倖存的兩個；其餘都害肺病死亡了。而現在，丈夫與弟弟，卻成了誓不兩立的敵人。在那個時候，並無第三種情形的。或是朋友，或是敵人。尤其在這種沒有燈光的貧苦的街區，以及饑饉的陋巷。這裏沒有真實的生命，快樂，和希望；只有一種代替的玩意兒，那是供給幸福的人們的談話資料，那是玩得非常的嚴肅與可怕，而結果會被無名的大眾所勝利的——是的，他們總有翻身的一天。

『奧杜，』寶拉說，臉色是慘白的。奧杜沒有激動。她的聲音顫抖了。『奧杜，你不再信任我了嗎？』

奧杜還是默不作聲；他眼望着地板。寶拉等了他一會。卻還不見動靜。燈火發着撲撲的聲音，使這古老的屋子，也軋軋地響着了。她立起身來，慢慢地走到桌子旁邊，等他說話，但是奧杜並沒有動作。她就走到晾灑着東西的廚房裏去。孩子們睡在那裏。她闔上了門。我靜心聽她是否燃點燈火，可是聽不到一點聲音。她在黑暗中坐在孩子們的牀上。我幾乎看得見她，一個疲憊的婦人，交叉着手，眼裏沒有一滴眼淚。從牀上，孩子們發着有規律的呼吸。

奧杜坐了下來，仍然呆望着前面。他已經結婚了八年。兩年以後生了第一個孩子，可是失業了。又隔兩年，生了第二個孩子。他的羸弱的太太幾乎死去，總有好幾個星期，奧杜除了硬麵包與冷水以外，沒有一點吃喝的東西，所以他太太得不到她所需要的牛油與乳酪，嬰孩也沒一起忍受了下來；他們實在是很好的伴侶，天知道的。五個月前，他在一家汽車公司裏找到了職業。從那個時候起，他就進黨了。

後來奧杜輕輕地說話了，輕得使那隔壁的婦人聽不到它。他的聲音，比耳語高不了多少的。

『我猜想你不曾瞭解我。我知道你以為我這一次是做錯了的。但是，你聽，聽我再告訴你一點吧。』

埠頭上傳來了汽笛的聲音。一條船在黑暗的海中航行出去了。廚房裏卻沒有一點兒聲響。

奧杜接下去說，『你以為我忘記了寶拉給我的助力嗎？她是我的妻，是我孩子們的母親，

也是——也是我全家的主持者，我可以這樣說。但是我在黨裏工作了兩年，已經沒有人能夠做我能做的工作了。至少在現在。這個地位，在我們全體的工作上說起來，是最重要不過的。這不是我個人，也不是她寶拉的問題，而我所做的，也不是爲了我這個死人樣子的人，卻爲了成千成萬的大衆，爲了整個的組織。

「但是奧杜，」我說，「你信任寶拉，是不是？」

「我從沒有想到過寶拉會出賣我的。當然我不會那樣想。可是她也許會做一點什麼事情。你明白我所說的吧。那你想，假如有幾個知道我工作的同志，看見我的妻跟一個黨衛團員說着話。」

門開了，我們便很自然地退縮下去。寶拉又走進房裏來。她並沒有哭泣過。站在門口，她說，「奧杜，我聽到你的最後一句話。你說得太響了。你是對的，你總是對的。我答應你，以後不再見我弟弟了，奧杜，我永遠不見他。」

她突然坐到椅子裏，用手捧住她的臉。奧杜交叉着手臂，繞到她背後，用手撫着她的頭髮，囁嚅着說，「哦，哦，對的，一切都是很對的。」

我知道，一切都是不對的。假如寶拉的弟弟，真是一個給人家說服而加入的國社黨員，那麼他姊姊突然不跟他來往，一定會不僅使他驚異，使他懷疑他的姊夫。而且，他必然會偵察他姊夫的行動，而把他抓起來的。在那個時候，只要有人密報秘密警察，說某人某人很喜歡政治活動，於是就給抓去了。這種情形，直到那年八月，國社黨官吏出了一張對於參加政治活動的人民必須正式告發的告示之後纔改變的。所以奧杜和他的太太，實在是很不對的。

大約九點半鐘，奧杜跟我一起出去，留着寶拉在家裏。在甘賽商場，跟近年來每一次大選的晚上一樣的，擁塞着成千的羣衆，等待大選結果的揭曉。但是這一次，報館的大牆上，不像往年一樣的揭示着大選的結果了。

十字街頭是很黝暗的，人羣都在擁擠地來往着。凡倫丁斯岡那邊，密集着共產黨員；斯底芬潑拉滋的門口，站着國社黨員，而那些『上流人』則都湧在停着他們汽車的琴甫斯底。

我在人羣中不見了奧杜，便從幾簇靜立着的人羣中穿着。市財政局的對面，站着許多先鋒的飛巡隊。警察們把皮帶紐在領下，兀然不動地立在他們的崗位上。他們等待着些什麼呢？在半明的光芒中，看得見他們的橡皮的短棒。

當我站在先鋒隊前面的時候，有人在我臂膀上碰動了一下。回過頭去，原來是社會主義的編輯溫特立奇。他並沒有望我，匆匆地走開了，我就釘住了他。溫特立奇是一個矮小的並不叫人家注意的人，有着一個灰色的臉孔；是戴着眼鏡的。他慢慢地沿着琴甫斯底街。在一家藥房前面，他轉過身來，我從街燈的光芒中，看出他臉孔是如何的灰白。他抓住我的手臂。「一定要發生什麼事情了，」他低語着。「警察們還沒有配備好。要是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動手啊……那些警察們正在等待着。我們一定要動手……」

我明白溫特立奇的興奮。幾年以來，漢堡的警察，一直在——那時還是在——社會民主黨議員松弗爾第的指揮之下的。所以許多兄弟，都是純粹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很可能阻止同事向社會主義者轟擊的。

「松弗爾第是怎麼樣子的呢？」我這樣問。

「松弗爾第！溫特立奇咆哮着。「你不要說起那個自負的傢伙了。我們自己能夠照顧的那些傢伙太老了。他們一點沒有意識的。我們都知道，社會民主黨中的年老黨員，從沒有做過什麼事情的。但是我們這班年青人，年青的社會主義者！我們要——」他又突然停了下來，

捉住我的肩膀，望着我的面孔。『孩子，』他輕輕地可是興奮地說，『我們都年青。我們不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不要獨裁。我們不要野蠻。這裏就會發生什麼事情了，譚已得到一份警察的計劃，纔那樣知道的。他是知道他們的。在愛姆斯波波旦爾區，他們早已預備怠工了。』

『譚在那裏？』

『在一個安全的黨部裏。他曾拉去自己的頭髮。共產黨不信任他，而我們年青社會主義者，也還不知道是否對他信任。他常常在紳士的一方面。坐在黨部裏，擬具計劃，等人家採用。可是沒有人知道他是否信任得過。這是可怕的。』

『請你在四季飯店等我。』

我就跟他分手，從人叢中擠到了共產黨員站着的地方。我又走過警察的先鋒隊，看見他們紐在領下的皮帶以及白色橡皮的短棒。突然我給擠住了。人羣實在太擠，叫我穿不過去。我又明白，共產黨員是不願意人家混雜進去的。他們呆呆地站在那裏，結成一道人牆，不讓一個人過去。我望着一個人的臉孔，要求他放我經過。我要求他，恫嚇他，懇訴他，可是誰都沒有理會。不管我走到那裏，他們都沒有注意我。突然我看見約翰正在遠遠的那方。『約翰！約翰！』我這

樣喊著。但是他也沒有聽到我。

當我走進四季飯店，跳舞已經開始了——美麗的女人，文雅的少年，以及侍者們，忙碌地來往著。一個活潑的年青人，彈著鋼琴的急奏曲，然後閉着眼睛在歌唱起來。我就坐到溫特立奇的旁邊，跟他握握手，卻沒有說什麼。溫特立奇慘然地望着我。「你也在這裏，我很高興。」他說。「我有一點新聞供給你。我們已經動手了。兩個特別通訊員，已經正式派遣出去，一個到蘭希巴納。一個到紅軍前哨。半夜裏我們預備去佔領大衛路的警察局，以及愛姆斯波旦爾的兩處。」

「呃，照着預定的革命計劃嗎？」

「到了半夜，警察就要調班。那個時候，每個崗位都會站上兩個。我們的人纔多呢。這是我們發動的緣故。」我想追詰他，可是音樂驟然停止了。一隻播音機在屋子裏喧叫起來。舞客們似乎都從迷夢中驚醒；他們的臉色，轉為嚴肅；而那些姑娘們的嘴唇上，卻還留着微笑的影子；他們都尖起脚跟，走回原位。我看着他們並沒有把椅子推後去的。

播音機裏發着消息，報告大選的結果。

整個咖啡館都沈入了靜寂狀態。外面傳來一陣遙遠的紛擾和叫囂；船埠上吼叫着汽笛，幾百萬的民衆，正在聽着消息的報告。我把雙手捧着頭。報告員作着他取得代價的工作。很急促地報告着票數；可是誰也沒有聽準。好在現在是無所謂了。希特勒已經勝利。不可思議的德國！不可思議的！

報告員又這樣結束了：『各處選舉，都很安然無事……』

那個矮小的琴師，驚惶起來。報告結束之後，屋子裏仍然岑寂了半晌——除了一聲嘆息，就沒有其他的聲音。於是他記起他是受雇於人的；纔又彈着鋼琴，奏出何斯特·惠塞爾的樂曲。美麗的女人們圍住了他，跟他合唱，非常誠摯地唱着。

我和溫特立奇一同走到皮賽平台霍甫的商會的咖啡館去。那時正當十一點鐘。八個青年圍着一張桌子。漢勃忒便是其中之一；連我就變成九個人。我看出漢勃忒已經抓住時間的意義。他的眼睛發着光。他緊握着我的手，激動地低語道：『現在，玩兒的時間已經過了。現在我們就要顯示出，命運將會如何的擺佈。我們一致承認——』

『你說「我們」，是些什麼人啊？是社會民主黨的青年團嗎？社會主義者，做着什麼工作』

啊？聯盟的工作呢？民主黨呢？共產黨呢？」

「我們已經動手了，」漢勃忒說着，眼睛裏閃着狂熱的光芒。「我們不跟聯盟去糾纏。要是勝利，他們自然會贊助我們的；失敗，他們就會跟我們反對了。至於跟共產黨，我們卻還不能夠接觸。同時我們也沒有跟社會民主黨的執行委員接觸呢。但是他們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乃至於民主黨，那班自己看得很明白的人，只在等待着別人去動手——」

我看着圍在桌子四周的八個狂熱的人，他們都預備犧牲自己的生命——兩個記者，兩個工人，一個演員，一個律師，一個教員。我也注意到他們中的第八個是一個矮小而瘦削的人，同樣是一個大自然的繼子；他有一顆過大的突出的腦袋，稀薄而滑膩的頭髮，沒有睫毛的眼睛。當我望着他的時候，我就想：這是我生平最可怕的一剎那了。就在那一瞬間，屋子好像在轉動，我似乎給誰劫持，我想我已昏厥了。連呼吸也感覺到困難，但我仍然站立起來，用乾澀的嗓音說，「我簡直不明白，自己在這裏做什麼。政治的談話吧，我是不配的。」我又說了一些連我自己也不很明白的話。漢勃忒弄得糊塗起來，釘着我看。溫特立奇扶我坐了下去。他以為我是喝醉的。可是我即刻清醒過來，望着漢勃忒，又望望溫特立奇，囁嚅着，「一定要走了，」於是，縱

然只是頃刻間的事情，我就慢慢地穿過那個碩大的房間，走到盥洗室去。路很長，好像是世界上最長的路了。

在盥洗室裏，我就倚在牆壁上。我覺得自己在發抖。

那個矮小瘦削的人，就是卡依叟！

我的心在狂跳着。我很想做出若無其事的样子。便望着時鐘。再等十分鐘，我就出去。我向自己說着。爲什麼要十分鐘呢？那是無意識的，絕對無意識的。然而我一定要這樣；漢勃忒是我的朋友。那麼，不是九個了嗎？不，那是瘋狂。是的，五個……

門開了，進來的是漢勃忒，他興奮地笑着，「怎麼一回事啊？」

「漢勃忒，」我這樣說，對於周遭的岑靜，我覺得驚異起來。「跟你們坐在一個桌子上的那個矮小的人，是叫卡依叟。他是一個共產黨的區部委員；昨天纔給他們偵探出來，原來他是一個納粹間諜。你們應該立刻取消暴動的計劃。我斷定他們早已包圍這個商會了。你應該趕快離開那桌子去。去，朋友，去，成千條生命都靠着這個呢！」我的聲音變得尖厲了，當我看到漢勃忒還很猶豫，不肯聽信我說話的時候。

我不能再說什麼；便衝出了房間。

外面，什麼東西都很岑寂的。我就雇了汽車進城；駛到中央站，已經十一點十四分了。

根據官方報告，警察們在十一點二十分包圍商會。漢勃忒和另外兩個人，是在包圍前三分鐘溜走的。其他的人，漢勃忒也用耳語去警告，可是沒有聽信。他們五個人仍然圍着桌子。困惑地坐在那裏。有一個人擡頭望望時鐘，說，『已經是十一點二十分了；我們還是分手吧。在十一點四十分，我們一定要帶着別人從總部出發的。』

卡依叟笑了起來，輕輕地說：『我們的下一次會議——在自由的德國舉行，我希望——』

正在這個時候，外面響着飛巡隊的吼聲。先鋒者的槍托也發着擦擦的聲響。捏着手槍的警察，衝進了屋子，把守門口與窗戶。那些年青人都直跳起來。而卡依叟卻仍然安坐在那裏。他用手臂撐着腦袋，望着當前的場景，露出一種異樣的兇悍的微笑。現在他們都知道漢勃忒是對的了。我不知道他們又會感覺到什麼。溫特立奇從他手臂下的皮套裏摸出了手槍，慢慢地繞着桌子，走向卡依叟去。警察們卻已圍成一個很大的圈子，正向桌子移動縮小。其他桌子上的人，都被搜查了一下：有的抓去，有的放走。

卡依叟沒有看見溫特立奇在向他走近的。等到看見已經站在面前了，看見手鎗，他就狂喊一聲，跳了起來。警察卻兀然不動，緊蹙住他。一切的事情，都在瞬息之間發生的。

『那邊！』卡依叟指着溫特立奇，這樣叫道。溫特立奇便舉起手鎗，瞄着他臉孔射擊。突然一陣的騷動，手鎗擠落了。警察押住那一小羣人。這裏發出了鬥士的喘息，以及卡依叟的尖叫。年青的社會主義者用椅子來格鬥。現在已不能用手鎗了；這是肉搏的時候。

一場格鬥，沒有多久就結束的。兩個社會主義青年給他們抓了去。兩個逃走了；其中一個就是溫特立奇。

十一點四十分光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兩個機關都給搜查。主要的兩個，一個在龐貝路，一個在大新商場，事前已得到漢勃忒和他同志的警告。大新商場那個空了的辦公室裏，桌子上放着一封寫給卡依叟的信。裏面是這樣一個字條：『我很高興，手鎗並沒有失掉。你還不死呢。你還要活着，你要聽到這羣被你出賣的人們，最後的拚命的咆哮。你這畜生；你這該死的傢伙！』

第二天早晨，教員亞倫斯，一個被他們抓去的社會主義青年，在亞爾斯底發現了；他的腦

穀已經粉碎。

我就走到古理奧房子去，在每一屆大選過後，民主黨員總在那裏舉行一次慶祝會，雖然他們每一屆總是失敗的。十年以前，他們在國會中佔着第三個位置，也是惠麥同盟的臺柱。現在他們已減到只剩兩個代表了。

彼德生市長正在說話，接着他上去的是一位名字排在民主黨名單前面的人，教員朗台爾。他們兩人對於此次大選的結果，都作了一個具體的批評。他們說，國社黨票數的增多，很使他們驚異，因為在上一屆大選中，國社黨減少了二百萬票，當然的，處處都顯示他們，在這一屆中會減少更多的票數。

有人插進來問，票數是不是對的。

朗台爾就這樣回答他，在帝國和共和國服務了二十年的議員惠奇曼是一個公認為最誠實的統計家，卻被國社黨撤了職，他明白這一次不可思議的突然的改變，適足以引起人家的疑懼。在民主黨員看來，公開的票數是決不確實的，他們一定要把他們所聽到的結果，來一下清算。

爲了去打攪大家，我就尖起腳跟走出了屋子。

在我往訪奧杜未遇而留下一個字條之後，就回到寓所裏來。把鮑斯的袴子藏在褥下，我就躺下來睡覺了。

那是星期天，一九三三年的三月五日，歐洲的命運，就在那一天中被決定了。第二天的報紙上記載着，全國各地的選舉，進行得都是安然無事的。

第四章

第二天清晨，我就悄悄地起來了，這時我的房東太太海克梅珊還在睡覺，我出去開了門，捺着電鈴，又蹣手蹣足地走到裏面。於是我在通道上大踏步走着，開出門去，很響地說了幾句話，然後走回房裏。等我剛纔踏進以後，海克梅珊太太已經推門進來，她穿着睡衣，披散着頭髮。因為她聽到鈴聲，纔起來看看，是不是來找我的。『沒有什麼人啊，』我說。『那是送來了鮑斯先生的袴子。我就給了他幾個錢。』海克梅珊太太懷疑地望着我，拿起了袴子，一聲不響地走了。

整個早晨，我跟我的書記一起工作着。對於此次大選的事，我們沒有遺漏一點兒什麼。中午光景，來了兩個朋友。我就問他們，是不是也知道大選的經過。吃飯時，我跟往常一樣，走到一家很大的咖啡館去，那裏有着許多的知識份子與市政公務人員，他們也常常去吃飯的。侍女告訴我，墨律師把他太太擊斃之後就自殺了！他是一個跟社會勞工黨有着關係的律師，我想

找他談話，而他卻誑我已經離開城市的。

現在，他卻真的離開城市了。我覺得他是一個頗有藝術趣味的，正直而緘默的人。他是逃避國社黨治下那種不合理生活的第一個。他對於未來的種種，比我們更知道得明白的……

這個消息，在各個桌子間傳佈着。坐在這裏喝着湯吃着肉，菜的顧客，都跟他認識的。他們把眼睛低洗了一會，然後繼續吃喝。有人打電話給我。我很驚奇，因為今天在這裏吃飯，怎麼會被人家知道的呢。

『有一個不願意宣佈姓名的人，跟你說話，』我聽到過那個人的聲音，但是不曉得是誰。『爲了你的利益，我纔這樣告訴你。你應該明白，已被監視着了。你的一切，他們都已知。趕快逃跑，趕快躲避。』

我把聽筒掛了，仍然走回桌子，吃完那餐午飯。於是我離開了咖啡館，坐上汽車，很想試試是否有人監視着我，然而沒有。便又開回城裏，想往愛斯潑萊納特街的辦公處去。在斯底芬滋，我撞到了一個緊緊地看着我又在慢慢地跟住我的人。在辦公處前我立停了。那個人卻走了過去，當他走過的時候，嘴裏囁囁着，『裏面有警察呢。』他又閒蕩過去，倏忽消逝。

我燃上了一支香烟，走進郵局。打了一個電話給警察局的印務處，說我聽到愛斯潑萊納特街上一處『叛黨的機關』給他們搜查的消息。那個新處長，一個警察隊長，非常憤怒地問我從那裏聽得來的。我告訴他，我是以下各家外國報紙（一個個的說給他聽）的全權代表，他也許是很外行的，竟不知道新聞記者自有他消息的來源，而我希望於他的，就只要他說出這個消息的是不是正確。

於是隊長倒反客氣起來，允許我自己去採訪。同時他就打電話去通知，並爲我保證。

我又走回了愛斯潑萊納特，沒有顧慮到各處的共產黨員給我的警告，竟走了進去。當我推開那重玻璃門的時候，就給兩個瞄着手槍的警察攔住質詰了。雖然我並沒有發笑的情緒，卻仍然微笑着，說出我的姓名。他們便恍然大悟似地放下了手槍；我是早已有了保障了。就對接待室裏的副官說，『我以爲你不必派遣那麼兩個弟兄，在門口攪那玩意；共產黨員也不會再到這裏來的了。』

年青的副官，卻很惱怒地反駁我。『這是一個共產黨的中樞機關，』他這樣解釋着。『也來過一兩個人，一起給我們抓住了。』

「你們來了幾時，抓去幾個人了呢？」我問。

「我們在十一點一刻跑到這裏來搜查的，約摸四點鐘以前。不幸得很，一個人都沒有在這裏。」

我禁不住笑了。假如警察們真是這樣的愚蠢，我想他們也不會得到什麼的。現在是，再也沒有人會來的了。

從我們這個接待室裏，一起有着三扇門，通到接連着的三間屋子裏。兩間是開着的，我看見那些鋪在地上的墊子，以及一些凌亂的衣服。這裏站着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臉孔對着牆壁，雙手舉在空中。「你把他們抓在這裏嗎？」我這樣問他。「他們這樣子站了多少時候了？」

副官攙着我的手臂，引我到第三間裏去，那裏有着皚白的畫壁以及高爽的窗櫺，很像一個漂亮的辦公室。我就望着那架打字機，一大疊紙張，和計算器，我知道這些東西，都是用很低廉的價錢買得來的。

電話鈴響了起來；副官檢起聽筒，授給我，說，「是警察局印務處打來的。」

那邊的聲音——我聽過過的，但是最後一次在什麼地方聽到的呢？——說，「我是共產

黨的警察局印務處。』我的心，停止跳躍了。這是多麼冒險呢！但是奧杜卻在說下去：『不要太激動。告訴我，你那裏有多少警察？二，東西都給搬走嗎？三，我們有多少同志，被他們抓住了？四，你以為我們能夠有所舉動嗎？』

這倒不容易明白答覆的。我望望站在我旁邊的副官。他對於這件事情有點警覺嗎？他難道是順風耳？我就這樣答覆他：『你的第一個問題——五。二——沒有。三——三男一女。四——』我遲疑一下，然後輕輕地接下去：『我不能在這裏決定。』我掛好了聽筒，望着副官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在他面前，跟那些被捕的共產黨徒說幾句話。他答應了。我們一同走到隔壁房裏去；副官發了一個命令，四個人都轉過身來。其中一個是芬根路的那個女人；另一個是海因滋·尼格爾。副官說：『這位先生是新聞記者。你們這羣蠢豬，注意我的話，好好地站着。』

實在找不出什麼好說的話。四個人都望着我。只有尼格爾，他纔懂得我，盼望我的，其餘的人都以為我是叛徒。『你們現在是在一個不好的窟穴中，』我開始慢慢地說了，儘我可能地有意義地望着尼格爾。『隔壁房裏的東西，即刻要給送到警察局去，於你們頗有不利的。但是你們也不會再受什麼損害。你們仍然有一個機會。你們的朋友或者會來幫助的。』我看見尼

格爾已經明白我的意義了。但是副官很粗暴地打斷我的話。「過來，」他說着，便一把將我拖到隔壁房裏，把門關了起來。「你那些話，什麼意思呢？你跟他们說的話，爲什麼那樣無意識啊？」

我笑了。「這正是我的巧妙手段啊。要是你對大家說，你們是不會再受什麼損害的，也許他們會招供出來了。」

我卻有些不安。假如共產黨方面，真的來一次劫監，那麼副官一定會記起我的說話。其實我所說的，也太愚蠢，沒有什麼用處。我惱着自己，差不多有一兩分鐘，然後覺得釋然。在那些日子，人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顧慮過去和未來；當前的事情纔值得用力去幹。副官又推開了門。這纔走到那些犯人面前，覺得他們有些異樣了。「你們有什麼有趣的事情，讓我發表在報上嗎？」我用採訪新聞的公式似的語調問着他們，當他們堅決而頑強地回說沒有的時候，我就跟着副官走向另一間房裏，向那張從辦公室裏檢出來的名單，看了一眼。

於是我就走出去了。城市跟往常一樣，一點沒有什麼改變。天色已經黑了下來。我就胡亂地走着。晚報上刊着一個消息，「赤色救濟會」的總部之一，愛斯激萊納特街的辦公處給警

察搜查。報紙上又說，這個辦公處，跟「台魯屈拉」——德蘇轉運公司——的漢堡經理處有着關係——那個董事已經畏罪自殺了。

我沒有確切知道共產黨員是否救出那些抓去的同志，收復被佔領的機關。我所知道的，就是在第二天早晨接到一張亞爾斯底·配微龍的畫片，上面只寫「謹賀華誕」幾個字。但是那天並不是我的生辰，而那筆跡，卻無疑地是海因滋·尼格爾的。

對於這幾小時和這幾天中所進展的事情，我與任何一個新聞記者一樣，不能得到一個詳細而確實的全貌。當我走回去的時候，碰到各式各樣的人，大家都告訴我一點不容易證實的消息——譬如說社會民主黨已經從奇尼滋出發到來比錫；鮑伐列亞跟德國分裂了；萊茵河上的橋梁都已炸毀；德國中部的礦區舉行了一次暴動之類。然而——「我們卻一切都平靜。」這是所有訪問者的一句最殘酷的結束的話。

但是三月六日那天，漢堡的一切，卻是並不平靜的。當然未必有槍聲，也未必有牽着鐵索穿過街道的表現。而路上的人羣，我覺得是，從未有過的擁擠。他們從屋子，工廠，咖啡館中走了出來，像我一樣地躑躅着，邂逅着，停留着，而後又走了。女子與孩子卻並不多。

國社黨徒排列成小小的隊伍，正在來往。他們唱起歌來，大家都立着看他們。歌聲停止了。沙商場那裏的人羣，尤其稠密；而甘奇尾泰爾那邊，卻是非常冷靜的。大鋪面的鐵門都已關閉，街車望着擁擠的人羣，全無辦法。

革命已經過期，但還沒有爆發。大家等待着信號。五點半鐘，漢堡社會主義者的警察頭目，戴納團長，一個老邁的聾子，給撤職了。不到七點鐘，一個國社黨員，就被委派接事。

從五點半到七點鐘，整個漢堡，簡直沒有一個準備的警察。然而還沒有發信號。

到了七點鐘，革命的影子消逝了。於是到處全是警察，皮帶，橡皮棒子，探照燈，都很粗野地呼嘯着。挺進隊員穿着鐵跟的皮靴，列隊行進。

街上的人羣，都從朦朧的夢中驚醒過來。他們聽到警察的呼嘯，鐵跟皮靴的囊囊的響聲。正是七點。他們想，這是晚飯的時候了。

天在下雨。街上即刻走空了。

我遇見許多人，把領帶好好地翻了下來，把便帽拉得遮住臉孔。這些都是被擱置黨的職

員；他們不敢回家，但也知道應該走到什麼地方去。雨仍瀟瀟地下着。

那一夜，二百多個人，都在漢堡給抓去了。

深晚我到四季飯店去，碰到瑪克斯，他是一個瘦小的書商，在國會失火那夜曾被一度抓去的。他的桌上只有他一個人，好像在等待着誰，又像很失望的樣子。是的，他告訴我，就在今天給釋放出來。市政廳裏的警察總局和各處的分局，罪犯都已人滿了。他們不能夠提出控訴他的理由。他是低着頭跟我耳語的，我也沒有聽清。事情進展得不好，他接下去說，他覺得不配再幹那一套事情。不，他倒並沒有被虐待，只是跟二十三個人一起禁閉了九天，在牢中日夜討論着政治，他是幾乎發狂了。這鬥爭，也許應該放棄了吧。他擡起了頭，望着我。

我知道瑪克斯的過去，知道他童年時代的苦況。他是一個婦人的私生子；在她結婚以後，生了七個孩子就死去的。他父親是一個嚴酷的碼頭工人，管領着他八個孩子，找到了一個像他那樣的人纔肯去幹的職業，卸運硝石。硝石嚙去他的衣服，鞋子，皮膚和肺。瑪克斯在他的繼兄弟和繼姊妹中，是最孤獨的孩子。他有一個奇醜的臉，卻有一顆堅強的心。他在晚上讀書，直到把他那雙眼睛讀壞了，便做了一家書鋪的夥計。十四年中，他就坐在一盞電燈下的書桌上，

窗子面對着運河。加入革命政黨，也已七年，他的一切，當然都有變化。每月他可以賺進一百二十個馬克，其中的十七個半馬克，須得支付所得稅，疾病和人壽的保險費。

我不能够答覆他。他的手，懶懶地放在桌上。我就把手擱在他的上面。他又低沈着眼睛說：『我已經解職了。那真不容易找尋另外的職業。』

我知道他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我就對他說：『那就參加挺進隊好了。在希特勒底下，可以找到一個職業哪。』

他把手伸開，拍着桌子，這樣說道：『我不願意，我不願意，我不願意！』

突然我就懷疑到他。並不是故意的；但我那麼懷疑了起來。他一定也驚覺的，因為不多一會，他就立起來走了。

咖啡館裏又充滿了人。有人在跳舞；彈琴的人在歌唱；侍者們在奔走。一兩個穿着黑制服的黨衛團員，立在酒排間裏，高聲地說着猶太的笑話。跳舞的姑娘，望着他們在微笑。

我也走進了酒排間，聽到一個愛第加·安特列的名字。現在黨衛團員講得輕些了，可是我還是能夠聽得到。他們是三個穿着新制服的漂亮的青年。手槍的皮套卻是很舊的，顯得常

常用它的樣子。

「我們把關於他的描寫印成了書，一起一萬五千冊。每一個黨衛團員和挺進隊員都發一本。我們要求警察局方面，爲他規定賞格，可是他們不答應。幸而黨裏預約給付酬資。五百馬克。」

「那麼，在那裏抓到他的呢？」

「在好爾斯丹的小站的火車中。一個查票的同志認識他的。他腹部，束着幾百張傳單。他想在火車開動的時候，跳了下去，但是被他們抓住了……他並沒有畏縮。」

就這樣，愛第加·安特列給抓去了！他是一個聰明果敢的人，作着紅軍前哨戰士的領袖。兩年以前，在一個和平的遇會中，國社黨本就預備暗殺他的。但是他們把他跟另一個叫海銀斯的人纏錯，而那一個人結果卻被打死了。那是在一輛開着的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說一句話，他就被人槍殺了，兇手們給人控告的時候，他們就向法院聲明，那是他們的錯誤，本預備行刺安特列的。

今天，那些兇手們正像其餘的人們一樣，已經逍遙法外了。

我聽着黨衛團員在討論這個消息。我相信共產黨員對於他的被捕，一定受到嚴重挫折的。我並設想着如果看見漢勃忒與皮小姐進來，我應該怎麼辦？跳舞和歌唱，仍然在進行着。

現在卻發生了一點特殊的事情。漢勃忒與皮小姐，同時看到了我。漢勃忒在向我走來，卻給皮小姐拉住了手臂；她看着他，耳語了幾句。於是她轉過身來，走出去了。漢勃忒狠狠地向我點了點頭，也跟她走了出去。

我隨即付了帳，到街上拉住他們，這是一個光明的可愛的夜間。求婚的情侶，兀立着，擁抱着，靠在亞爾斯底的欄杆上。

我裝作過分興奮甚至有些酩酊的樣子，拍着漢勃忒的肩胛，自顧上前了，好像不知道他旁邊有着一個女伴，也不知道他非常不愉快的神情。我不讓他們說一句話，把他們拖進了回力球場的酒排間。當大家坐定以後，我突然改變了口吻，變得嚴肅起來，質問皮小姐，爲什麼老是反對我。

皮小姐是一個溫柔美麗的女子，外表卻非常莊重，當她跟人家講話或聽人家說話的時候，總是悠閒地盯住人家的。她常常用睫毛遮住眼睛；她難得微笑，可是她若微笑起來，就顯得

更年青而動人，但仍然是女性的。這時候，她擡起眼睛說，「你給漢勃忒的影響，實在很可怕。他是一個很好的演員，不應該跟政治有所牽涉的。他對於任何一件着手解決的事情，往往太敏感了。」

「你怕他發生什麼意外嗎？」我問。

她微笑着，可是這微笑實在太短促；顯得有些譏諷在中間的。我覺得這個女演員不是一個意氣用事的女性，卻是一個有特殊自約與自制能力的人。但我是不是明白她玩的把戲呢？她笑着說，「我不知道他在政治上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但我確實知道，那太妨礙他的工作了。我們在很短的時間中，預備一起排兩大部戲，所以我不願他就誤了工作。有一次，第一晚演好了，他可以回家，卻又去幹那政治的工作。」

她仍然笑着，看着我，又好像很無力地，把手擱在漢勃忒的手上，這樣擱了一會兒。漢勃忒正想說一句什麼話，於是頓住了。

我們喝了兩杯，便開始談到演戲的事情。這裏坐了一點鐘光景，來了另一個演員，他是回家過路，只預備來喝一杯晚茶的。他自己有一輛車，肯把我們一起載回家去，於是我們站起來

惠帳。那時候，有人進來了。漢勃忒又坐了下來，他說他想再坐一會。我注視着立在門口戴着眼鏡的那個好像是很卑賤的人。皮小姐彷彿非常困憊，因為她背對着門口，所以看不見剛纔進來的人。但是她曾敷了一下粉，也許從那小鏡子中已經看見他了。

「漢勃忒，最好你能一起回去，不要睡得太遲，」她很溫柔地說。

然而漢勃忒卻很有禮貌地立了起來，吻她的手，表示分別，她向我點點頭，就走了。不說一句話。她就離開了咖啡館。我注意着她故意把手套遺放在那裏。

溫特立奇走到我們的桌子邊來。我望着天花板。他即刻明白了，便並不招呼我們地走了過去。他就到酒排間去。漢勃忒十分驚異地問：「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在那個時候，皮小姐回來了，說是忘記了手套。我想她沒有看見溫特立奇在我們的桌子上，所以她好像放心了。她又很快地顧視一下。我問她酒排間裏的那個人是不是認識。她只回答一個「不」字就走了出去。但我現在知道她對於溫特立奇的一切，實在是很明白的，她的所以否認，只是要使我摸不着她所掛慮的事情。我便立了起來，走到溫特立奇那裏去，勸他即刻離開，約定一點鐘之後在印屈拉見面。他就走了。隔了二十分鐘，卡依叟跟兩個戴着球員

帽子的人，氣喘吁吁地走了進來。現在我更得了皮小姐活動的證據。卡依叟把兩個隨從的人遣開。咖啡館裏滿是座客。他就走到我們一桌上來，問我們是不是歡迎他。漢勃忒臉色發白，卻點着頭！我說，『你知道的，卡依叟先生，我是絕對不和政治有關的。所以把我拷問，我也毫不在乎。只是你要是坐在這裏，我卻老實不客氣地要打你，使你不敢再在像樣一點的咖啡館裏露臉。』

卡依叟兀立着，微微向前傾側，右手已經搭在椅子背上了。他望着我，一種憂愁失望的神色，又罩上他的面龐。『你是什麼意思啊？』他訥訥地說着。『你知道什麼啊？』他便站了起來，走開了。

漢勃忒和我，都不再說起一句關於這方面的話。他又要了一些飲料。我便慢慢地說：『皮小姐是一個職業的間諜呢，還是她愛幹那類事情而做的？』

他憤怒了。『我禁止你——』

『可是老朋友，你自己在亞爾斯底·配微龍暗示過我的啊。』

『也許我都弄錯了，』他囁囁着說。『我好像有點頭昏似的。當然我是弄錯了。一個女人』

會——？」

「她也許會。」

漢勃忒看着我。「你聽我說，」他說，「一個人不要鑽進牛角尖裏去。她好像是那個過的。不過我們從沒有說起，我知道她幹着那些事情的時候，也有她自己的原因。她做得未必願意。她以爲是一種責任而已。她是很好的呢。你到底知道些什麼啊？」漢勃忒停住了。我不能夠答覆他。他就接下去說，「她說政治會摧殘我演員的生命，因此我不應該牽涉進去的，她對自己也說着那樣一番話；她的所以信仰着者，因爲她要信仰，同時也不得不信仰的緣故，但是我很瞭解她，她也不能不偵察着我，使我放棄，而——」

好久我們都不說一句話。然後我很謹慎地問，「漢勃忒，那你不是讓她這樣下去呢？結果會怎麼樣？」

他便柔和而高興地笑了起來。「老實告訴你吧，」他說。「這樣下去，不會怎麼長久的。她跟我都沒有講起過政黨的事情，然而每說一句話，大家都企圖使對方受影響，受感動。她希望我參加挺進隊，我希望她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有趣嗎，是不是？是的，真是有趣的。你一定會說，

那太滑稽了。我現在也不知道究竟愛不愛她。但是至少很感動我，也就叫我覺得愉快了。」

我沒有回答他。我們付了帳，出去了。當我們確切知道沒有人跟蹤着的時候，便默默地走過城廂，往聖保里區去。這是一個可愛的夜。

印屈拉咖啡館擠塞着客人，在半暗的光芒中充滿了喧鬧。我遠遠地望見許多認識的臉兒。突然決定了，假如我並不是常常到這裏來的話，那也一樣是很好的。在樓廂中，也跟往常一樣——一些黝暗的蹲伏着的黑影。從底下傳來的遙遠的音樂，給人一種孤寂得可怕的感覺。溫特立奇還沒有看見。我們坐在一排椅子上，瞧着銀幕上的電影。

靠近我們，站着一團人。我認清是溫特立奇，每邊遮着一個闊胸脯的胖婦人；他彷彿是掛在她們中間的樣子。他就坐到我們的中間；兩個婦人也跟來了。我提醒着溫特立奇：「你看見的那個坐在漢勃忒與我一起的是女演員皮小姐。她是一個納粹。」

緘默。溫特立奇掃清了喉嚨，望着漢勃忒。「我不明白，」他突然說起話來，卻又戛然停住了。下面傳來了探戈曲。

「你可不必懷疑漢勃忒，」我說。漢勃忒自己不說一句話。

情形是很窘的。時間已經很遲了。我靠着欄杆，看見下面已經空着。侍女們倚在柱子上，並不躲藏地打着呵欠。我又靠住椅背。他們也默不作聲。

我們走了下來。在樓下，漢勃忒先去。溫特立奇和我就立着望他。街上是空寂而黝黑。我們聽到他腳步的回聲。

我們二個人，矮小的溫特立奇與我到了盧默克路。中國咖啡館早已黑着了。隨處都有中國人。踏着奇特的遲疑的脚步，穿過街道，從這個咖啡館走到那個咖啡館裏去。兩個警察在街的那一邊，靜靜地列隊過去而消失了。

一切都很岑寂。溫特立奇說：『我是生長於一個資產者的家庭裏。父親作着董事。當我們有了客人，請他們吃飯的時候，每一個椅子邊，立着一個僕人在侍候。但我離開雙親，已經有十二年。了。十四天以前，父親突然來到漢堡。當他走進我的房間，我正在修面。我的房間是你在大城市中隨處可以找到的佈置得很雅潔的房間。好些樞架和畫片，用釘懸掛在壁上。我父親關在門口，並不說話。我們也不握手。我用手巾抹去了臉上的肥皂沫。過了好幾分鐘。於是父親關上了門，對我說：「你母親想要你回到南方去，跟我們居住兩星期。」然後他燃上一支香烟，坐

下來了。』

溫特立奇停住了話。除下他的眼鏡，沒有眼鏡，他顯得更羸弱了。我用手臂圈住他的肩膀，我們慢慢地沿着虛默克路走到泰爾路。一路走着，他就一路續講他的故事。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民主主義者。起初我在弗蘭克富忒讀歷史。那時候我常常到國家主義的社團去。以後，我又讀了政治經濟學。我便即刻發現世界上只有一種社會學的制度可以建立的。我便接近了共產主義的集團。我到弗蘭堡去，就學於黑智爾。我只有瞭解與決心，那是學習得到的。我明白那些馬克斯主義者，雖然自詡爲看到了全世界的情況，實際還只抓到整個中的一角。當德國的政治益趨尖銳化，而政治集團也比較需要的時候，我就加入了社會民主黨。我並沒有看清我的領袖們。爲了通過對於社會主義者的禁律而逃到勃利孟去的伊培德，與總統伊培德好像截然是兩個人。這是一種自然的條律，當年青人以爲他們爲了某種動機而生活時，老年人卻只爲了他們自己而生活着。

『我告訴父親，我不願意跟着他回去。於是他勉強地走開了，他還說，我不久會需要他的；他是基甫霍斯同盟的執行委員。』

我們慢慢地走上泰爾路，穿過列坡牌，和大衛路。直走到碼頭，現在是清晨了，天空中吹拂着冷峭的風。街燈在怔忡地晃着。

溫特立奇的父親是一個基甫羅斯同盟的執行委員，而他兒子卻是一個理論的革命家，被警察監視着，被拘票通緝着。漢勃忒是一個年青的社會主義者，而他的愛人卻是一個希特勒的黨徒！奧杜是一個共產黨員，而他太太的弟弟卻是一個黨衛團員！

愛着人家的，不信任他所愛的人；骨肉也成爲陌路了。黨人盲目地愛着——他們的同志。他們也盲目地恨着——所有其他的人。

盲目的。

這是從偌大的德國中，隨意檢取的三個例子而已。這是擁有六千萬居民的國家。

飢饉與戀愛。死亡與幸福……盲目的！

「現在我是孤獨了，」溫特立奇接下去說。「父親寄給我一封用打字機寫的掛號信，他聲明爲了政見的不同，已跟我脫離了關係。我以爲這不是他真正的用意。他只希望，我在被搜查的時候，可以交給他們看。當然，母親是不會想到這些的。不過無論是父親，是母親，於我總是

一樣的。我只覺得永遠不會忘記那封信。」

『你卻得到許多同志了啊。』

『是的，我確已得到許多同志了。我們社會主義青年是團結得很緊的。我們都很年青，我們不相信自已會得衰老。我們有着一個民主社會的理想。我們互相敬愛着。我們不僅是一個流派，一種組織；而且是一個階層。要是任何一人給納粹抓去了，其餘的人就有羣起鬥爭的責任。我們都已失了業；大家忘記了養育者，雙親，戀人。我們只是工作着。』

我又慎重地問他：『你欺騙你自己嗎，溫特立奇？爲了卡依叟的事情，你們也許會完了呢。你們中間，也許還有其他的間諜。你們的組織，現在仍然活動着嗎？假如還在，你們怎麼發動呢？從着手呢？你們從那裏展開你們的活動？你們只是一些優秀的受過教育的青年，而那一方面卻有着五百萬武裝的軍隊。』

溫特立奇和藹地笑了起來。『因此你覺得我們不易工作了。但是納粹在當初，只有幾百個人，法國革命的發動者，也只有一枝小小的軍隊。而耶穌基督，我想他只有一個人。』

我就引伸下去說，『那些人的所以能夠完成革命，只因爲他們並不理解自己所需要的

東西，他們只感覺到需要。你們則理解得太多，而感覺得太少了。」

溫特立奇顯得異常嚴肅。「我不想回答這個。無疑地我們的集團是一盤散沙的。在德國的到處，我們社會主義青年只是單純的個體。我們沒有通訊處的名單，沒有旗幟，黨庫裏也不藏什麼東西。我們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團結。當今最不利於我們的事情，要算國社黨報紙的不幸的心理反應，那些報紙把我們當作死人，當作叛徒。因而全國的大衆，都給欺騙與挫折了。現在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讓大衆知道，我們仍然存在着，而且我們又活動了起來。」

我們走下了哈芬路，沿着碼頭上的橋。天在慢慢地亮了。橋面漸漸地傾側下去。我們走到了寬闊黝暗的河邊。遙遠的船上，點着一盞燈。好幾盞掛在右舷的燈，仍然放着綠色的亮光。風若平靜了一會，我們便可以聽到船上的鈴響。

溫特立奇跟我約定，星期五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新任執行委員會會議，我也參加。

「以一個記者的資格，」我補充着說。

溫特立奇點點頭，然後又笑了起來。「我們開會的地點，一定會使你驚異的。那是漢堡最安全的場所了。」

我很密切地注意着。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知道，』溫特立奇解釋着，『我們跟共產黨以及其他我們所知道的非法政黨一起工作的。那是說我們相互地協助着。假如我們找到了自己的基礎，各組再像從前一樣地分開來工作。我知道你不會洩露給別人，我就告訴你開會的地點——漢堡的發行所。』

漢堡聲是一張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在德國要算是很大的。但已禁止了好幾個星期；印機都已停頓，屋子也給封閉起來。我真禁不住笑了。年青人是對的。沒有人會注意到在那死寂的封閉的屋子中間的他們。

我們分了手。當我走過橋前的廣場，看見了兩個飄浮過去的黑影。在我後面走來了四個警察。他們追上了我，走了過去，站在火車站的木柵前。我讀着那幾個寫在一人高的木柵上的字：『希特勒，快給我們麵包，否則我們又要赤化了。』

一個警察笑着，說着什麼。兩個人便守住這張標語；另外兩個人趕快走了，預備去拿東西來抹掉牠。

『走過去，走過去，』警察向我咆哮着。我就走了過去。約摸二十步光景，我跑到了六個穿着制服的挺進隊伍裏。其中的一個在向我怒睜着眼。我只望着前面，生怕爲了不還答希特勒敬禮或者其他類似的罪名，而被那六個傢伙痛攔一頓。這種事情，每夜都會發生的。所以我一直向前，及至走過了一兩步路，纔敢回頭去看。站在最外面的那個人，我記得他曾向我擠眼的，現在也回過了頭來。我看清他是公爵。

● 基甫羅斯同盟，是貴族的國家主義者的組織。

第五章

從各方面看起來，以後的幾天，是奮鬥得非常激烈的。知友們常常警告着我，說是我的地位要不能保持了。我已屢次被牽涉到『地下』的政治；而在國社黨的總部，有着一份我的行動的記錄；因此我已被偵探所包圍，諸如此類的話。

我也幾次找到了證據，當我離開屋子的時候，我的書桌往往是被人查過的。有一次我到廚房裏去找我的房東太太海克梅珊。她坐在椅子裏，雙手掩着臉孔，正在哭泣；她那染黃的頭髮，頻頻顫動，與抽泣合着節拍似的顫動着。我便急急地走開了。

從那天起，我就不再發覺任何一種密探着我私事的痕跡了。那位一度充當過民主主義代表的鮑斯先生，是一個有名的自由主義者，一個攻擊反猶太主義的流行演說家，現在卻用着所有的叛徒的熱誠，竭力攀搭希特勒，他在三月十五日離開我們的屋子。他突然躍升起來，已經爬到一個地位了。那是一個卑鄙懦怯的傢伙，生着一顆傾斜的腦袋。而海克梅珊太太，現

在就常見她在廚房下哭泣了。

那些日子，對於一個膽小的人，實在是很不舒服的。便是那些自認爲「並無政治興趣」的人，也往往突然給抓去，而沈沒在政治狂熱的浪潮與漩渦之中的。現在是，沒有一個是不與政治有關的了，因而每個都成了敵人。每個都得證明自己是可靠的，而後就偵探他的鄰居，他的朋友，他的妻，他的孩子。

像我們這種外國報紙的通訊員，工作是一天到晚地忙着。外國都想知道德國境內所發生的事情。他們注意着狂熱的國家主義者的興起，德國的報紙，一張一張地被人收賣，否則也就自己轉變了過來。自由主義者的報紙，辭退了舊有的編輯。他們的兒子，年青敏銳的國社黨徒，卻接手下去。在從前，我們外國報紙通訊員的新聞，大部分是由德國報紙供給的。然而那種友誼，現在卻變成慫恿的敵意了。我們不能不由自己去採訪新聞。外國人士，往往爲這些新聞所震驚的，便是在德國，那種刊載着德國消息的外國報紙，銷路也一天天地增加。

我們應該怎樣報告外國呢？每一個人把每一件真實的消息像財寶似的記錄了下來，但即使我們得到了許多有趣材料，也只是一個小小的斷片，對於那樣複雜的政局，幾乎把

大部分都遺漏了，而實際上，我們也難以得到他的全貌的。

他們揣測着，驚異着。於是他們覺得不能夠相信。

當他們最後覺得所揣測的都是真實的時候，世界也早已變得無情了。

到了今天，我們都深信那種力量，確曾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德國頑強地抗爭。然而在當時是誰都沒有知道的。但是那些日子，卻是始終不會忘卻的。感情與瞭解，使我傾向於被擱的階層，使我越出了職業所允許的範圍，去跟他們接近。不過那項職業，也給我許多有利於他們的機會。

我的良心也並不是絕對清白的。當每一次門鈴震響的時候，我總驚嚇起來——當我們到了晚上，坐在甘奇尾泰爾的廚房裏，談着未來的計劃，每一次聽到鋪道上的脚步或是叩門的聲響，我也往往直跳起來。

後來我纔明白，那是危險的。

我還記得有一個下雨的晚上，我在奧杜家裏。走進廚房，只見寶拉一個人坐着。那扇通到

另一間去的門，半開半掩，從那半開着的門縫裏，漏出了搖曳的燈光。廚房裏是黑暗的；唯一的光線就是從火爐裏發出來的。寶拉叫我張望進去。奧杜有着幾個我所不認識的客人。我可以聽到他們很低的談話聲；我叩着門，談話停止了，我聽到奧杜說，『不要進來；你是誰啊？』我告訴他，是我，於是他走到廚房裏，請我再等一兩分鐘，說了又回進房裏去，隨手關上了門。

除了孩子們的氣息以外，一切都像死一般的沈寂。寶拉靠着火爐，我看見她的雙手交叉在胸脯上。我拉了一張凳子，坐在她旁邊。大家都不說話。爐中的火燄，漸漸地光耀起來，黑暗便慢慢地減退了，屋子裏也溫暖了許多；聲音彷彿高了一點，外面卻傳來了下雨的響聲。

突然地從街上傳來了脚步聲，無疑地是脚步，一種沈重的很響的脚步。他們好像在雨中漸漸地走近了。

寶拉和我都沒有動。陡然覺得燥熱難耐。脚步停在屋子的前面。我們也並沒有希望那脚步不到這裏來的。外面一定有三四個人。他們在裏面一間，大概也聽到了，便驟然靜寂下來，那個房間，只有一條出路；沒有窗子。而那條出路，卻又必須穿過寶拉和我坐着的那間。寶拉摸索着我的手。我們都沒有動。

脚步好像走上了階沿。我緊握着寶拉的手；那隻手已經僵硬了。脚步聲更逼近過來。我在那隻僵硬的手上，擊了一下，彷彿打着一個孩子似的。

脚步停住了。我放開了寶拉的手，慢慢地站起身，拉去了凳子，把背心倚着牆壁。又聽到孩子們的氣息和外面的雨聲。於是我聽出有人在外面劃着洋火。兩次，三次，他都沒有燃旺，後來我們看見那扇分隔梯頭和廚房的門下，透出了一閃的亮光，便聽到一個聲音，念着門牌上的奧杜的名字。

一剎那間是絕對的岑寂；連時間好像也停止的樣子。脚步聲又響到第二家去了……

寶拉立起身來，點上了廚房裏的燈火。孩子們仍然熟睡着；他們是不可形容的可愛。從裏面一間裏，又傳來了奧杜的平靜的聲調。

不多一會，奧杜的客人走了。我轉過了背，俯伏在孩子們睡着的牀上。奧杜送了他們出去，纔又回來。他很高興地看到我。他說他要出走，而且說假如我也能夠跟去時，一定會覺得有趣的，甚至我還可以幫助他。

我們冒着雨出去了，領帶都好好地翻了過來，我們到拉沙商場的地下車站去。奧杜望着

鐘。柏油鋪道彷彿一面鏡子，閃爍發光；十字街頭顯得孤獨與淒涼；汽車與電車，好像要趕完牠們的旅途似的，儘量疾駛着，稀少的行人，藏在雨衣中間，僕着背，急急地走着，不想抬頭。

這是七點鐘。在拉沙商場與保斯答的轉角處，一個胖胖的老婦人，鑽縮在一條很小的橡皮氈子中。她四周都是報紙。雙手捏着她的衣裙，眼睛緊緊地閉着。

奧杜走到她跟前，問她要一份漢堡新聞，四周已看不見一個人。她纔睜開眼睛，把手從衣裙上移開了，慢吞吞地說，「好的，好的。」但是當奧杜走近過去，她突然活躍了。奧杜想在遮蓋之下，點上一支香烟，可是真不容易。所有這些時候，那老婦人一直在很快地說着話。我很審慎地站在一處較遠的地方，只能聽到他們一兩句。我聽到好像在談着印刷的事情，又好像說到「十點二十分。」

最後奧杜把烟捲點上了。他回到我這裏，一同走着通到地下去的階級。我們都不說一句話。地下是暖而而乾燥的。奧杜突然跛行起來，便站在那裏，脫下鞋子，彷彿要檢取鞋子裏有什麼沙石的樣子，却仔細地看着那幅黨裏的地圖，然後跟賣票員談着即將出發的旅行。他一直注視着時鐘。忽然他衝到欄柵那邊去，就在我們過去的時候，一列火車開來了。這種經行着大

都市的脈絡的列車，每隔三分鐘就要轟響一次的。

奧杜跟我走上了第二節車去。那裏已經坐着兩個工人。其中較老的一個，正在看書；另一個臉色蒼白的青年，左手伸在吊腕帶裏。

車廂裏是很空的。奧杜不說什麼話。我就坐在他對面。一站一站地過去——真是很累的事情。火車開到龐貝的時候，除了那兩個工人和我們，大家都下去了。於是奧杜跟那個看着書的工人，談起話來。「最要緊的，培德爾斯曼怎樣了呢？」

老年工人把書放了下來，望着奧杜。「他在敲詐我們，」他說；「我覺得他也靠不住呀。」
「爲什麼呢？那個人比我們更加冒險了。那是一個頗有資產的印刷所主人啊。我們已把他控制着，不是他控制我們的。」

「他在敲詐我們。他說那是危險的。無論我們怎樣酬報他，他想不幹了。他要增加百分之四十。」

奧杜沈思了一會，望着我，說：「我們在這裏下去吧。」

我們三個人在虛倫站下車。那個左手伸在吊腕帶裏的年青工人仍然在車上。我們向斯

頓裏城站走去。在一條小巷前，我們立定了。門口有着三四個商號的招牌；有一塊是培德爾斯曼的印刷所。

老年工人在小巷中燃上了烟斗。奧杜和我穿着那條小巷，經過許多所屋子，走到一家低矮的小屋前。他向四周望了望，於是我們進去了。

那是一個狹隘的辦公處，用着滑動的隔板，隔開着機房。一個長着鬚鬚戴着眼鏡的老者，坐在轉椅上。看見我們進去，便轉過了椅子，面對着我們。我注意到他看見奧杜的時候，好像擠着嘴唇，表示出一種歡迎的微笑。但是奧杜卻立即與他交涉生意了。

「承印我們的傳單，聽說你要加錢了。」

「是的，」培德爾斯曼先生說，「假如我承印——」

「我們不能再加了，培德爾斯曼先生。你要知道：你所得到的錢，都是那些失業工人，從飯食中積省下來的。賺到那些錢，也得花上許多的血淚。」

培德爾斯曼好像很不耐煩的樣子。「請你也知道，我是不懂那些事情的，那些不切實際的話，我也聽着厭煩呢。我是這印刷所的主人；我有妻，我有子，我是鋼盔團的團員。你把我的

印機在晚上租用幾小時，你們自己派工人來。那麼你們所印的東西，完全不干我的事，我也不來干涉你們的。至少，這是我始終抱定的主張。不過據我所知道的，你們卻在印刷一個遊民集團的印件。」

奧杜的聲音提高了。「培德爾斯曼先生，你錯了。我們在印着反對政府的傳單，你也非常明白的。」

「反對政府的傳單嗎？」培德爾斯曼喘着氣。「先生，我不要聽這個話。我要維持我的尊嚴。請你不要惹我發怒。」他又平靜了些。「先生，你開什麼玩笑啊？你叫我怎樣地吃驚？我想增加百分之三十三，而你卻開着這樣的玩笑。」

「你跟我的代表說，你要增加百分之四十啊，培德爾斯曼先生。」

「是的，朋友，我們就算是百分之三十三吧。」培德爾斯曼壓低了嗓子。「那你可以絕對擔保，不會出岔子了。」

「假如我不肯增加百分之三十三呢？」

培德爾斯曼在椅子中挺了下身子。「先生，那你可以講妥這筆生意了。」

奧杜點了一支烟。緘默了片刻；印機在轉着，小小的屋子也給搖撼了起來。「假如我們不肯加錢，你預備把我們抓去嗎？不要打斷我的話。我們常常碰到像你那樣的事情。你的印刷所並不是唯一的替我們印刷的一家。你聽我說。你是一個商人。我們付給你標準的價格，這價格也真高極了。而且，我們是現付的。但是你不要忘記，培德爾斯曼先生，假如我們要告發你，那你一定最受累了。在我們到這裏來印刷後的七個星期中，我們把在這裏印成的傳單和小冊子，都送一份到你家裏的。」

「那麼，不是你們自己把那些東西送去的嗎？」

「是的，正是我們。所以，要是你把我们抓去，那你所有的狡猾手段，便全無用處了。你以為把機器給我們在晚上租用幾點鐘，是很聰明的。你彷彿全不知道什麼似的照常營業。但是，先生，你實在是明白的啊。我們隨時可以證明你，明白我們在你那裏印刷的東西。」

「不過，先生——」培德爾斯曼開始抗辯着，移下眼鏡，揩去他眉毛裏的汗珠。奧杜卻就插進來說了。「你不用懊惱，培德爾斯曼先生。我決不用你的手段。我們仍然給你過去付慣的價格，那是標準的價格。事情就解決了。假如你肯把吸墨水紙的價格打得公道些，我們也許會

「買你一點的。」

奧杜轉身走了。我就跟他，而培德爾斯曼卻又叫我們回去。他已離開了轉椅，走到我們面前，膝蓋打着抖。他左手捏着眼鏡，右手拖住了奧杜的衣服，對他霎着眼說：「你真是一個可惡的小鬼啊。告訴我，你怎麼拿走的？你怎麼把那包包的東西拿出去的？警察們對於這類事情，是非常敏銳的。你怎麼把那包包的傳單和手冊拿出去的呢？」

「培德爾斯曼先生，我們是用潛水艇在水底裏通過的。」奧杜動人地說。

我們走開了。在外面碰到那個放哨警備的老年工人。他聽到了奧杜交涉的結果，異常高興。『你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他這樣說着，我看見奧杜聽了這種恭維，臉上泛着得意的光彩。當我們走出巷口，奧杜突然說道：『那是一點沒有困難的。一切都很好。不過——』

『那麼奧杜，什麼事情使你懊惱呢？』

他不再說什麼。但是一點鐘以後，當我們只剩兩個人的時候——我們在斯頓裏城公園裏談着——他却指着一條長凳說：『是寶拉。』

我們坐了下來。我沒有說話。叫我說什麼呢？一對對的情侶，黑影似地閃過了，男人的聲音

都是很低的。

「也許我可以找個機會跟寶拉談幾句話，」我說，但是奧杜並沒有回答。

第六章

那一夜，在我回到寓所以前，又往琴甫斯底的公共電話處去了一次。我翻看那本電話簿。在預先約定的那一頁上，有「P·O·S·」三個很小的字擠在兩個名字的中間。我明白這是告訴我在斯底芬潑拉滋的郵局裏，有一封寫着「P·O·」字母的信。

第二天中午，我到聖保里區去吃飯。我不知道有沒有跟蹤着我的人，因為我到目的地，必須穿過許多熱鬧的街道。午飯以後，我跟着一個女子走出飯館，追蹤她到一家咖啡館去，給她一個信號，纔又走了出來。街上已經空着；要是有人跟蹤，現在他一定會放棄了。我打斯頓威經過，走到甘奇尾泰爾去，穿着湫狹的陋巷，經過勃蘭墟和可隆納特街，在斯底芬潑拉滋郵局裏拿到了那封信……並沒有向四周注視，我就匆匆地從原路回來。

奧杜的家裏沒有一個人。我在門外來往地踱着。一隊巡查的挺進隊過去了。狹隘的街上非常空虛，在蒼白的春陽下顯得有些可怕。我又走進了屋內的階沿，敲着奧杜的門。裏面沒有

動靜。當我重新下來的時候，心裏有些不安，在階沿下竟想不到撞在一個黨衛團員的身上。

這些動搖的古老的屋子，有着幾層峻峭的木梯——居民都叫它作「鷄埒」的。欄杆和階梯都已折斷，你須謹慎地行走，生怕它們脫落和瓦解。當我看見那個黨衛團員，驚嚇得忘記了兩級脫落的階梯。大叫一聲，我竟跌進了他那張開着的手臂裏了。

「謝謝你！謝謝你！」我說，我就掙脫着他的手。他是一個魁梧奇偉的家伙，年紀還青，頗像一個第德瑪沁的農人。他把我緊緊地抓住。他用手臂圍着我的身體，使我不能動彈。我抬起頭；他的臉孔彷彿很熟，但是我已記不起他。他高聲地笑着，卻不說什麼話。隔了一會。

「你想放我走嗎？」我最後這樣問。

他又笑了起來。「不！不！」他說。

「好的，」我就告訴他。「無論如何我不能夠這樣凍死的。」

我忖量着應該怎麼辦。我只要知道那個傢伙到底爲了什麼要抓我！他會知道嗎？最近幾個星期中，我的心情實在太壞了。也許他們已經抓住了奧杜，於是一個個地抓住那些往訪的賓客。也許那封書信就是一個暗示。糟糕，我也給他們抓住了！現在應該怎樣聲明怎樣解釋呢？

我可以冒險叫人來救助。這裏四周，我想一定招呼得到可以救助我的人。但是，是不是只有一個黨衛團員的崗位呢？近處當然也有其他的團員。這裏是十分混亂的場所。我必須想一個什麼辦法的。或者用膝蓋去撞那個突出的肚子，就這樣施一個巧計。

我用膝蓋來作着所謂嘗試的舉動。

那個傢伙把我放開了。「不在肚子上呢，朋友，」他說，「那裏我是特別敏感的。」他不再說別的；我也不說什麼話。以前在什麼地方，我曾看到過他的呢？他退後了一兩步；我仍跟着他。靠在一扇門上，他又開始說話了，臉上已沒有了笑影。「我是寶拉的弟弟，先生。」他的語氣已經截然地改變。那些雇用的軍隊，一旦放棄了他黨裏的術語，就變成了一個挨打挨罵的廝役。他這樣說下去。「我是奧杜的小舅子，所以我知道。我知道的。這就足以叫你相信我，而且你也可以告訴他，我是知道的。」

「天啊，我竟一點不懂你所說的話。你知道什麼呢？你的親戚跟我有什麼關係呢？寶拉是你的姊姊，是不是？那麼，誰是奧杜呢？要是粗粗計算起來，我所認識的恐怕有二十個名叫寶拉和奧杜的朋友。你說那一個啊？而且我跟他們又有什麼關係呢？」

「先生，你不必這樣嘮叨了。我所說的奧杜和寶拉，就是你現在要去找尋的兩個人。他們是我的姊姊與姊夫。我知道他們一切的事情。而我是一個黨衛團員。我與我的姊姊，當然有着感情的。所以我不能冷酷地看着她受難。他們應該即刻停止活動。這幾天中間，他們會給抓去的。那時將怎麼樣呢？那時啊，先生——那時我的姊姊會發瘋，而我會在星期日出去，買些鮮花供到墓上呢。現在你懂得了嗎，先生？這就是我在這裏階梯下立着等的原因。你注意過那個小洞嗎？是一個手掌大的小洞，是不是？當我下了班，我就躲在這裏的。這樣我已躲了四天了。先生，這不是玩兒的事。而你居然又來了，——她是我的姊姊。我還記得她幼年的時代。而你又在這裏啊。就是這個緣故。你應該跟他們說。你率直地說，我已知道了一切。使他們知道，一定要即刻放棄的。懂了沒有好的，先生？」

他轉過身來，開門出去了。「海，」我溫和地說；他便回過頭來。「我想，寶拉也知道你守在這裏，抓住奧杜的客人吧？」

那個傢伙臉紅了；他覺得異常地困惑。

「寶拉嗎？天知道，她是不知道的。我但願她一點不知道。那就好多了。但是你在那裏啊，她

已經結了婚，我覺得結婚就結婚了，我們都應該有自己的見解。當然囉，寶拉是必須訂着奧杜的。我只希望有一個告訴她的機會。我在這裏，也不過想監視那些去訪奧杜的人。不過我告訴你，先生，要是我的警告沒有效果，那就只能讓他所有的朋友都給逮捕了。」他又猶笑着。「我最敬重的朋友，我能知道你的大名嗎？不過那是無所謂的。假如我需要的話，以後我也能夠知道的。只是我們都希望，以後我可以不需要知道就好了，呢？」他又譎地補充了幾句，他望着我，在他慈祥的微紅的臉上，好像寫滿着警告。於是他消失了。當他走去的時候，嘴裏一路吹着口哨。

我站在廡下，推高了我的帽子，深深地呼吸了一陣。

我聽到頭上響着「嘻」的一聲。擡頭一望，看見了奧杜的臉孔。他掀動着嘴唇，我就懂得了。便連頭也不回地即刻離開了屋子，走下狹巷，轉過好幾個彎，纔到老人龍斯的寓所。那裏還沒有一個人，我就悄悄地坐在一個角落裏。龍斯的一個髒骯的小女孩端給我一杯葛縷酒，又出去了。

誰也聽不見地輕輕地推開了門，奧杜走了進來。我們仍然很沈默地坐在那裏。

『我被辭退了，』奧杜一坐下來，就說。『他們推舉我到公司參事會去。這個會議，一定有着很多黑幕吧，所以代替批准我的推選，却遞給我一紙通告。』工作不力，即予撤職，』那張通告上這樣說。公司裏的伙伴都要罷工鬧風潮，但是我告訴他們，以後我們可以更有意義地罷工的。這是我告訴你的話。至於聯盟呢，無論蘭白和其他自負的紳士們如何傾向納粹，它即刻會淪陷下去。納粹是太精明了。他們讓蘭白和他的嘍囉跟他們講條件，使他們妥協，而從中劫取利益。這是布爾什維克的老方法！

『但是我還有一個希望——納粹動手得太急促，紳士們和聯盟的經費方面，也許會發生問題。這樣會激怒紳士們，而來一次大規模的暴動。我已聽到人家這樣講過了。因此我們在德國，又可以有一次上裝的預演。』

『奧杜，你爲什麼告訴我這些話——而尤其在這個時候告訴我呢？』

奧杜緘默了一下。『因爲，假如你願意——』他細心地說了起來。

我立刻打斷他的話。『我不想，對於這些事情，我也毫無用處的。不要試，試不得的；那太傻了——』

我本想說許多話，可是我就這樣停住了。

沈默了許久之後，奧杜纔接下去說，聲音中顯得有些苦痛。「傻嗎？只是傻嗎？那麼任何事，都有什麼意義呢？對於我們所做的工作，你以為是傻的，你為什麼那樣反對呢？你是一個新聞記者，你應該負起社會的使命。社會的使命，道德的責任——你不能够畏縮啊。假如世界崩潰了，你不能够單單攝出他破滅的真相。假如屋子起了火，你也不能夠只在牆上亂寫一陣啊。你應該行動；你有道德的責任，應該做一點事。否則你不必站在我們一面，做一個共產黨員；也不必做一個新聞記者。你不必做任何工作，只要做一個平庸的卑賤的人。你應該和惡勢力奮鬥，和野蠻主義，和暗殺政策奮鬥。不做這個——便做那個。不在這裏，便在那裏。沒有中庸之道的。」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說的是怎樣的正確。直到在我抓到司令部去以後，我親眼看到他們燒書，答死婦女，和屠殺兒童——

（德國政府分明一切都知道，卻都否認了！）

——當我親眼看到德國的新道德是怎樣墮落得可怕的——

(別國也分明一切都知道了，卻都跟那樣的政府有交誼的！)

——當我看到而且證明了德國必須沈淪於血淚的中間，而後可以再躍升起來，像以前某一個時候的樣子——

於是我纔真正的瞭解了我的朋友奧杜，他明知政府要暗殺他，卻不肯逃避。到今天，我覺得這個人，我的朋友，不僅是我理想中的人物，而且是活着，受苦，而死亡的——這個奧杜，我覺得他是正確的。

這還不遲……

但是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現在所明白的道理。我還沒有受過苦……

我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知道尚有一種道德的決心，是與政治觀念全無關係的。那是爲了我和其他成千成萬的人，都沒有知道野蠻的人會得勝利。現在我是知道了。我從心靈深處，祝禱着那種國家，他們的政府與野蠻人表示好感，而且縱然明知會有恐怖，會有苦楚，會有艱難加諸德國，卻還表示交誼的國家——我祝禱那種國家不要用血淚來獲得教育（因爲他們要中立，要客觀）即使我們必須要那樣。

奧杜嘆着氣說，「我們還是講別的吧。我聽到你跟我內弟說話的，你的問題很使他難堪。寶拉確然知道了一切。我要使那個青年——我的內弟——不受損害。他一定沒有跟別人說起過，否則我早就給他們抓去了。他也不會知道多少，可是他會猜到了大半。誰能夠知道寶拉在無意中吐露給他一些什麼呢？她們在家庭中，素來是很接近的。」

「寶拉嗎？寶拉當然不會告訴她弟弟。她早已對你說過了，奧杜。那天我也在你那裏。她答應你永遠不見她弟弟——」

「哦，天啊，快不要再講這些話了！你也明白事情已變得怎麼樣。她早已食言。你不要打斷我的話。我知道她並不是爲了要害我。一點都沒有那樣的意思。她是我的妻，而且是一個賢妻。但是她也熱烈地期望着我。她是想救我。哦，我知道她要——」

我明白奧杜是對的。寶拉又與她弟弟接近了。他答應幫助她，保護她。也許是她出的主意，叫他躲在階梯下；否則，他怎麼會找到底下那個小洞呢？他有什麼機會去發現那個小洞啊？要是他不去訪姊姊，他到這個屋子裏來幹什麼呢？奧杜是整天在外作工的。

除此再也沒有其他可能的揣測了。寶拉和她弟弟，想出了這個計劃，他要威脅奧杜的客

人——大半是黨裏的同志——使黨人都知道黨衛團員已經明白奧杜的活動，而把工作交給其他的同志。黨衛團員當然是很縝密地計劃着，因為這樣，他就可以一個一個知道納粹敵黨的職員了，寶拉報告她弟弟的，到底是些什麼消息呢？她弟弟會報告上司嗎？

奧杜在這時候打斷了我的思索。「那孩子，不要使他受損害。而寶拉——」他遲疑着，然後慢慢地說道，說話的時候並沒有望我：「你是唯一瞭解我的人，你瞭解我有着自己的生命。你也是唯一瞭解我生命意義的人了。我愛寶拉。你是知道的。還有那些孩子——」他突然打斷了話頭。

「奧杜，你聽我說，」我這樣告訴他。「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你不必跟寶拉或是她弟弟交涉什麼的。你只要失蹤。你只要到龐貝或是漢堡其他的郊外去，漢堡是一個大地方。你不要再跟你太太見面，除非你願意在她面前給警察們抓去。只要相隔二十條街，情形就不同了。你隨處可以租賃一間很好的房子。你可以再找一位太太，再報戶籍，另外換一個名字。讓我去找寶拉，解釋給她聽。她一定會懂得的。她是一個勇毅的女人。於是我們把她帶到愛姆斯波旦爾或是其他的什麼地方去，你就可以回家去看看你的孩子了。不要憂愁，即使你不在家，他們也會

把一切弄得很好的，那也費不了多少時候咧——」

「你要跟她講，解釋給寶拉聽嗎？」

「當然囉，在你失蹤的時候。」

大家沈默了一分鐘。「假如我走開了——」他說。

我裝作沒有聽見。喝完了一杯葛縷酒，纔說：「這種家務，我們談得夠了。讓我們再講我們的事業吧。第一個問題是——聯盟的要點是什麼？我個人能夠盡一點什麼責任嗎？」

「我想你是不會的，你這個古怪的傢伙，我想的對嗎？」

「不會什麼？別說這種無聊話！」

「嚇，也許你不要——？」

「哦，不必說下去了。」

奧杜勉強地苦笑着，用手指漬了一滴葛縷酒，舐去了。「不吃牡蠣，真已好久了。是的，我們再談下去。希特勒一定要吸收這個聯盟的，否則他就永遠不能控制那些舊有的工人。他一定要控制他們，因為他們時時預備暴動；如果爆發，那他就覺得棘手了，朋友，他就棘手了！所以聯

盟是必須設法與他遠離的。凡是稍具常識的人，一定懂得這一點。那麼，他們應該怎麼呢？」

他用充滿着期望的眼光，注視着我。我自己承認，一點也沒有意見。「我也沒有，蠢貨！但是我們能夠預言一下的。總之，這事情會有一兩種可能性。一種呢，那是最可能的一種，就是希特勒決不會把那些禿頭者一起當作敵人，但是他要使聯盟變得孤立。然而這件事情，除非他們跟納粹合流纔能夠做得到。而這個對於他的威望，未必有何益處，反而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所以他或者完全把老的領袖們撤除，而用納粹去替代他們的位置，或者那些老的領袖們——忠實而不露頭角的——無條件地投降於這個新的政府。除此以外，就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表示已經明白了。

「好的，我們先承認了這個。現在的問題，是在希特勒到底會採取那一條途徑。當然的，他一定會採取一條阻力最小的路。那樣他可以不致於引起革命，而漸漸地使他們歸附過來。而且，那樣他也不會一時就把聯盟粉碎，不會一時把那些老的領袖們撤除，因為在他們背後，有着自己階層的羣衆。反之，他要邀請那些領袖們降服於他。」

『然而那是早已發生的事實了。』

『承認的。那是早已發生了——而且還不止這一件事。那些先生們早已接受了他的邀請了。』

『那麼，一切事情都已照了預定的計劃。』

『然而並不，一點沒有。希特勒決不會讓任何一個工人的組合存在着的。他一定會——我告訴你，他一定會——粉碎那聯盟。降服不過是他很長的秩序單中第一個節目而已。第二個節目是，那些改變信仰的先生們，一定還要被迫證明自己是忠實可靠的。他們不得不陷害自己的同志，使他們懷疑。而且，他們會不加抗拒地製造屠殺的時機，尤其會偵察那些縈繞於希特勒心中的人物，譬如革命黨，社會主義者；把他們檢舉出來，使他們關進司令部去。當這些節目都很順利地完成以後，於是再來第三個節目，這是頂點，這是秩序單的愉快的結束——就是解散那力量單薄得不能再起鬥爭的聯盟——而那些叛變的領袖們，也會變成「十一月的叛徒。」交去受「國民的正義之怒」的裁判了。』

奧杜是對的。這正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實。也是確然發生了的事實。我不得不佩服那些頭

腦簡單的納粹，居然想出了這樣的政策。我把這一點意思，告訴給奧杜。

他笑了。『我們當然能夠預料得到的。這本不是值得驚異的事。最可駭怪的，却是那些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都沒有想到這種政策的施行與建立。這是納粹所以勝利的原因。也是他們工作之所以短促的原因。政治跟戀愛，跟其他有關於人性的事業一樣，要由清客們去幹的。但是我們不必徬徨。這正是我們的事業——我們要探明聯盟中的老同志們對於這一點的意見。他們也相當地明白他們自己的處境。這時候，他們都是「國家的。」以後呢？當希特勒覺得不必再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將怎樣呢？』

『那我怎麼會知道？』

『蘭白，他是商業聯合會的領袖——那是說，大聯盟中一個關鍵的組織——最近要潛行到漢堡來。他要跟歐倫泰監督住在一起的。你可以去跟他談一談。不過那也不很容易的。他是一隻狡猾的老狐狸呢。他會講出許多話來，而不講一件有關大體的事。他會欺騙你。他會用一種旁敲側擊的策略。那是說，他如果讓你跟他見面的話。但是他到這裏來是非常祕密的。』

我思索了一會，談話也就在這裏中斷了。外面一所傾圮的屋子中，傳來了一聲婦人的尖

叫。叫聲停止以後，却還迴蕩着回音——一種響亮的稀疏的聲音。

「也許我能夠控制他，」我慢慢地說。「我承認那是並不容易的事。相反地，那是萬分的艱難，但是我們可以用方法去處置他。」

奧杜站了起來。「即刻會有人到這裏來了。」我把錢丟在桌子上，我們慢慢地走了出去。在我們一路走着的時候，我就問，「你什麼時候能夠避開呢？」

奧杜並沒有回答。我們沿着惠克斯路走到大漂坊場。在大漂坊場與高漂坊場的交叉處，奧杜指着一所公寓的三樓上的一個窗子說：

「在那上面，特務警察——他是指着國家的祕密警察，一個納粹的新組織——」在幾天以前抓去了一個勃魯姆與伏斯工廠的工人。經過一個半鐘頭的審詢，他從窗子裏跳了出來。那是從三層樓上哪！他們即刻用窗幔擲下來，想去遮蔽他；可是他已變成血肉模糊，腦漿迸裂，骨節折斷的情景了。漢堡新聞上說，「那個人爲了逃避逮捕而跳窗殞命的。」

我望着那所房子——一座巍峨的慘澹的，跟成千所同類的屋子一樣的建築物。底下是商店，每一層的樓窗口都掛着窗幔。這裏絕沒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我們走到了街的那一邊。

「過幾天我要到這裏來呢，」我對奧杜說。他吁了一口深長的氣，閉着眼睛說，「我也要。」
我們走進了提滋大商店的飲食部。我從口袋裏掏出了公爵的信，拆了開來。「請你等一
下，」奧杜拉住我的手說。「讓我給你幾句忠告。」

「什麼，我早告訴你，我要去看蘭白的。」

奧杜笑了起來。「另外的事情。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那是開始容易而實際很難的一些
關於新聞事業的工作。就是你會碰見過的那個瑪莉，正在來了。我們得等她一下。」

侍女走了過來，解事地瞧着奧杜。他跟女人們是特殊熟悉的。當然他也向她霎着眼睛。她
擺動着臀部，穿過屋子，直向奧杜的座位走來。

「你的咖啡要冷了，」她用眼睛瞟着他，這樣低低地說。他把眼皮沈了下去，同樣柔和地
答道，「明天中午我還要到這裏來，愛人，我一個人來呢。但是今天，我們正在等着一個姑娘。不
請你不要發怒。那不是我的女人，却是我這位朋友的。到明天——」

「那麼，不要在二點半以前，」她咕嚕着走開了。

奧杜笑着。當女人們向他顛倒的時候，他總特殊感覺到高興。「你知道惠爾休的故事嗎？」

他這樣問。我說我不知道。

『瑪莉卿就要來這裏了。我們三個人可以討論的。』

『討論什麼呢？』

『等到瑪莉卿來了再說。現在我先告訴你惠爾休的故事。那是在政黨合法的時候。每一個街細胞都負有在各該區工廠中產生細胞的任務。在我們這一區中，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惟有惠爾休洗衣作裏，雇了四百個女工的，那裏却一點工作也沒有。我們召集了好幾次會議，幾乎把我們的心都裂了開來。一切都錯誤了；沒有希望。沒有一個人能夠進入那家洗衣作。看門的人守得古怪的嚴密；整個作場簡直像兵營一樣的有組織。一點事情都不能幹。假如我們在洗衣作前拿出招紙來，那就即刻會有警察和工廠衛士來監視。有一次，我們好容易爬上屋頂，攀到那個地方，把招紙貼滿了每一隻木桶和每一架軋布機。可是當那些女子們早晨上工的時候，警察早已把那些招紙撕光了。我們想盡了方法，可是毫無效果。我們對於這個毫無進入可能的公司，更注意更努力的對付。後來突然地，朋友，突然地，一切都解決了。』奧杜的眼睛裏，閃着愉快的光芒。

「你們怎樣做的呢？」我問。

「怎樣嗎？天曉得，你一定也知道的！簡單得詫異，就是從亞當就開始了的老方法。我從細胞中找了兩個美貌的同志，連我三個人，扮成浪蕩的青年，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她們停工的時候，就到門口去炫示。於是每星期中，追求到三四個姑娘朋友，這多滑稽啊！事業與娛樂打成了一片。那些女孩子也都非常漂亮的呢。」

「起先當然不會談到什麼政治的。只帶她們去跳舞，伴她們回家，上公園去散步，這一類的玩意兒。這樣玩了三四次，隔了兩個星期，於是我們突然地聚集攏來——大概有八九個人——到一家很好的咖啡館去。我們就告訴她們，所以帶她們和追求她們的理由。」

「後來怎樣呢？」

「哦，她們中間有一兩個人，首先走了出去。但是其餘的人還是留在那裏，靜靜地諦聽着我們所說的話。她們要了幾本書帶回家去，有幾個人又到咖啡館裏來。後來有四個人進了馬克斯學校，學了一些我們所必須具有的基礎智識，勞工運動的歷史和辯證法。此後又有一個去學綴字與體育，還有一個學簿記與歌詠，第三個學英文與馬克斯主義，第四個呢——第四

個——不，我已不記得她學什麼了。總之，在六個月之後，惠爾休作場裏也有了一個五十多女
子的健全的細胞組織，而——奧杜笑着——「法庭中就受理了兩件案子。」

瑪莉卿在這時候進來了。她就坐了下來，開始講她的故事。「我們的事情，現在快要解決，
那些黨裏的老職員，我們應該再讓他們參加。當然，很慢而且很謹慎的。」

「我們——我是指非法組織的領袖們——一定要跟大家所知道的職員斷絕連絡。他
們被納粹監視得很嚴，納粹的目的是想探出非法的中心，而使他們蒙受不利。所以我們絕對
需要將他們隔離；甚至我們不讓他們知道我們還是在工作着。其結果，他們中有許多人是失
望了——你一定明白其原由——便放棄了他們的事業；有些人呢，在恐怖與猶豫中甚至歸
附了納粹。然而也有許多人，並沒有放棄他們的希望。他們明白我們墊伏的原因，於是全神貫
注地期待着我們的活躍。只要知道我們還是在工作，他們就心滿意足了。還有其他的人——
不是職員，而是黨員或跟我們表示同情的人，已經跟我們失却連絡了的——也在各自工作
着，分傳單或做其他的事情。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有一個在國家銀行的鍋爐間裏做工的
年青人，用他夜工的時間抄寫反納粹的散葉紙張。材料很多，可是他處理得很好。他很費力地

抄寫在空白的帳單上，黏貼到書記們的座位上去。當然他就給抓住了。要是我們還沒有像他那樣的傻子，那有什麼用呢？」

我打斷了她的話。這故事，我已經聽到過了。「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你現在正想實行一個計劃，使各處所有的「份子」都知道你——反對者——仍然存在著，知道你在沒有鞏固與穩定之前，不能跟他們接觸和連絡。你想告訴他們的是：「我們在這裏；我們在工作；請你們耐心地，堅決地期待着。」」

「就是那樣。你以為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只要你思索一下，那是不難找出一條途徑的。」

「你說的對，」奧杜興奮地說着。「你又在問他了，我已告訴你，他會幫助我們的。那是，只要他願意，」他又加上了一句，望着我，微笑。

「你們要明白，」我說，「我不願人家誤解我。我不能夠幫助你們，也不能夠幫助其他的政黨。我所致力的，便是要知道那些把戲的規則。」

「當然，當然，」奧杜感動地說着。

「你也會像我一樣明白的。但是，政治也許跟戀愛一樣，也容清客們涉足的。」奧杜笑了起來。我却接下去說：「你要公開一下。你却沒有無線電台。即使你們用了什麼危險的詭計弄到了手，在這三星期內他們還是阻止你播音。你一定懂得的。無線電像魔鬼似地看管着。我也懂得的。你祇得到一張報紙的軀壳。你們的傳單，因為力量微弱而分發得不遠。此外，你們當然能夠在牆壁上寫標語啊，在教堂頂上掛紅旗啊——」

「你所說的，也許不錯。但是，朋友，你難道不知道去買一罐紅漆或者去翦一塊紅布是很困難的嗎？一切都給嚴密地監視着。自從最近三天來，每一個商店的女職員都變了希特勒的信徒，因為他們的監督便不敢再撤她們的職，而她們自己，也可以顯得對於「國家的忠實」卻都做了告發的人。我敢說她們未必都願意，然而她們都做了。她們被脅迫着。整個的土地也在這種恐怖下呻吟。納粹這種鞭笞，逮捕，暗殺和其他類似的手段，你不要以為只是一種淫虐狂的表現。不，朋友，却把國家嚇僵，它真是嚇僵了！」

「你難道不能說幾句更有意義的話——」瑪莉卿掃興地說，立起來走了。

我遲疑着。「我却有點兒意思，」我說。「但是我不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驟然一看，

却未必惹人注意的——」

「哦，你說吧，奧杜要求着。」

「好的，假如你真是知道的話——」瑪莉卿懷疑地望着。但是又坐了下來。「好的，那麼，我說。『那是這樣的；假如你們自己沒有報紙，你們也須利用一家納粹的報紙。』」

「好主意！」瑪莉卿嘲笑說。「我們正想去漢堡日報接洽，請雅各勃開一個共產黨欄呢。」奧杜用手腕擊了一下桌子。「不要胡說了，」他喊着，又轉過頭來對我說，「現在來討論一下，但是話要說得有點兒意義的。」

我就說出自己的計劃來。我指出共產黨員應該跟一些知識份子，沒有黨派的人，資產階級或是社會民主黨員多多接觸，而每一天送些文稿到那國社黨的報紙漢堡日報去刊登。「我來講一件事情，」我接下去說。「上星期五，我的一個朋友，一個新聞記者，被亞爾杜那的一家戲院拒絕入場，因為他是猶太人的緣故。現在，那家戲院却送給我每一次的第一夜的記者入場券。我就全數退還他們，另外附了一個字條，大意是說爲了上星期五的侮辱的前例，我不願意喪失新聞記者的尊嚴，也決不願意踏進你們戲院的門口。」

「然而那樣會對你有危險嗎？」瑪莉卿突然變得體諒起來。

「偉大！」奧杜喊道。「他們看了這種無禮的唾罵，也許要吐血呢。你的信，簡直可以當作最好的侮辱的例子，公開給讀者的。危險嗎？危險啊！什麼危險呢？讓我親自來寫這封信，發表以後，你就矢誓說你並沒有寫過。你可以問他們要一張證明的文件。那在日報上就又多了材料了。」

我接下去說，「那是每天為報紙找尋材料的方法。每天，要把表示你「唾罵」的文字發表到納粹的報上，那麼全國的寂寞的民衆，那些受苦的，孤獨的，沮喪的人，會知道你們還是在活動着——」

瑪莉卿突然站立起來，伸手給我。「我很快樂。我們就可以那樣做許多事情的。」她又望着我說，「假如你需要幾個好朋友的話——」

「我不會跟你們做什麼事情的，」我打斷了她的話。

「當然，當然，」她囁囁着，又緊握着我的手，走開了。

最後我從信封中抽出了公爵的信。奧杜把椅子拖過來，跟我一起看。信裏是這樣寫着：

我的愛人，

下星期六，我的隊伍——我告訴過你，我是在李希忒隊伍裏的——要在華區舉行春季典禮。我希望我能夠消釋我的重負。請你到那裏去，當然要打扮一下的，要是我九點鐘不在辦公處，請你找我一張留出的名片。假如你高興，還可以多帶些女孩子來，但是她們一定要會跳舞的。倘若你自己分不開身，那你必須派一個跟你同樣美麗的女子來，她可以要一張票子。我喜歡女性的一切。你總明白的吧。你千萬不要帶男人來，因為那要發生問題的。那個晚上，我的隊伍還要舉行會議，也許會有爭吵。但是希望你能夠設法到那裏去，愛人，你一定要打扮一下，那我會如平時一樣地覺得快樂的。

你的惠廉

奧杜把信塞進他背心的口袋裏。「這個傢伙叫什麼名字啊？」隔了半晌他纔這樣問。「什麼？」

「你懂得這封信上的意思嗎？寫信的人彷彿知道他的事情的。信上的意思是說，我們要派許多武裝的同志去；可是寫信的人沒有知道我們派去的是誰，也不知道怎樣認識我們，所以說在他辦公處留出一個名片。那個沒有說出來的名字就是通行的口令。這傢伙真聰明。即使給任何人拿到這封信，也不會看出什麼的。」

我把一切關於公爵的事情，告訴了奧杜。他思索了一下，然後說，「看情形你跟他維持這種連絡，比跟我來得好些。我們的黨，不希望跟囚犯們接觸。但是我希望你能夠進行跟這類似的工作。那傢伙在聖保里是很有趣的，他有一些勢力呢。他是值得結交的。但他怎麼會跟你搭上的呢？哦，假如你高興，下星期六我們就一起到華區曼去。我可以帶我的哥哥，以及一些可以信任的姑娘們。朋友，事情一定很有趣的；我希望那處地方能夠走得進去。」

「準定如此！我們就到下星期六九點鐘，在泰爾街和虛默克路轉彎處再見吧。從那裏沿着弗蘭哈特街走到華區曼，只需五分鐘。今天下午，奧杜，我預備到寶拉那裏，到你太太那裏去。你懂了嗎？那時候，你必須——」

「要那麼快嗎？」

「要那麼快。」

● 「細胞」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術語，意思是指那些建立在工廠、貿易集團，以及其他組織中的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單位，也可以說是組織的中心。

第七章

星期五那天，大約七點鐘光景，我在丹都車站的鐵道拱門下遇見了溫特立奇。他很興奮。他說，「我們讓一個客人來參加會議，這還是第一次呢。我希望你能夠——」

「請你不必耽心。」我用手臂去圈住他的手臂。這是一個可愛的岑寂的夜晚。年青人袒着衣襟，迂緩地走着。姑娘們穿着漂亮的衣服，在他們前面閒蕩。她們都把手臂勾搭着，蕩逸地望着那些青年。她們倩笑了，於是年青人就得意地揮舞着手杖。這是一個可愛的晚上。

社會主義者的出版部，有着兩個入口處。通到印刷部去的門，臨着大戲院路，通到編輯部去的，卻臨着菲蘭路。在那上面，聳立着巍峨的大廈。溫特立奇和我在這四周，轉了幾乎兩個鐘頭的圈子。九點鐘了；街燈都亮了起來，天空中卻下着密密的細雨。這一所大廈的每一扇窗子裏，都沒有有一點光。

我們轉到了大戲院路，立在拱廊的下面。溫特立奇推開了兩扇門，讓我進去以後，又很細

心地闖上了。走廊與樓梯，都是漆黑的一片。他攙着我的手，引導着我。突然從黑暗中發出了聲音。溫特立奇說了一個口令，我們纔繼續前進。我發現溫特立奇儘在領我轉圈子。我們一路談着話。

於是我們走到了廊裏，那地方彷彿我也認識的。我們走進了一個電炬輝煌的房間。突然的巨光使我覺得眩暈，不能不把眼睛閉了起來。我能聽到聲音，也能嗅到煙味。待我重新睜開眼來的時候，纔發現那是一個圖書編輯的房間，窗子臨靠着天井。八九個人坐在那裏，大多數是我所認識的。他們坐在椅子上，坐在桌子上，也有坐在地板上。沙發裏卻有兩個女人，一個很年青，另一個比較老些。溫特立奇將我介紹給他們，說是一個新聞記者。

這些年青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注意我。他們進行着關於黨務的討論，頗使我驚訝。他們都很自由地談着話。我告訴他們，這個新聞記者和知識份子的小小的一羣，好像只是一個個自由的個人，而沒有一點黨派的形式。

「那是真的，」有人在這樣答道。「我們的階級早已消滅了。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得感謝卡依叟先生，要是你不給我們警告——你記得吧，那一夜在商會裏——我們都已經死了，已

經給他們做掉了。」

「做掉了嗎？」

「是的，那樣殘酷地做掉了！你知道，卡依叟使我們一部份人都給抓了去。我們的人一個個被帶到警察總局，大漂坊場，和富斯布丹爾。四個人都已不能再行走，其中的一個是亞倫斯教員，卻跟別人一起被做掉了，他們把他沈溺在亞爾斯底河裏。惠廉·第克生也同樣地被結果了。他們在深夜埋葬了他，直到一切都弄妥以後，才把死亡證明書送達他母親，那上面卻沒有一個字。死亡的原因，說是心臟陷落症。我們卻爲這個教員和畫師報仇。我們把第克生的屍體掘了出來，照了一個相。那幀照片，就預備印在最近要出版的那本小册子的封面上。他們本想叫惠廉供出我們埋藏軍火的地方。然而惠廉並沒有招供。」

這些青年都顯得非常地堅決。他們很平靜；他們好像很沈毅。連那坐在沙發裏的女人，他們的年紀，都只有二三十歲。

「我們失卻了一切，」他們中有一個說，「因爲我們還不夠嚴肅，也不夠鎮靜。若說知識份子的成就，不過是一種社會學的場合上的上層建築，那是不確的。若說社會主義只是一種

歷史的結果，而在進化的程序中自然地會到來，那也是不確的。然而即使真是那樣的話，我們也還是不應該那樣地說。因為我們相信，我們中間沒有一個是夠勇敢的。爲了一種自然地會到來的東西，何必去鬥爭呢？不，那是絕大的錯誤。我們應該積極。我們應該努力工作，使社會主義可以實現。在緊急的時期中，人們往往會參加最活動的政黨。這是納粹所以勝利的原因。當然——現在我是概括地說的——與其沒有觀念而有基礎，不若沒有基礎而有觀念。假如我們社會主義的青年，需要獲得羣衆，那就先得確立基礎，社會主義者的基礎，確立觀念，也是社會主義者的觀念。」

他們爭辯着，討論着，大家興奮得很，最後卻都承認了他的話是正確的。於是他們決議產生一個三人組織的委員會，從「實驗主義」的觀點，檢討社會主義青年的行動，甚至最瑣細的行動。

我從他們的說話中，知道了在漢堡市區內，大約有二百個年青的黨徒。這數日本來不好算多，但是因爲年青，所以他們的力量，會有十倍的碩大。他們並沒有徵求補充的企圖。他們的運動，只是照着下列的方向：（一）鼓勵和團結現有的同志；（二）用傳單，用示威運動，以及在納

粹的軍事組織中進行破壞工作，來阻撓國社黨的活動；（三）設法連絡共產黨和其他非法的組織，尤其是全國各地社會主義青年的集團。直要把這幾點都做到了，他們纔會着手補充同志，武裝準備，暴動，起事這一類的工作。

這是一個有趣的夜間。我想，假如他們能夠保持這種鎮靜的態度，並不越出可能的範圍，而且常常避過間諜的話，那麼他們一定能夠成功的。

「可是怎麼辦呢？」温特立奇問。

「最好是這樣。派遣幾個最忠實的同志，到納粹的社團去。我們間最好的同志，應該分佈在挺進隊，黨衛團，鋼盔團，普魯士警察隊，萊斯威，和其他的每一個地方。他們要十分的忍耐着，因為至少要隔二三個月，他們纔敢跟我們的同志們接觸。在那個時候，每一個新來的人，必須加以嚴密的監視。而當他們進入那種社團以後，還得明確地表示他們是永遠屬於我們的。他們也不能夠報告虛偽的消息，因為每一件事情都須經過嚴密的檢討，要是有一個微細之點並不真實的話——那麼，我們知道要把一個人做掉是非常容易的！」

那個人還繼續地說：「也許——那我並不確切地知道——我們可以跟其他的非法集

團合作起來，共同擔任偵探的工作。我們應該儘可能地採取一切的情報。在某種情形下甚至可以連絡非法的皇黨。那些人都很有錢，而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地懷恨着納粹。我們以後跟他們一起做的——」

溫特立奇思索了一下，望着兩個點頭的同志，說：「我們在柏林方面的組織，實在是很嚴密的。現在已有幾千光景的人了。其中的知識份子並不多；最多的還是工廠中的工友們。不過至今我們還沒有跟他們怎樣的接近。他們知道能夠跟我們接近的，可是我們不知道應該接近那些人。我們一點不知道他們中間誰是被捕過而變成間諜了。我們要等柏林的人先跟他們明確地接近。然而柏林的人啊，也像我們怕他們似地怕着我們咧。」

「柏林的集團，是跟社會勞工黨合作的嗎？」

「我想，也許有聯絡的。」

「好的，」我說，「那我可以替你們去聯絡。我雖然不能夠預約。但我並不以為那是不能。」

溫特立奇說，「你能夠叫我們柏林的兩個忠實同志跟許萊希將軍接近嗎？」

「許萊希」每個人都很驚奇地注視他。大家一致的情怒與反對。

「請注意，」溫特立奇嚴肅地說。「我以為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不是黨務，而是如何設法打擊國社主義。假如你在一隻沈船上，自己找不到一隻救生船，那你一定不會拒絕船上職員的援救。等那小船划動起來，把你救上了岸，你纔可以隨意跟他們爭論啊。這難道是玩兒的事嗎？我們是烏合的羣衆，一盤散沙的人——勇敢固然是，然而我們只是一盤散沙哪。你預備怎麼樣？做一個殉道者，還是做一個成功者？好，那麼——」

在我們分手以前，已經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我往溫特許特，跟送牛乳的人同時走到那所自從國會失火以後沒有到過的屋子。睡眠惺忪的勃魯諾出來應門。我交給他一個口令，一個地址，讓他跟社會主義青年團去接洽一下，而且我還告訴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

八點光景，我纔走回寓所，上牀睡覺。九點半鐘，我的書記來了，便又開始工作。十一點半那班郵差，又送來了一張尼格爾寄給我的畫片。那上面沒有簽名。他告訴我，在這可愛的春天的早晨，他下鄉去了，因為我不能陪他去，所以他很掃興，他還帶着兩個女人，一個是他的未婚妻，

一個是她的好朋友。那朋友是非常漂亮的，他問我下星期日是不是有空。假如有空，那麼要我回個信去，約定一個會面的地點。

我把回信念給書記聽：

親愛的海因立滋，

假如那位小姐確是漂亮，那很好。讓我們到那天十點鐘會見，請你立在門口，就是上星期二你曾跟我失約的那所屋子的門口。

當書記授給我那封信，要我簽名的時候，她問我是否跟屈拉勞先生是朋友。她告訴我，昨天中午，在我出去以後，他來過我房裏的。她那時正想出去，而他卻預備等我。他告訴她，他是我的老朋友，因而不能不跟我見面的；她卻暴躁起來。後來她想我的客人也許會把她的態度告訴我，所以她又向我提起這一點，我曾囑咐過她，在我出去之後，絕對不許任何一人闖進我的房裏。

「他說他的名字是什麼屈拉勞嗎？我不認識什麼屈拉勞。」

她把那個人的輪廓描述給我聽。一切都明白了；原來他是一個納粹的間諜。

「是的，」我說。「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你不放他一个人留在這裏，那是十二分對的。你知道識字的人是什麼東西。他們不要金錢，卻要其他的材料，那是更壞的。哦，你是十二分對的。」

當我的書記走了以後，我又在房裏走了一週。我把每一張紙片，書架上的每一本書，每一隻抽屜都檢查一遍。雖然我也明知房裏並不留存什麼於我不利的東西，然而沒有經過第二次檢查，我還是不放心。我很謹慎地把一兩張社會學與歷史的札記碎紙都繞掉了，但是那些書本，還是放好在書架上。放得和以前的一模一樣，因為假如他們真的搜查我房間而毫無所獲的話，他們一定會——不是沒有理由的——懷疑的。

無論如何，我不能夠沒有不安的情緒。當我離開了屋子，沿着可隆納特走了一兩步路的時候，我就突然地聽到飛巡隊的尖銳的車聲。便立定下來。他們停住在我的寓所前。我就奔到電話處，搖了一個電話；一切好像都已準備着的。於是我又走了回來；我能聽得自己的心跳。一口氣走上了樓梯，看見兩個帶着後備警察符號的挺進隊，立在我房間外面的門口。他們很粗暴地問我做什麼。當我告訴他們我就住在這裏的時候，他們好像迷惑了一會，然後都笑了起

來。「先生，好的，」後來有一個人這樣說。「假如你要去看看，你就進去吧。」

我偶然聽到他跟另一個人說，「他自己來了，搜查倒麻煩了。」

在走廊裏，我發現海克梅珊和一個女僕在啜泣。「唉，唉！」海克梅珊嗚咽着。「想不到我的屋子也給搜查啊！我在這裏住了三十年，從沒有警察——」

「再會！」我說着，從她們面前走過了。海克梅珊太太張大着嘴，抽泣着。

在我房門的前面，站着另外兩個挺進隊的後備警察。他們也像外邊的同伴似地失驚着。他們放我過去了。我走進了房間，把門闔上。我就立定下來，用背心貼着房門。

天知道，他們怎麼把這個地方弄得這樣髒！衣櫥和書桌的抽屜，都給翻倒在地板上；書架給搗亂了，幾百本書弄了滿地；有幾冊的封面也給撕裂下來。許多美麗的圖書從牆上拆下，扯破而且踩污了。房裏有三個人，二個是後備警察的職員，一個穿着普通的衣服。那個人把外衣和背心都已脫了，可是帽子還戴在頭上。他正吸着一枝粗大的雪茄，俯臥在一條毛氈上，面前放着一個信夾，細細地讀着每一封信。

看見我進去，他就擡起了頭來。並不說什麼話，只是允許我自己仔細地檢點一下，便又專

心去看信了。挺進隊員也都沒有動靜。我把帽子和外衣脫了下來，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隔了一會，我纔燃上了一枝烟。那個蹲在地上的人又擡起頭來。「這裏禁止吸烟！」他咆哮着。

「我告訴你，你吸烟倒並不惱我的，我很溫和地說。「請你吸吧。只是，假如可能的話，請你不要把烟灰彈在地氈上。那個不是屬於我的，卻是房東太太的，她也許要賠償呢，是不是？」我便站了起來，拿了一個烟灰盤給他。

他囁囁着什麼，於是把雪茄的烟灰彈在盤子裏。

緘默了半响。兩個挺進隊員，頻頻地搓動着脚。蹲在地上的那個人，現在並不怎樣細心地看他的信件。突然他抬起頭來，指着兩個挺進隊員說，「你們不能夠坐一會嗎？」

「是的。先生，請坐吧！要不是你們在上差，我早已給你們椅子了。」

兩個挺進隊員仍然悻悻地站着。蹲在地上的人苦笑了起來。至少，我覺得他是如此的。他還是在翻着信。我看住了他，我覺得最好要他讓開一步。可是他憤然地說，「臥室已經查好了。如果要進去，你就進去吧。」

我真的進去了。房裏是難以形容的凌亂。衣服，擠了出來的牙膏，破的瓶子，牀上的絨毛，撒

滿在到處。我招呼了海克梅珊。她沒有說一句話。我把她留在臥室裏，自己又走回起坐室。那個蹲在地上的人已經站立了起來，正在拍着膝上的塵灰。

「請問你查到什麼嗎？」我問他。他便狠狠地瞧着我。「還沒有，」他最後這樣說，可是在他接下去說的那句話裏，語氣中流露了一個要點，「所有的政治書都要沒收。慢慢的就會帶去。這裏是我的檢查證。」

我點了點頭。「我想你來搜查，決不是以為弄髒了那些東西而得到快感吧——」

他岔斷了我的話。「這決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告訴你，先生，」他低低地說。「我會看過你一本大作。」於是又大聲地說，「不，決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決不是的。」他把檢查證藏進了口袋，突然又拿了出來，放在我的前面，說，「最好還是請你看一看。」

「我告訴你，那是不必要的。我已經聽到你的話了。」

即刻他又咆哮起來。「看啊，你這混蛋，你看啊！我說什麼，你應該服從。」他把那張紙塞到我的手中，我想他是指着簽在那上面的名字。我看了一下，即刻認了出來；那是卡依叟的簽名。那傢伙站了起來，把帽子推高了一寸，跟他兩個警察一起走了。出去之後，房門立刻關上。

可是又推了開來；他走到烟灰盤那裏，小心地把雪茄烟灰彈了下去，重又走出房間。走到門口，卻說了一句全不相干的話，『先生，我做國社黨員，已經有八年了。』

讓每一樣東西照舊亂放着。我需要人家的忠告，需要一個朋友。所以，第一我想到奧杜家裏去找他，可是不在，我就到他的辦公室去，那是一個小小的閣樓，只容一個矮個子的人能夠挺直的高度，而給旁邊的烟突炙得很熱的，那真配稱作暗室呢。

奧杜正很興奮着。我從沒有看到過他這種興奮的樣子。他叫我說不出話來；他圍在椅子上，彷彿嚇呆了，顯得異常的愁苦。

『天啊，朋友！』我叫了起來。『什麼一回事啊？告訴我！我可以幫助你。』

奧杜擡頭，望着我苦笑。『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最不幸的——』

我拉住他的領帶，想把他拖起來。他自己搖了一搖，勉強地笑着，拿了一枝烟，跟我說話了。真是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那個赤色救濟會，本來五人一組地合起來的，現在遭遇到危險了。本來每一組裏的每一個人，只知道他同組的四個，以及第二組的一個。因此叛變是絕對不可能的。即使有人叛變，也只危害到五個人，而且又很容易查出那個是叛徒。沒有一個人

知道誰是領袖。而那領袖，也只知道每組裏的一個人，就是每一小組的領袖。小組領袖的名單爲了某種原因，並有沒用密碼鈔錄的。但也只有清楚的一份。

那天倒楣，勃魯諾給抓去了。警察們既不知道他是一個非法組織的領袖，又不知道他藏着那張唯一的名單。可是因爲他沒有向那些捏着旗子巡行的挺進隊員行敬禮，就被逮捕了。因此，勃魯諾就給抓了進去！關在大衛路的警察局裏，照例在抓進去的那天，要解到市政廳的總局去。當他們把他搜查一下，那張名單卻給搜去了。當然，無論如何他可以毀滅或者設法偷出的。然而就那樣，他也沒有做得到，於是遭逢了這樣患難的組織，恐怕要被破壞了。奧杜又坐了下來，失望地搖着頭。

『而我們又那樣需要着勃魯諾，』他絕望地說。『現在，全部組織都給弄糟了。那種事情，實在不應該遭到的。天啊，每一天他們抓去了我們的優秀份子，把他們暗殺，把他們虐待！在這種情形之下，組織是不會再能生存多久的。而那張名單——』

在以前，我從沒有看見奧杜哭泣過。

我就這樣對他說，『我可以找出來，奧杜。我有了一個主意，也許能夠發覺出來的。你找兩

個魁梧的人，一天到晚的釘住我。」

「唉，天哪，你總是這樣樂觀的！好的，就這樣吧。不過——」

我去了。我真有一個計劃。我忘記了自己的困難。當我走了半點鐘，把那個計劃仔細地考慮一下以後，纔回到我房裏，打了一個電話到倫敦我所代表的那家英國報紙，報告我被搜查的經過。我知道，他們一定又在聽着我們的談話了。

「這事情是非常困難的」——我說得很粗暴——「要我對於國社黨的政策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我只覺得我之所以遭受到這樣狂妄的侮辱，而連形式上的道歉都沒有者，一定因為納粹威魯那些對於德國的政策尙表示若干懷疑的英國的報紙。」

倫敦主筆聽到了這種突然的攻擊，不免失驚。我能夠聽得他很響地在嘴裏移動雪茄的聲音。

「那麼，怎樣應付呢？」他最後這樣問。

「爲了慈悲，」我懇求他道，「不要因爲這件事情而跟國社黨斷絕了關係」——他並沒有這樣的意思，但我只要知道——「我以爲他們並不一定要向新聞界挑釁。現在我們

也不需要應付。也許他們就會來道歉的。」

我把電話掛斷了。

半點鐘之後，那次來搜查我房間的英雄出現了。「我來向你道歉的，」他苦笑着說。我沒有一點兒放鬆。「誰派你來的呢？」

「我的上司，漢堡祕密警察的分隊長，卡依叟先生。」

「他爲什麼這樣突然決定呢？」

「噢，我怎麼會知道啊？大概他心血來潮吧。十分鐘以前，卡依叟先生被召到警察長李希忒那裏去，回來之後，他就向我瘋狂地咆哮，吩咐我即刻備車，送給你一份書面的道歉書。所以我來了。」

「卡依叟先生是你們的老同志，是不是？」我故意問他。

「他嗎？」那個人離開了戒備的職守，忿憤地說。不過即刻恢復了常態，接着說道，「不，卡依叟先生入黨，纔只一兩個星期咧。」

「不是他早已在警察界裏找到了一個職事嗎？也像你一樣地做着很好的職事嗎？無論

如何，他當然已經進去很久了？

那個人憤怒得臉都脹紅了。「你想盤問我，是不是卡依叟先生進警察局，是在三月五日；他正式就任，足足只有三個星期。」

我顯得完全惶惑了。「怎麼會呢？我真不懂得這個——」

「何必全都懂得啊，」他粗鄙地咕噥着。「我們納粹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我不知道怎麼會如此的——我們常常自己詢問着爲什麼——但是我們爲什麼非如此不可呢？不過，無論如何，你何必問我這些啊？你們當新聞記者的，每天管着人家的閒事。你也許比我更知道卡依叟爲什麼——但是我已經送了那份道歉書了。再會，先生。」

他去了，我聽到他憤怒地碰着門。我又聽到海克梅珊太太在臥室裏檢東西；她在整理呢。我在地板上找到一張白紙；便坐到打字機前，寫信給漢堡的希特勒特派代表高甫曼。沒有別的方法。當我打下了三句，實在寫不下去了。那太叫我憤怒。我把紙張都扯碎了。那我不能不另想一個方法。我需要嗎？我需要寫一封信，一封非常客氣的信，給全德國最無情的野獸中的一個嗎？我真的需要嗎？

(駐紮在德國各地的希特勒的特派代表——我想大概自八個至十二個——跟基督的代表一樣地有着政治與宗教的權力。他們是主教。他們能夠任命與罷免市長或議員，公佈法律，判決人民的死刑，以及減低麵包的價格。他們是絕對的主人，除了希特勒而外，他們不受任何人指揮的。)

高甫曼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他不僅犯過出賣勳章和偽造文書的罪，而且曾經爲國社黨開除過黨籍。在歐戰時，他因爲年紀太小，沒有爲祖國效命；現在他卻生活在祖國的大地上。當他被派爲希特勒的特派代表之後，有一個德國北部的挺進隊首領，國社黨先進和歐戰老將布根霍，擱過他耳光。他希望高甫曼跟他抵抗的，但是高甫曼並沒有還手。他是希特勒的特派代表，因此布根霍是撤職了，被遣到西里西亞去。

房門開了，出現了海克梅珊的蓬髮的頭。「希望我並不打擾你，」她說，但我率直地回答她是的。然而她卻並沒有聽取我的話；逕自走進了書室，坐在沙發的一角。

「哦，海克梅珊太太，我怎麼會受到這種侮辱的啊？」

這個時候，我本不想跟這位年老的房東太太，只顧說她以前的生活怎麼豐裕的老太太

討論什麼家務。但是當我想到她的心裏也有特別之點的時候，我就覺得她也許會解釋她最近一兩天中性情變得古怪的緣由，而對於誰在偵探着我的問題，也可以得到一點暗示。

她不說什麼話，只是注視着地板。我問了一兩個問題；我用盡了修辭的本領，使她吐露出來，可是都失敗了。她呆呆地坐着，玩弄着裙邊。我正想給她一點東西去包紮的時候，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剛纔我順便去看鮑斯先生的，』我說。

她直跳了起來。臉子爲了憤怒，脹得通紅，急急地想說，可是簡直說不出話；我以爲她發了癡。『鮑斯先生，』她最後這樣說了出來。『真是鮑斯先生！你想，你常常提到這樣一個人的名字，這樣一個流氓，這樣一個——』她梗咽住了。

『他跟我同居了幾年，』氣分平息以後，纔又接下去說。『你要知道他是沒有錢，也沒有朋友的。少有像他那樣可怕的枉生的東西！白天死呆在家裏，到了晚上纔出去，而出去，也總全身披蓋着大氅，帽子捲到了眼角，不時看女人。他當過民主黨代表，於是常常演講。他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有着驚人的嗓子。在他演說的時候，簡直就變成了另一個人。有一次我聽到他演講，又看他回來，還像平時一樣地披蓋了起來。從那次起——』

海克梅珊停住了。「你很喜歡他嗎？」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情。是的，我歡喜他。但他一定不相信，永遠不相信，他是那樣的靠不住，他自己也常常苦惱着的。他想嘗試一切，他又瘋似的嫉妒別人。這種日子是很難過的。有時候他竟付不出錢，但是我也從沒有問過他。這是我的生計，可是他從沒有打算過，也沒有想到過我怎麼生活的，或者我怎樣獲得每天的麵包。因此我把一個房間租給你。他也並沒有反對。總之，每樣事情都是好好的，——哦，也許不好，但都非常順遂的，直到希特勒上了臺。他變了。他更常常發表很好的反猶太的言論。當他對着猶太人呼籲着正義，當他講起他們所做的事業以及他們所受的苦痛時，你可以看到那樣一個小小的跛子，爆發着熾熱的火焰。而現在——他參加每一次納粹的會議。他總是第一個發言。站了起來，揮動着腕臂。他沙啞地喊着。「猶太人，」他喊道，「猶太人是我們應該詛咒的。」他是一個成功的演說家。他便進了納粹黨。而且他被獎勵了。他想發財。他變成了要人。他現在白天也出去了。他叫縫衣匠做了一套漂亮的灰色的衣服。」

「你怎麼樣呢，海克梅珊太太？」

「我嗎？我沒有什麼，他難得在家裏的。他現在很有家產了。當他看見我，總是攔着我的背。他常常計劃着事業，總是心不在焉的。有一次我記得他又照例攔起我來，我就哭了。他便咆哮着，說我有點歇斯底里亞，說什麼家庭不睦，說什麼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又說他現在沒有空暇管這私人的事情——尤其像我的情形，因為我不明白當前的新局勢。我們家裏有一個人——他是指你說的——假如我能夠好好地看住而且偵察着你，那是很有價值而且於國社黨很有益處的。他說，你是可疑的；這是一個顯示我是否愛他與愛新德國的機會。我問他我應該怎麼辦。我率直地告訴他，我願意，而且不能不願意做一點事的。你知道，我已並不年青，我不能够失掉他的。」

「後來怎樣呢？」

海克梅珊又繼續講她的故事。「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偵探着你。你從沒有注意過這點。我檢查你一切的東西，你的信夾，你的信。我把你訪客的名字一一鈔了下來，而且扳過了電話。每一夜，我就把這一切告訴給鮑斯先生。我從來不想到，我矢誓從沒有想到過，那樣於你是有害的。我真從沒有想到過。我只想他一定會高興，而會恢復從前的感情的。」

「海克梅珊太太，他高興嗎？有沒有恢復從前的樣子？」

沈默了。海克梅珊立了起來。慘澹地說：「他走開了。他說以他在納粹中的地位而論，需要做一件在他也覺得很歉疚的事情——他要在兩天後離開這裏。我不能再看見他。他沒有給我一個通知；他沒有償付兩年來的債務；他也沒有跟我話別。」

當海克梅珊出去以後，我又寫那封給希特勒的漢堡代表高甫曼的信。我說明自己是外國報紙通訊員，而在我做着客觀的報道工作的時候，屋子被搜查，人又被監視，不能不引起我的惱怒。最後我要求他讓我去訪問。並且我表示像他那樣的人物，一定會允許接見，而並不有損於他的威望的。

我一起鈔了好幾份，兩份送給我所代表的外國報紙，一份送給高甫曼，那兩份是託給可靠的朋友的。我很聰明，因為高甫曼既沒有回信，報上也沒有刊載出來。但是以後的幾星期中，我就不再受什麼迫害與偵探了。

在我收拾房間之時，就請海克梅珊太太替我整理書籍與牀褥。所謂「我親愛的丈夫的」時代所購辦的那些財產，蒙受損失這一點，是比任何政論更叫她痛恨國社黨員的。

第八章

現在我應該解決奧杜的問題。我的計劃早已擬好了。我走到漢堡報館的圖書編輯那裏去。替他們計劃了幾張插圖——那是替他們擬了一個插圖的計劃，然後我帶了一個攝影師出去，要他攝製我所需要的東西。我把關於警察的一組貢獻給編輯，告訴他這是當前編輯的任務。自由黨的報紙，不是不惜工本地想跟德國的新興統治者結好嗎？是不是好，那麼誰是新興統治者？就是警察。挺進隊編成了的後備警察。那些編輯們比其他的政治家都知道得清楚，挺進隊已經變成了一種連希特勒自己都覺得害怕的權威了。誰能夠制勝挺進隊，就制勝了黨的官僚們。我的建議被他們熱烈地接受了。『這裏有一個很好的標題，』一個編輯微笑着說。『我們的挺進隊輸給警察以新的血液了。』

於是編輯部去問警察總監。他們把幾個要點訓示黨衛團，一點鐘後我打電話給新任的警察長，他已經知道我的事情，而因為那些新的統治者也像舊的一樣地歡喜公開露臉，所以

他們答應我給一切的方便。我說，我想在大衛路警察局拍照。

『大衛路警察局！』

『是的。』

那邊遲疑了一下，他要我等候一會兒。我能夠聽到他們激昂的談話，於是跟我接話的那個官吏又來接談了，他問我旁的地方行不行。

『不行，』我說。『一定要在大衛路警察局。我所需要的是不限於本地風光的照片。大衛路的警察局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在漢堡，你恐怕指不出同樣的警察局來，是不是？』

我又等候了幾秒鐘。於是那個官吏答應了。他同時就要通知大衛路的警察長。一切都弄妥了，但是他要求我在發表之前，先把我的圖片送到總局，讓他們審查。我考慮了一下，然後答應了。無論如何，發表的材料應該要受檢的。

我在編輯辦公室裏繼續談着話。『你爲什麼選定大衛路警察局呢？』他這樣問我。『像現在這種混亂的時勢，你到那邊去拍照，不是有些危險嗎？』

『如果我有警察保護，還會發生什麼問題呢？』我問。

「哦，請你看清楚，」編輯警告我說。「那邊我們的弟兄，也不願意給人家拍照呢。而且你的照片上，還要加一個題目。留心不要把幾個真的罪犯跟你的照片混雜了。他們是願意給人家拍去的。不是嗎，兩年以前——」於是他又開始講一個陳舊的編輯軼事。假如有人知道我做這件事情的陰險的動機，他一定會驚詫而震駭呢！

我是記着三月廿五日，星期六的事情。

實際，大衛路警察局是國外也知道，是德國最「著名」的警察局。那是在列坡牌，在每一個水手都知道的角上。那裏是大衛路與列坡牌交叉的地方，每一個從船埠上來的人必須沿着大衛路走。大衛路是一條從海邊，從埠頭通到快樂的城市去的路。在大衛路與列坡牌的轉角，聖保里的中心，就是那個警察局。在這裏，醉漢擠着被人搶奪了的人，病態的娼妓推着販賣骸炭的，還有不懂得德國話而找不到自己船隻的中國人，以及走失了的或是被他們失望的母親拋撇了的小孩子們。這裏你可以聽到各種各式的方言，卻沒有一個習慣於監獄生活的典型的罪犯。

當我到達那裏，大約在下午四點。鐵的欄杆攔在那裏——已經有過兩次了，有人企圖襲

擊這警察局——於是要跨上一兩級階沿。右面是一扇通到警衛室去的門，對直過去是兩扇寫着「此路不通」的門。

警衛室是很小的一間，卻被隔成了兩部。左右各開一扇門。隔板後面放着兩張桌子，每張桌子邊又有兩張椅子。

我到那裏，他們是很客氣地接待的。一個守衛的人向我立正，另一個人進去通報隊長。他顯然是在午睡——他就住在樓上——因為在他進來的時候，正扣着制服上的最後一個鈕扣。他把自己介紹了，顫動着腳跟，跟我握手，並說他正恭候着我。在右面的背後一間中，有着二十來個帶着後備警察臂章的挺進隊。我問他是否可以先讓我在各處參觀一下，以便決定攝影的地方，以及照片的張數。隊長遲疑了一下，也就答應了。他領我去看那一層上的房間，男賓接待室，事務室，檢查室，還有一個窗上放着鐵柵，門內沒有把手的陰冷的地方。所有的傢具就是每邊的兩條長凳。牆上亂塗着字跡。這是囚閉娼妓的所在。頂上的一層是職員的臥室。

於是我們回下來，走到地窖裏去。這是一個冰冷墨黑，而空氣又叫人作嘔的地方。灰黯的電燈，照着通路，泥地，和那開着窺探的孔穴的鐵門。在這條通路的左邊，也有一排六扇同樣

的門。

「這是因閉那些抓來的人犯的監獄。」隊長這樣說。「如果他們在這一區中被我們抓到了，就要關到這裏來，直到我們接奉總局的命令。這裏，我們也把那些醉漢囚閉起來的。」

「在提解總局之前，他們在這裏要拘押多少時候呢？」

「只有一天；至多也不過兩天。」

「我能夠進去看看嗎？」

「就是現在——我真很抱歉——現在卻不可能。這裏都已經住滿了。都是政治犯。你懂嗎？」

「但是，隊長先生，我不懂得。這正是我想拍照的地方哪。在這裏拍攝的照片，可以辯正外國報上的錯誤的記載。你想，假如我們能夠得到監獄的真實的照片——」

「你以為如此嗎？我倒想到一個意思了。好的，我們想一想。也許我們可以找一個警察來代替罪犯，而在監獄裏拍照呢？他可以對着鏡頭微笑，旁邊放一張桌子，桌上是麵包和香腸。那就好了，是不是？」

於是隊長就發命令了。

地窖裏一起有我們三個人——隊長，一個警察和我。隊長派他出去搬桌子，拿麵包和香腸。還有一把掃帚——『就因為隔了一夜，監獄裏又弄髒了。』

警察去了。我的心劇烈地跳着。我怎麼把那隊長也遣去呢？

『隊長，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很要緊的，』我說。『我想我們應該正確地做去。你以為應該打一個電話給警察局印務組，問他們這種照片是不是需要的。你要知道比這個更不重要的事情，甚至對於很有經驗的職員，也會發生許多麻煩呢。』

『對的，對的，』隊長惶恐地說。『我自己也正想着這個呢。請你讓我打電話去。』他就飛快地跑上樓去了。

我有了片刻的時候。這裏有六個監房。一個都沒有火光的。如果我從孔穴裏窺探進去的話，因為通路裏有光，罪犯們可以看得見我，但是我却看不見他們。我便冒了一次險。把第一扇門的孔穴上遮着的東西掀開了，讓燈光照在我的臉上，低聲說着，『快！你是誰？你們是政治犯嗎？』

我聽到樓上的脚步與說話。我想看清這黑暗的監房，可是分辨不出什麼。裏面也並沒有回答。但是他爲什麼要回答呢？也許他不能夠——

有了一個主意。我從通路上跑了回來，找到一個電燈的旋紐。我把電燈關了。一片漆黑。等了一會，多費了一會時間，我的眼睛纔在黑暗中習慣。

可是沒有用。這個黑暗是無可透過的。我聽到樓上發着命令，於是一陣急促的來往的脚步。現在是不能再失時機了。我摸索着門口的方向；摸索着潮潤的鐵板，直到那塊遮蔽着孔穴的金屬的東西。我輕輕地掀了起來。在那監房的上面，有着一扇污黑的鐵楞的窗，手帕那麼大，攔着滿是汽水的玻璃。這裏的光線，剛巧足夠叫一個人憧憬着——這是一個適當的字眼——光明，生命和未來。但是這已經是足夠了。我能夠看見那個在監房裏的人。而且，我看清他決不是勃魯諾……我把那塊遮板放下來；我停留了多少秒鐘呢？我的神經劇跳着，好像在發熱。在第四個監房裏，我想我已找到了勃魯諾。一個人躺在板牀上。他睜大眼睛仰臥在上面。我低低地喊，「勃魯諾！」

然而不是他。一個陌生的人慢慢地站了起來，走到孔穴的旁邊。我可以聞嗅他的氣息；他

聳着闊肩膀走近過來，我怕了，雖然在我們中間還隔着一重鐵門。

他一定在最後一間監房裏。他一定是的。他一定是的！我把其餘的幾間都已經看過了。但是我那時候又想——也許他早已提解了呢？也許他已給暗殺了呢？也許——？

但是他畢竟還在第六個監房裏。我即刻認了出來。當我招呼他的時候，他就走到窺探的孔穴邊。雖然他以前並沒有給我深刻的印象，我卻記得他一切特殊的行動，雖然我並不能看清他的臉孔，可是我無疑地認出了是他。他不說一句話，就是從孔穴裏盯着我看，要看出我到底是什麼人。我低低地告訴了我的名字。他疑惑了。他疑惑了！這樣滑過了幾秒鐘。他還是疑惑着。我突然得到一個靈感。趕速跑到燈紐那裏，扭亮了廊裏的電燈。回到監房的門口，掀起了遮板。他還是在那裏。他的臉孔還是不容易看清。但是他能夠看見我了。他仍然不說什麼。他儂着腰。天啊！他在作什麼呢？他在脫去一隻鞋子——十分悠閒地，彷彿辛苦了一天，預備上牀歇息的樣子。

我聽到了腳步聲。他們在樓梯上了。大概有十六步。勃魯諾把鞋子脫了下來。現在他好像在短襪裏拿着什麼東西。我看不見什麼，但是我聽得到的。三秒鐘以後，好運氣……

於是勃魯諾從孔穴裏授出一方紙張來。就在我接了過來塞進袋去的那一秒鐘裏，警察回來了。他很驚異地望着我。我把遮板放下，鎮定地說，『我在看看你們的客人呢。他們犯的案子都很嚴重嗎？』

『先生，我不知道，』警察客氣地答。

隊長也回來了。他很抱歉，因為總辦公處的人不允許他拍攝這樣的照片。假如這種照片給刊出了，人家一定會批評的。我也表示我的歉意，不過我告訴他，就是在普通的警察工作中，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把那天下午的餘時，都消磨在警察局。他們都很誠懇。我把所有的房間走了一周，把我以為有趣的地方拍了幾張照片。那個聽命於我的攝影師，也顯出異常驚愕的樣子，可是他還是聽我的吩咐。

大約六點半鐘，隊長又去睡覺了。他告訴那個值班的職員，他預備去睡半點鐘的覺。要是有什麼特殊的事情，他們可以把他喊醒的；否則——是的，他也會知道。

等他一走，我就點了一支香煙，略事休息。我跟那些職員們談着話。他們開始講着冒險的經過。我專心地聽着。我是一個有耐性的聽講者。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說着話，講着他們的睿智，

但是當我答應他們把那些話彙集起來付印的時候，他們簡直把我當作警察團中的一員，而繼續講述他們的故事了。

在那些日子，謠言很盛，尤其在外國公使的隨從武官和外國報紙的通訊員中，散播着挺進隊員要有軍事訓練的謠言。但是我在某一機會中證明了挺進隊並不是像它以前所標榜的（尤其對於外國人）一個無害的運動的團體，卻是一個由許多受過步兵訓練的人所組織起來的團體。

我之所以能夠知道，也得感謝那錯綜的環境。挺進隊的受訓的職員，照例是不離開那個深入全國人心的兵營的，那天星期六晚上，他們卻第一次離開了。有兩個是從魯克斯底營來的，那兵營一度設在大衛路；那天早晨他們去訪問了同伴，當然也講述許多的故事。他們當然不會瞞住什麼的。警察局裏的官吏，聽得都興奮起來。兵營裏的職員和兵士，因為他們不說什麼，所以給增加了薪餉，改善了伙食，雖然他們的工作未必比大衛路警察局裏的人們的更危險。因此老的警察們對於那些作爲後備警察，而——沒有受過訓練——享受着同樣權利的『沒有成熟的挺進隊的孩子們，』起着一種慘淡的怨恨。他們中間時時發生着磨擦，而這些

兵營中的老同伴的故事，又閃起他們的怨恨了。

本來他們不會在我面前講起的，但是他們也知道任何一個加入國社黨的平民，往往會被人家問起警察的事，何況他們又看見那隊長待我這樣的尊敬，都把我當作一個黨裏的官員——當作他們的自家人了。

而我——並沒有顧慮到這事的危險性——即刻冒充了攻擊他們同伴的警察的口吻。八點光景，我就走出了警察局，我已知道了一切的事情——人物，地點，以及關於希特勒私人軍隊的祕密軍訓的一切。我已發現血環的一端；那一端卻引伸到一次新的恐怖的世界大戰。我已知道了口令與武器；我已知道了指揮者的名字；我已知道了那個兵營有着一根電話專線通往神秘的總部——一個訓練黨衛團領袖的學校——這個靠近瑪地堡的總部，負責指派德國每一個兵營的職員。關於希特勒給他的挺進隊員以軍事訓練的事，證據已很確鑿了。到現在，這一切還是很隱祕的，可是一切都給明白了。於是我們都不相信他。

我穿過了列坡牌，走到涅奇爾酒店去。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個人；一個瞌睡的侍者，倚着帳桌正在打呵欠，我走到了背後的地方，那裏是黑暗的。那侍者憂鬱地蹣跚到我面前來，問我是

否要坐到前面一點，因為背後的電燈，還不到旋亮的時候。我說我就想坐一會在黑暗裏，他只要去拿一瓶冰酒來，就可以不必管我了。他走開了，一會兒又回來，劃了一根火柴，給我看那要來的冰酒，開了瓶蓋，倒一點在杯子裏，就走開了。

寂靜。我的眼睛漸漸地習慣於黑暗。我喝了一兩杯酒。也許我對於採訪得到的新聞，那時候看得太重要了。那是可能的。但是在那些日子，比這更不重要的事情，也會引起政變與革命。那是充塞着謠言，恐怖和祕密外交的日子。一點真實的消息，就有很大的價值。我一定要把消息傳到外面的世界上去的。

我慢慢地走下了列坡牌。這是星期六，三月二十五日。當我把勃魯諾的紙張抓在手裏以後，便走回寓所睡覺了。這是九點半。

第二天早晨十點左右，我在愛斯潑萊納特的舊辦公處碰到了海因滋·尼格爾。他穿着一件很雅致的外衣，帶我走到停在街的那面的汽車邊，走進了司機的座位，要我坐在他身旁，照着羅皮克的方向駛到海邊去。街上擁擠得很，車輛接成了長流。這是一個特殊的星期日，許多人都想往屈拉芬門特或者其他的濱海地方去玩兒。

「他們通緝着我呢；拘票已經發出了。」當我們開出了城市，雜在大道上的汽車行列中行駛的時候，他這樣說。我卻不發一句話。我只有那樣的印象，覺得愛斯潑萊納特的解放，不是那麼簡單的。

隔了一會，他又說了。「這件事情，對於我是很有益處的。你結果會知道我已參加了實際的工作。以前我是不敢那樣下決心的。我在柏林，在弗蘭克富忒當教授。我有薪俸，有朋友，有學生，有我的工作。此外，我又時常作講演。但是你也知道我的工作的。我從沒有參加過政黨；我不願意放棄我的獨立。也許正因為我不是黨員，纔能夠真正的有用。最後，我是唯一的人，對於馬克斯的解釋——」

「是的，我知道你是黨裏公認的理論家。」

尼格爾又說：「兩星期前，我有一次要去講演，卻為一個同事遇到了，他說我最好還是回去，從門房裏走回去。我說我不想。在以前，尋聲的人往往派來聽講，幸而我和聽眾都避開了。你知道後來怎麼樣——」

我很明白。那裏發生了一次格鬥。尼格爾，一個典型的教授與書獃子，卻像苦力似地打了

起來。他跟三十個社會主義的學生，抵抗着七十個納粹的學生。尼格爾和他的學生們勝利了。於是納粹的學生就去招呼挺進隊。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最後，警察趕來了，纔把社會主義的學生們拉開。他們現在還在牢獄裏。

『自從那天以後，』尼格爾繼續着說，『我心裏似乎起了變化了。直到今天，我還相信着自己在體力方面，雖然永不能擔負一個半熟的學徒的工作，而另一方面我的理論的工作，卻可以影響這時代。無論如何，我們的理論是不可搖撼的。能夠搖撼的是，我們的物質的力量，支持這理論的身體，所以——』

天氣是舒適的。時常有一輛汽車經過我們。姑娘們顯出了歡愉的神色向我們微笑；司機把襯衫的袖子捲得很高。

『我離開柏林，』尼格爾又繼續講他的經過，『因為我覺得太被人家注意了也是有妨礙的。在漢堡，人家又知道我了。但是我得留在這裏。首先地，他們想遣我到鄉間，到魯納堡，甚至到羅皮克去，以為比較安全。但是我想留在這裏。我自己也很能夠享樂。只是化費一點錢，每天從車行裏租一輛汽車來自己駕駛。帶一份非法的民衆報，到神祕的加地萊克斯，八根圓柱的

梅爾西地斯，這一類的地方去。你以為除了你我二人以外，這車中還有些什麼？」

當然我不會知道的。

「那我也不想告訴你，」尼格爾笑了起來。「你也許把手指都燒着呢。我告訴你，那東西是很熱的咧。」

「軍火嗎？」

但是他沒有回答我。他注意着街道，因為在這裏，有着許多危險的轉變。不多一會，我們到達羅皮克了。我們穿過村莊，在沙爾霍西歐和霍爾斯登杜，向左轉變，繞了半個圈子，到達一個直通到海邊的森林。

「這是一個很好的小說題材，」尼格爾說。「克蘭斯忒能夠做的。現在有了通緝我的拘票，我倒真正的自由了。沒有阻遏。我能夠毫不疑遲地擔任最危險的工作。我的那條聯繫資產社會和社會批判的鏈環，現在給折斷了。」

我密切地研究他。他是生長在一個古老的著名的德國家庭裏。他父親的名字，是列入歐洲的每一本哲學叢書的。他的伯父，是羅馬教皇宮殿中的一個高級官員。他的親戚，都是德國

第一流的家族。然而他現在卻在私運軍火，跟國家的傭兵格鬥，而且在他空着的時候，坐了汽車出去遠足。這是一個純粹的德國人！

一點鐘後，我們已到了海邊。經過屈拉芬門特，從它左面駛過寧杜甫和天門杜甫的鹽味的空氣，一直向前，再經過幾個大大小小的漁村，幾乎走到了狹長的荒瘠的沙丘，只有沙草而沒有其他東西的沙丘。

尼格爾停車了。我們走了出來，躺在離開浪濤三碼的沙土上。我們一半隱匿在草叢中。仰望天空，只覺得柔和的微風拂過臉孔。我們沈默了半晌。除了海水的潺潺與汨汨的聲音而外，聽不見其他的聲音。突然我開始說起話來。我把前一晚所聽到的一切，告訴了尼格爾。

『我不能够單獨決定，』我說。『也許我的憂懼是傻的。不過在我一方面，只是把我所探得的消息報告到國外去。在那裏，有着一種阻止戰爭的力量，因為那裏不像希特勒那樣需要戰爭的。我告訴你，這是我個人的決心。但是我單獨負不了所有的責任。也許我真像納粹所說，是一個「破壞份子」；也許我真不明白「血與土」這個成語的意義；也許這不僅是一個成語而已。現在你是有着高貴的血統。你沒有一滴猶太人的血液。你是一個純粹的德國人，在這

一點上，你應該是一個暴風部隊的領袖。我把我所知道的告訴給你。你可以澈底地想一想。你想，是不是應該讓外國都不知道，而我的艱難困苦都是徒費心機的呢？還是當它是最重要的工作，而以爲計劃實行以後，會給納粹以致命的打擊？」

尼格爾用手臂撐了起來；沈思似地瞧着我。「這當然是重要而有趣的事。」他說，「新德國鑄了這一個成語，就要叫你那樣的人去思索啊。像你那樣的人，因爲聽慣了這個成語，於是小資產階級似地談着了，那一定有什麼意義在裏面的。本來，一種獨斷的見解，只要常常提到它，便會成爲很好的理論的。這是值得注意呢。」

他把我的發現，歸納爲一個具體的結論，他的主張大概是這樣的：「從外國的政治觀點上說，希特勒的地位是比我們反納粹的人所設想的更爲有利。假如希特勒能夠說服外國，尤其是英國和美國，那他就可以堅定他的規條——他所採用的手段是無關輕重的——而英國並可以預備在政治與經濟上給他以幫助，他的主要的野心，是由於法蘇間邦交的密切所引起的。蘇俄加上土耳其和巴爾幹在南面，波蘭和邊陲各國在東面，跟法國結成了一個歐洲的大勢力；便是英國，也只能屈居第二了。英國是有着不斷的困難，遭着有關於聲望的危機。以

一個殖民地的權威而言，這情形是不能忽視的。英國一定願意和強盛的德國相合作。至於德國怎麼得到那力量——從野蠻、專橫和恐怖中——那是可以不管的。記着我的話，英國在一年中會非常的憤怒，可是慢慢的會忘記憤怒而與德國締結聯盟，從外國的政治觀點上說，德國不必就憂英國的阻撓。所有的困難，大概都在法國一方面。法國今日的民衆很愛和平——每個人知道的；而且法國人民的愛好和平，比較歐洲任何一國都熱切。這是她所以最感威脅的原因。對於德國的軍備，需要密切地注意的便是法國，這是有着許多明證的。假如德國公開地擴軍，那麼凡爾賽條約的簽字國一定會有舉動。所以法國對於真實的情報，非常重視。而英國、意國以及其他的國家也一樣地熱望着能夠得到正確的情報——以便制止。●你明白那個情形嗎？你瞭解當前的局勢，以及近來的歷史過程嗎？」

『告訴我，尼古爾。你現在告訴我的一切——只是一種推測呢，還是一種確切的結論？』
尼古爾沒有即刻就回答。『那你懂得我爲什麼要肯定地說，我在漢堡，要比在魯納堡更爲有用了——』

『或者在柏林，也是有用的，』我替他接下去說。

但是尼格爾卻搖着頭，鄭重地說着：『在漢堡，要比在魯納堡，甚至比在柏林，更爲有用的。』

我現在明白，尼格爾也被困難的問題，深深地綑縛着了。

當民主黨和社會主義黨開始受到迫害的時候，他們的領袖就計劃着挽救的方法。他們發現要保護自己不受迫害的最簡便的方法，莫過於探到迫害者出現的地點與時間，以及他們所採用的手段。因此他們就把忠實的同志，派遣到警察的行政機構和敵黨裏去。

不久以後，警察和自由主義者的敵黨知道他們的敵人已經混了進來，而在他們四周，產生了一種偵探的制度，來偵查他們一夥中的間諜。這種制度就叫『情報組』。在德國的左派政黨迫成非法以後，這個情報組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機構。當秘密警察或是其他的國社黨組織的工作，彷彿被受害者知道了的時候，情報組必須開始他們的活動。所以從一九三三年的三月到七月，漢堡『國家的特務警察』的總部，曾經解散過兩次，而又重新改組了。

奧杜就是共產黨的情報組長。他和他一組的工作，當然不僅在探聽敵人的計劃，避免警

察的迫害，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組織，專誠監視黨員的行動，偵察懷疑的叛徒。

我把這些事情敘述出來，是爲了它與許多引起德國甚至全世界注意的事情，有着很大的關係。譬如，一九三三年冬天，小巴黎報上揭載着柏林宣傳部所發表的祕密命令，大部份實在都是正確的。這消息，也由情報組傳到了巴黎。

尼格爾又說：『我知道你的英國報是給你弄錯了。你把它們交給我。』

我們握握手。

兩個星期之後——離開外國報上發表軍事訓練和魯克斯底的兵營的消息不久——我聽到一個空前的新聞。一個社會主義者，從漢堡附近的挺進隊職員野外訓練學校，進入了瑪地堡布高的中央軍事學校。從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四年一月，教員而兼惠斯斐烈亞中部赤色戰線的領袖惠斐忒，居然在那個學校裏擔任挺進隊和黨衛團的指導。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二日，挺進隊和黨衛團的高級職員學校，因爲情形混亂而突然解散了，所有的教員都被關進了彼本堡的司令部。但是那個學校又在摩尼喜重開了。惠斐忒——據瑪地堡新聞這樣說——要想逃避『逮捕』便給槍殺了。

大約有六千至八千個挺進隊和黨衛團的職員，都在布高受訓練。沒有一個人知道流血的六月三十日，犧牲了一個無名的共產黨員，歷史上一個無名的英雄。他的名字雖然有，但是早被忘記了。他叫瑪克斯·惠婁忒。

那個星期日的晚上，我們回到了漢堡，雖然疲累，卻已吸飽了海的空氣。尼格爾帶在車子上的兩個手提包，都給寄存在羅皮克中央車站的左面的行李房裏了。

● 讀者還記得的吧，這是說着約當一九三三年四月間的情形。——原著者識。

第九章

這以後的幾星期，非法集團感受到許多的困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從奧杜的一個同事那裏聽到我們的老朋友瑪克斯，有人看見他走進了瑪爾威頓路的褐色房子裏去了。在那個時候，這個國社黨的總部是被嚴密地偵察着的。慢慢的連監視都感到困難起來，因為國社黨徒用盡了各種非常的方法，以及任何毒辣的手段去阻止他們。因此有一個時候，社會主義青年在褐色房子對面，從前屬於民主黨議員的屋子裏，爲同志們租賃了一個房間。他們是非常謹慎的，所以納粹費了許多時間，纔發現了關於他們總部的特殊消息。從那裏得來的結果，他們是發現了。而另一方面也搜索枯腸地想找出他們怎麼會發現這一切。最後他們也知道了，這並不是第一次，原來他們太忽視了明顯的事實，納粹把鄰近幾家的電話，都偷接了。

所以，事情更困難了。他們租了隔開幾條街道上的一間公寓屋子，只是一間閣樓。常常有人在上面拿着很好的望遠鏡。這是很困難的工作，很費時間，卻得不到滿意的效果。因此，後來

把閣樓放棄了，他們只到附近兩條街道的轉彎處守候。於是，像我剛纔所說的，他們不久發現了瑪克斯也是到褐色房子去的一個人。

星期二晚上，奧杜、漢勃忒和我在四季飯店討論今後的應付辦法。他們要我以老朋友的資格，去跟瑪克斯談談，問他事情到底是怎麼的。漢勃忒在八點鐘就走了。他是不能不走的，但是他在第一幕裏上了場，就說他要回去一點鐘。留着奧杜和我在那裏。奧杜很憂鬱。他既沒有進行黨務的錢，也沒有維持自己生活的錢。他本來是靠手和口來活命的，而現在他竟受到壓迫了。各方面他都受到了束縛。他們簡直付不出中央站的講臺費，因為各個比較小些的政黨，照例都在那裏集會的。他需要幾張新的紙，可以到市鎮的另一部分去登記。他的一個同志被牽涉到一件時常發生的挺進隊的兇案裏，已經判決了死刑，沒有上訴的機會——這是在華沙區的漢諾威發生的；他想逃亡，因此要設法一筆款子供給他逃出去。

箱子裏一個錢都沒有！他說，沒有一個人知道到底要化多少錢。但是，費用恐怕是很大的。蘇俄盧布的津貼，哦，恐怕只是一件傳奇而已。他們除了黨員的捐款，一種冒了生命的鋒鏑去得來的金錢而外，簡直靠不着什麼，而那種捐款，數目又是很微的。

「至遲到明天，我一定要到葛林第爾去，」奧杜說。「那麼我必須再到一次磨倫岡街，去找一些新的好的紙。現在我是書記了，可是我不懂書記的事，因此我永遠不會找到一個職業的。」

漢勃忒從戲院裏回來了。我們看出他又帶來了不好的消息。他的鼓舞的神色，完全是勉強的。「我們這樣再等十分鐘，」當他又坐到我們的旁邊，這樣說。「我的同事皮小姐在來了。她在舞臺上告訴我，說要報告我消息。我不能夠拒絕她。在我離開那裏之前，我在走廊裏輕輕地對她說，我不是一個人，還有朋友跟我一起呢。於是她說，你——漢勃忒指着我——『跟我在一起很好，她要說的事情，你也一定會覺得有趣的。她一忽兒就來這裏了。她只演一場很短的戲。我沒有等她。如果你願意，或者我們再搬一個地方也好的。』」

奧杜跟我們分手了，坐到旁邊的桌子去。

皮小姐進來了。她很高興地跟漢勃忒和我都招呼了，可是埋怨着漢勃忒爲什麼不等她。沒有別的話。我們都覺得不安起來。奧杜在他的桌子上側耳傾聽着，覺得非常好奇。我很對他不起。

『漢勃忒來說，你有消息報告給我們呢，』我說。

『是的。你想——我甚至有消息報告給你。他們把斯頓裏城附近的一家印刷所搜查了。』

『就是這一點嗎？』我打着呵欠說。『我想，我們是在聽着一個有趣的戲劇新聞呢。』

『我很抱歉，不過我想你對於我的消息，一定感到興趣的。是的，也許我錯了。讓我們講另外的事情吧。你聽到霍斯比爾館要改做漢堡的國家劇場，且已得到政府批准的消息嗎？』

奧杜在他的桌子上顯着失望的臉色；他想多聽一點。漢勃忒也不像一個演員；他像一個無助的孩子。

『不要哭，親愛的漢勃忒，』皮小姐譏刺似地說。『我不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人嗎？』

但是我干涉了；其實，這也毫無妨礙的。『我想你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我說。『你好像舊式喜劇裏的一個陰謀家，你就講下去好了。爲什麼要這樣旁敲側擊呢？你把一切事情都纏錯了。你看，漢勃忒對於你神秘的提示，發生什麼反響。你把他弄得真像一個陰謀家。你跟我說話，常常是這個樣子的。告訴我，爲什麼啊？我是外國報紙的代表，對於每一件政治新聞都有很大

的興趣；你也想得出來的。我的作用，明顯得很。可是你的作用，我卻覺得並不明顯。所以，請你告訴我們真實的情形吧。」

「朋友，你把事情看得太率直了。也不單是我這樣想。你簡直有點兒天真。」

「小姐，天真的好的一方面嗎？」

「也許是。你最近看到溫特立奇嗎？」

「我遇見許多人，要是我自己的事情，那些人我都不願意看見的。溫特立奇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一張通緝他的拘票。」

「所以你把關於他的事情，告訴給卡依叟先生，是不是？」

「假如你感到有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的。」

「容我代表我的報紙，問你是不是國社黨情報組裏最活動的一員嗎？假如是的，我很想來訪謁你。」

「不要臉！」

『天啊，爲什麼呢？我侮辱了你嗎？我想你是一個國社黨員。』

皮小姐不出聲。我們的談話，突然變得熱烈了。漢勃忒卻很擔憂。他狠狠地看着我。『真的，我希望你的話不要越出了軌範。』

她粗暴地打斷了他的話，對着我看。『我想告訴你一點事情，雖然你也許不會懂得。我是一個誠心的國社黨員。我相信着德國應該有道德與精神的改革之必要和可能。對於達到這一個目標的工作，我願意盡力去做。你懂得嗎？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要是在我們的活動中發現一個敵人，我就告發他。要是我發現那些高尚的人正在墮落到壞的方面去，我就竭力說服他們——』

『你說我嗎？』我問。

於是她發怒了。『我並沒有說你相反的，我知道你是絕對不會被說服的。即使你聽信我們的話，卻也永遠不會加入我們的組織。你是屬於那樣一型的人，對於任何事情都不敬重，對於上帝的創作你會褻瀆，而你以爲一旦被你撕毀以後，也仍然可以并合起來，比以前更好。我很明白你，我覺得你是一個最危險的份子。我已說過許多次了，你——』

「你會跟誰說起過我，我能這樣問你嗎？」

皮小姐平靜一點了。『現在我知道我已把你看透了，先生。那麼，請你聽我的警告！』

『感謝你這樣的關懷，但是我應該告訴你，實在不必警告什麼的。我又沒有隱瞞的事情。你總是那樣想入非非的，皮小姐。你根本不很知道一個新聞記者在這種嚴重的時代所負的任務。』

『是的，但是跟共產黨員到培德爾斯曼印刷所去，設法勒索他排印非法的印件，也是這個時代新聞記者的任務之一嗎？』

大家沈默了下來。鄰近的桌子上，有人在不耐煩地招呼着侍者。我聽出那個聲音。侍者來了。奧杜付了他的咖啡錢就走。就是在那個時候，我也禁不住想到那樣一杯咖啡的錢，可以維持他一星期的生活呢。

『你現在說不出話了，』皮小姐譏嘲地說。

『我在看着他們的跳舞，自己在說：肅靜！肅靜！忍耐一下！』

我在考慮。當然，我可以承認自己是去培德爾斯曼的。爲了我新聞記者的調查工作，難道

我不能到叛黨的地方去嗎？不，在目前這種情形中，我是不能夠那樣說的。也不僅因為當我承認了與共產黨員有着聯絡以後，一切其他的事情都會堆到我身上來；那是無論如何非常危險的。於是最可能的結果就會這樣，我給祕密警察們敲打，要我招供出聯絡的政黨。唯一的辦法是說謊，而且要一直說下去。

但是假如我跟培德爾斯曼對質起來呢？再說謊嗎？那是更無法挽救的。

「我想給你一點忠告，」皮小姐柔和地說。「你只要否認你看見過培德爾斯曼就是了。他能拿你怎樣呢？他也沒有證據啊。假如你跟他對質起來——好，你還是說謊就是。我想更告訴你一點什麼事情。請你忘記我剛纔對你講過的話。我是有點近乎歇斯底里亞的；而且，你知道我也不過是一個演員。我不願意加害於我愛友的愛友。但是你須聽我說。我也知道你與共產黨員和培德爾斯曼的談判，在什麼時候舉行——也許，你自己肯直說出來嗎？你不必告訴我。你也不必煩惱了。我會說那天下午，你是跟我在一起的。還是在晚上嗎？」

我沒有說什麼。

「好的，那是無所謂的。我們承認了好嗎？」

逃避是我第一個思想。逃避吧？我真迷惑了。皮小姐給我設了一個很好的圈套。我又耽擱外面也許有挺進隊員在等候着我呢。

『好嗎？』皮小姐說着，看住了我。她笑了起來。她真美麗，那樣一對明亮的眸子。

勿失時機哪——是第一個要義。時機！

我聽到我自己在說：『你所說的，我真是莫名其妙。培德爾斯曼嗎？我好像知道那樣的名字還有什麼印刷所。我去印過記事紙片的——你看，你真在講些什麼啊？有幾天晚上，要我跟你在一起嗎？親愛的，我當然很願意，很高興的。我預備發誓。』

『你預備了嗎？』喘急的話。

我想，這還不過是一個開始呢。但是我只是禁抑着。於是大聲地說，『任何一點。我承認對於這件事情是一點沒有弄清的。但是不妨事。當一個美麗的女子吩咐……但是要我跟你到什麼地方呢？什麼時候？你一定要指定的。我纔可以照着你的話去做一個案情發生時沒有在場的被告。』

後來她明白了。臉色發白，她暴怒起來。『請你不要這樣癡獸；你根本在開玩笑呢。』

『但是皮小姐，我並不是裝癡作狀的。實在是癡獸咧。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你所講起的事。我可以爲你去一個沒有在場的被告——』

『傻子，傻子，我不需一個沒有在場的被告！你不要那麼傻——你是——聽着，請你聽着。這是你的切身問題啊！』

她把那件事情，又從頭至尾的說了一遍。漢勃忒望着我，頰上全是眼淚。音樂隊在奏着探戈曲；到處都是快樂的燈光；我又迷惑了。

以後的幾分鐘，我今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切都在急遽中發生。瑪莉卿出現了。她的服飾是描寫不出的好看。大概是轉彎那裏的黨分部的女同志們替她打扮的吧。她用鼻音說着話，好像銀幕上的伯爵夫人。她做得很好，傲慢而聰明地注視着我們。伸出手來給我親吻。她跟皮小姐和漢勃忒只是點頭招呼。『啊，有名的時髦的演員呢，』她這樣咕囁着。皮小姐非常詫異，居然對她十分謙恭地說，『太太，那真榮幸。』

瑪莉卿允許跟我們坐在一起。『我找到你在這裏，你這隻閒散的鷹。』她笑着囁語我。我幾乎氣寒了。但是瑪莉卿卻一點沒有局促的態度。『昨天是星期日，親愛的。我們卻沒有找到

你。」

於是我明白了。瑪莉卿是被奧杜派來的。天啊，他再派什麼別人嗎？現在每一分鐘是——
後來怎樣呢？天，後來——？

「星期一，我常常招待幾個朋友的。」瑪莉卿非常客氣地望着皮小姐說。「總是在星期一。我們有一小羣，親愛的——你知道的，都是知識份子，於是我們涉獵——朋友，你們叫那個作什麼啊？」她對着我。

「唯心論，」我插進去道。

「正是那個，我親愛的。我們涉獵唯心論給我來——」她要吩咐侍者去拿白蘭地酒，我便打斷她說：「容我來替你招呼一樣你所常吃的東西——茶裏加一片檸檬的。」

「好的，謝謝你，」瑪莉卿苦笑着，我就吩咐了侍者。

她又轉過了頭去，望着皮小姐。「你對於唯心論有興趣嗎？」皮小姐說她沒有興趣。我看出了這種問話，很使她討厭，但是我很高興；我也看出漢勃忒又慢慢地伶俐起來了。

「每一個星期一，這裏一位朋友——那就是我——」那是我們的嘉賓之一。除了昨天

以外，我記不得他是否失誤過約會。這是他第一次失約呢。」

漢勃忒也串插進來了。「太太，我們的朋友是有政治興趣的。在這種嚴重的時代，也自然會那樣啊。剛纔我們就在討論他一件有趣的政治新聞呢。」

皮小姐向漢勃忒喜悅地微笑着。她實在還不過是一個生手。我又覺得自己已經脫離難關了。但是她又在說着話。「上一個星期，我們的朋友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你肯報告我們嗎？」

我對瑪莉卿望着，好像我不想報告的樣子。「昨天晚上，你作了什麼呢？」

「我常常想調查出來咧，」漢勃忒也望着瑪莉卿，恍惚他想援助皮小姐。「朋友，你說啊，你告訴我們吧。那天是什麼日子啊？」他顯然是毫不在意地問着皮小姐。

「星期一，」皮小姐說着，彷彿疏懈了下來，而那個時候，她也自己覺察了。

我們都靜靜地坐着。瑪莉卿俯下頭去喝茶。我看見皮小姐的嘴唇在翕動着；她在推算着日子。奧杜把瑪莉卿派來，實在是很聰明的。

「一星期前的星期一，」皮小姐說；她的聲音是平直的。

瑪莉卿擡起了頭來。彷彿一個微尊的女人似地重複着最後一句話。「是的，」她說，「那倒有趣呢。昨天他不跟我們在一起，真是很可惜的。」

又是緘默。跳舞的人打我們面前經過了。

皮小姐又用顫聲說着話：「太太，我想問你一個重要的問題。你能矢誓上星期一我們的朋友確是跟你在一起嗎？那時還有其他的客人嗎？他跟你同在多少時候呢？」

瑪莉卿笑了起來。「哦，親愛的，你要跟我這樣一個年老的女人吃醋嗎？當然我隨時可以那樣矢誓的，上星期一跟其他的星期一樣，他是我的嘉賓。不是每一個星期一。是除了昨天以外的每一個星期一。昨天他根本沒有來。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也許——」

「那天還有別的客人嗎？」皮小姐很不客氣地打斷了她的話。

「當然有，親愛的。你好暴躁哪！當然還有其他的賓客。那些常來的客人。除他以外，還有五個同桌的人。像我那樣收入很小的，這已經是不小的場面了。」

「太太，什麼時候開始吃飯的呢？」

「你真想知道一切的詳細情形嗎？但是我是無妨的。現在，我親愛的，你再想知道些什麼

啊？我們幾時開始吃飯的嗎？孩子九點正。其他的客人大約十點半後纔來的。至於會議，當然開始得遲些；大約在半夜了，那些人纔回來——」

「你們到半夜還在一起嗎？」

「當然還在一起的，我的孩子。」

「你不要叫我孩子孩子的。」

「親愛的孩子，你的神經太可憐了！那樣年青的人，是太急變了啊。」

皮小姐驀地站立了起來。「請原諒我，」她說。「今晚演了戲，我頭痛極了。請不要到我家裏來麻煩我，」當漢勃忒表示要送她回去的時候，她又這麼加上了一句。她也沒有跟我們任何人握手，就顛自出去了。

在她走了之後，我們都沈到了椅子裏。我們都不能夠說一句話。我們坐了半個鐘頭，一句話都不說。還是瑪莉卿第一個開口。她脫下了黑色的長手套，扔在桌子上，彷彿一個贏了錢的賭徒。「好的朋友，」她向我喊着。「我做得到怎麼樣？像一個年老的男爵夫人嗎？瑪莉卿這隻老牝馬——做的像她那種傻熊嗎，啊？」

漢勃忒和我都不想再說什麼話。我們要她戴上了手套，要她輕聲說話，替她喊了四杯白蘭地，於是我們三個人走到另一家咖啡館去。我們很審慎地看是否有人在追蹤，當我們絕對沒有看見任何奸細在跟隨我們的時候，我們跟瑪莉卿纔走進了一家共產黨人的酒館。

看見了瑪莉卿這樣的打扮，大家都歡呼起來。我們稱贊了許多時候。可是奇怪得很，奧杜的影蹤卻不見，雖然他早已跟瑪莉卿約好了的，他先等在這裏聽消息。

當我很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裏，一種醉意一種思緒盤據着我，使我把一切的情形，在牀上又復溫理了一遍。他們在培德爾斯曼那裏找到了非法的印件；當然他們把漢堡的印刷所，一家一家地搜查的。在他們查到了培德爾斯曼的時候，他們一定要他說出幾個到過他那裏的重要角色的面貌。當然，我也放在這中間了。他們猜出是我。他們要想證實，便指使皮小姐來試探我。我們卻很容易瞞騙她的，因為她是一個生手，因為她不明白我既沒有離開那桌子，任何人也沒有離開那桌子，我怎麼會偽造供詞呢。於是我就那樣文飾過去了。

正要睡熟的時候，電話鈴聲卻又把我驚醒了。

『我是祕密警察卡依叟。』

『有什麼事？』

『晚安！抱歉得很，這麼晚還來驚擾你。但是當你知道我爲什麼打這個電話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會原諒我的。現在發生了一件有趣的政治的暗殺案。照我所知道的，這在漢堡境內還是第一件案子呢。』

『卡依叟先生，在你報告之前，我已從警察局的印務組那裏得到這個消息了。』

『你這個話真叫我掃興呢。你好像跟我有點怨恨的樣子。不過我現在想告訴你一點消息，在你的同事們——』

『什麼材料啊？』

『我告訴你了，是一件有趣的案子。你到這裏來，無妨嗎？不，只有一兩步路哪。此刻我在大漂坊的辦公處。』

『我高興走一趟的。十分鐘內趕到。不過你知道的，我不歡喜一個人來。』

『天，你太多疑了！我希望你比你的同事們先得這一個有趣的消息。』

「好的，我一個人來好了。不過如果你允許的話，我要通知外國報紙的幾個同事，讓他們知道我到那裏去。我到任何地方，總是這樣通知同事們的。不是打電話，卡依叟先生。好的，那麼準定十分鐘趕到。」

我把電話掛斷了。我必須要想一想。不久以前，厄森地方的一個外國報紙的代表在夜裏給秘密警察誘騙出去，於是失蹤了。對於他的消息，只有這些。誰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準備得愈快，那麼底下街上的人愈來得少。

雖然我很快地穿好了衣服，可是當我走出門去，街上已經有幾個人，好似卡依叟的間諜般地注視着我了。我用了最單純最迅速的方法。走到琴甫斯底的電話處，告訴一個美國同事我到那裏去了。於是我很快地走往另外一個電話機，打給一個瑞士的同事。我很明白，要是卡依叟真的設計害我的話，我便不能夠從家裏打電話出去。不然，他們要將接我電話的人，乾脆地抓去了。但是假若我從兩個不同的電話機搖接出去，他是會佈置得那麼神速的。不過當時我又想到，如果卡依叟真要害我，他可以很簡單地在家裏抓我。但是這也沒有多大意思的。至於要我在路上——那，也不可能，因為警察們都已知知道我被各個政黨所懷恨，因而我每

次外出的時候，總跟着幾個新聞界的同事的。

而且，當我走到大漂坊場的時候，一切的警戒，都好像是多餘的了。我走進了奧杜在好幾天前提給我看的屋子裏去。這一所屋子，就是一個工人在被『審訊』的時候從三層樓上縱身躍下的地方。門口停着兩架飛巡隊的車輛。這是死寂的夜，街上沒有一個人。我走上了三步。

仁慈的光芒與氣息。一間寬大的骯髒的房間，牆上掛着制服，房裏陳設着辦公室的傢具。卡依叟在我通報以後，即刻出來引見。他來會我，並沒有握手。他就引我走進一個毗連着的漆黑的房間，燃亮了電燈。地板上躺臥着一個屍體，槍彈的創口在頭上。槍口的距離好像很近，因為前額的頭髮都給灼焦了。子彈穿過他的頭部，從前面到後面。臉孔給扭歪着。好像並不痛苦。好像他受了突然的驚嚇，又好像他夢着他海裏的鬼怪。當子彈擊中他的時候，彷彿他正在做着夢。他看去至多二十歲；穿着一件深藍色的線衫，領口給扭住的。

『死得好像一條門釘，』卡依叟先生說。只有我們在房裏。卡依叟把頭支成了一個角度，古怪地懊惱地笑着，那是我以前也曾見過的笑容。『那是屈拉勞，』他說。

我把記事手冊拿了出來，雖然並沒有可記的東西。我用鉛筆亂塗着。看着卡依叟望我的

樣子。他要什麼呢？

『給共產黨人槍殺的。』我旁邊那個古怪的傢伙，敵意地望着我說。『他是爲我們偵探的一個可憐的間諜；其實他們可以聽憑他去的。但是他們永遠不敢寬宥一個叛離他們的人。』他咕噥着，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那要輪到我向他望着了。『我想，要是真有人要叛離他們的話，他們也並不怎樣惱怒的。』我慢慢地說。『改變自己的主張，那是允許的啊。人們不是生下來就聰明的；在沒有懂得什麼是好的與對的以前，必須學習。但是，如果有人改變主張，而要出賣他那些一起努力，鬥爭，愛好，與希望的人，那麼，卡依叟先生——』

我沒有說完那句話。卻發生了一點不很平常的事情。卡依叟一直沒有把眼光從我身上移去。兩次他張開了嘴，好像要講什麼話的樣子。於是他望着我，用手捧住他的頭，低語着，『我知道，我告訴你，我知道。我也要被發現……我知道。我做的好事吧，你說，你以爲是不是？你以爲是不是？你以爲是不是？』

死人靜靜地躺着。創口裏沒有血。我判斷不出他。我沒有打攪卡依叟就離開那房間了。

慢地走下了樓梯。當我走到半路的時候，電燈熄滅了。

我木立在那裏，盼望着黑暗中刮來一陣風，我的頭裏響着一種遲鈍的聲音，展開了無邊的黑暗。我木立着，期待着。突然地我感覺得好像期待着——般切的渴望着——休息。

一點沒有動靜。我劃了一根火柴，照見了電燈的旋鈕。把它扳了下來，只有三分鐘的亮光；即刻熄滅了。我離開了那所屋子。街上空寂着；脚步在靜穆中響着回音。走了三步，纔聽到後面別人的步聲。我轉過頭來，在街的那一面，看見瑪克斯正低着頭蹣跚地走着。他並沒有看見我。到了警察辦公處的屋子前，他纔停住了。於是他走了進去。

當我再上牀去的時候，我第一次想，我必須離開，到外國，或者到任何地方去。

這是三月二十八日。

第十章

奧杜在葛林第爾別墅租了一個房間，同居的是一個保險公司的職員寡婦，和她的女兒，那是已經結了婚可是和丈夫分居着的女教員。當時他告訴那個女人，自己是城裏一家糖業運輸公司的二等簿記員；晚上，他往往到親戚那裏去，或者到一個爲某一教育機關主辦的書記訓練班去授課。在那個新的地方，我曾找過他一兩次，對於他適應新環境的生活方式，我覺得異常的歎服。他已好久不修鬚髯，而且加上了一副眼鏡。他又裝了領帶領結，頭髮也剪得短了，你須仔細看他，纔會認得出來。這個改變是實在很不小的，尤其因爲他制止自己不說漢堡話，而說一種書記們慣用的省略綴音的德語。這個變態，只是爲了他的內弟和他的妻。假如他們中間任何一人仔細地注視他，那當然會即刻認識出來的，然而要是在街上在人羣中看到了他，那是一定不會認得咧。他常常勸告我格外審慎一些，而且更深入一些，尤其在排斥猶太人運動的四月一日將近到來的時候。

我不想再敘述這一天。●成百的猶太人，他們的父親和兒子爲了德國而犧牲，他們自己也愛祖國，卻爲了這次的事情而感到羞慚的人，都自殺了。

這是他們能夠提出的唯一的抗議。

四月一日的晚上，黨衛團員在漢堡與亞爾杜那的邊界弗蘭哈特的華區曼跳舞廳裏舉行了一個慶祝會。因爲奧杜堅決地勸我不要參加，所以我沒有去。漢勃忒代表了我，跟另一個同志去參加了。跟他們同去的三個女子，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裏幾個忠實的女人。起初都很順遂的。奧杜的朋友，從賣票房的公爵那裏要來了票子。在晚上，公爵到他那裏去，他們約定了許多條件。奧杜和漢勃忒謹慎地離得很遠；他們各自舞蹈着，戲耍着，享樂着。

半夜，皮小姐突然在舞廳中出現了。最近幾天中，她與漢勃忒間，發生了好幾次激烈的爭辯。這兩個相愛着甚至密切地相依着的人，只爲了政見的不同而把心靈分隔了。他們愛着，同時卻也恨着。他們想說服對方，諫勸對方。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們時常坐在一起，大家哭泣，大家說着黨裏的新鮮的無意識的術語。一時非常悲慘，可是又很滑稽。然而大家想不出別的法。

當皮小姐看見了漢勃忒也在黨裏，她便禁遏不住地高聲尖叫道：「間諜！」

後來奧杜告訴我全部的經過。漢勃忒狼狽得很，張開嘴來想說話。當她叫喊的當兒，她也即刻明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她跑到了漢勃忒的懷裏，想請求他原諒，想保護他。漢勃忒站在那裏，垂着手，神色很可怕，像死了一樣的慘白。於是他們從各方面撲到他那裏來。他們也不能夠證明他是奸細。在審訊的時候，皮小姐很聰明地解釋道，當她高喊「間諜」時，她的意思是說那個可惡的情人，在偵探着她私人的行動。卡依叟就是證人之一。他走到審判官那裏去，耳語了一陣。他笑了。於是審判官就把漢勃忒的罪孽赦免了。但是他又附加了一句話，因為他有危害國家的行動的嫌疑，他應該監禁到保護的看守所裏去。這樣，漢勃忒就給關進了惠特摩的司令部去了。

我想找瑪克斯。他穿着一套黨衛團分隊長制服，可是他雖然穿着那樣一套挺括的制服，卻仍然像他書鋪夥計的短衣似的不整潔。在他說話的時候，彷彿仍然很儒性，仍然不敢望那跟他講話的人。

「我不能夠也不願意幫助漢勃忒，」他這樣告訴我道。「我是一個國社黨員。我是一個被說服的人。你若瞭解我的，就得相信我。我可以解釋給你聽，但是我又何必呢？我深深地覺得

一種正當的——不是一黨的政治，卻是真實的政治的——人生觀，不是智慧而是人格的問題。我是一個國社黨員，我不願意幫助漢勃忒。在我參加國社黨以後，我從未出賣過一個我的老同志，現在我也不願意幫助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我們在各方面都是隔得很遠的。我們是敵人。我們要明白這一點。我承認對你曾經幫助過的。那是對於你個人而已。先是我，不說名姓的打了一個電話到你家裏，後來因為你已出去了，便又打到你常去的一家咖啡館。我跟你談話，且又警告你。」

「那是你嗎？」

「是的，正是我。你聽不出我的聲音，我很高興。但是我也非常後悔，不應該那麼做的。今天，我一定不願意再這麼做的了。」

那一天早上，我也跑去找了卡依叟。「我希望自己能夠對你有點兒用處，」他說，「但是我不能夠。我是很爽直的，我知道漢勃忒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青年，他以後還是要為他們工作的。抗辯也沒有用處咧。所以把他關在惠特摩是很對的。不過離開了這個——我們也想到了皮小姐的很多的工作。我很爽直。要是漢勃忒恢復了自由——但是於你也沒有什麼。請你認

清我的地位。』

在司令部裏，漢勃忒被派到外面做工。他在壕溝裏做着苦工。他並沒有叫苦，因為他是一個壯碩的傢伙，所以這種工作並不叫他疲累。到了五月，人員撤換了，本來當着司令部衛士的漢堡挺進隊員，給魯納堡的年青農民來代替了。於是漢勃忒被派到廚房裏去。他是一個漂亮的青年。魯納堡的挺進隊員對他所做的事情實在不能夠描寫的。只有謠言散播了出來。他們是驚人地可怕的。當謠言也傳到城裏的時候，魯納堡人都給解散了去，替代他們的是亞爾杜那的鋼盔團員。有一天——大概是五月十八吧——當漢勃忒削着馬鈴薯的時候，他開始說着狂話了。夜間，他們聽到他尖叫。第二天清早，他被帶走了，沒有人知道他被帶到了那一個屋子裏去，他卻慢慢地死了。

五月底，皮小姐參加了非法的共產黨，她跟七個演員和兩個漢勃忒同監犯人的妻，爲丈夫所請，一起去向漢勃忒致最後的慰問。

我已好久不見約翰了。我簡直也不常想到他；那些日子，要想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時常有

些生疏的嘴臉，值得我們去留意。國社黨徒也採取了共產黨人的方法。情報組裏的優秀官員，往往交換着工作的地點。更爲了其他的理由，常常會發現生疏的臉孔。這城市的整個的社會景象都變了。

首先地，那些往往是年青而無知的國社黨領袖，沒有艱苦工作的性情，也抓不住和平的民衆。而另外一些人，卻很精明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譬如，當希特勒的代表高甫曼在做着敗壞名譽的事情，李希忒警察長和從前當過印務組長現在當着評議員的亞倫斯都很精明地利用着他們的地位。現在大家希望着亞倫斯成爲漢保的真正統治者了。他是那個懦弱縝密卻很誠實的市長克洛格曼的祕書。亞倫斯掌握着全城的政務。便是在柏林，他也有着很好的名聲。

四月底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亞倫斯，他跟幾個挺進隊員在走着，在他們過去的時候，我很驚奇地發現了其中的一個挺進隊員無疑地是約翰，親愛的老約翰！我走過了他們，當然顯示出一種目瞪口呆的神色。他便向我霎着眼。

我急轉到奧杜的辦公處。奧杜會心地笑了。當然囉，約翰加入國社黨，已經有一個多月。

然他「活動很幼稚」但是他不久就會受獎勵的。納粹也知道一個好人的價值呢。

我知道有半數的絕對可靠的同志，被派去參加國家黨和國社黨的組織。

『對於國社主義的革命』奧杜說——我再來饒舌一下，這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底的事——「只從外鑠，是不會澈底的。便是想作那樣的嘗試，也往往會失敗。我們的革命必須在敵人的武力破滅以後，用了大規模的暴動的方法，纔會成功。我們的工作，是悠久的。當這個民族，這個廣大的羣衆，還相信着希特勒能夠而且會實踐他的諾言，或者對於任何人會做一點事情的時候，我們就不必希望什麼的。直到民衆們對於以前的預言者發生懷疑，而傾向於新的人物時，我們纔能夠完成這革命。這是希特勒在過去勝利了的緣故，也是他將來會勝利的原因。在世界史中，有着真正稱得上法律的法律。」

奧杜停住了，望着我。他再想說什麼，但是他猶豫着。我知道他要做什麼，便不用遲答來挪揄他。我告訴他說，「你的孩子們很好呢，而寶拉也給予你愛情。她現在已明白，這是最好的方法了。」

「她明白了嗎？」

「她真是明白了！」

實在，寶拉是一點也沒有明白呢。第二天下午，我去找她。她一看見我，手裏的杯子即刻摔了下來；她的手也顫慄着。

「寶拉！寶拉！」我把她拖到一張靠背的椅子裏，說：「爲什麼啊？」

好一會她說不出話，然後清醒了過來，輕輕地說：「每一個時候，每一個時候，我想你會來告訴我，他已被捕，他已被殺，他已死了。每一個時候！每一個時候！」

「但是那也太傻哪，寶拉。你應該鼓起勇氣來。像你那樣一個老革命份子奧杜很舒適呢。他給予你愛情，而且也常常問起孩子們——問的次數太多了，使我沒有那麼多的消息告訴他。」

「是的，這裏還有孩子們，」寶拉柔和地說，語氣中洋溢着矜持。「他們正在成長呢。沒有幾天以前，一個孩子回到家裏來說——」於是她講着孩子們的故事。這個革命家的妻，她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她的日子是永遠沒有快樂的；現在更變得空虛了。丈夫並不在家裏。她是她

的生命與光明。除了他，她便沒有第二個人。而他又不在家裏。他在別的市鎮上。這是我們告訴她的。她是孤獨着。孤獨着！

她突然說：『是的，我弟弟現在來得更勤了，因為我常常很寂寞。而且奧杜已不在家，也無妨了，是不是？無論如何，他總是我的弟弟啊。他是我的小弟弟。我是他的大姊姊。我年紀比他大。哦，不，我現在並不年青了。他來的時候我總是這樣想，假如我還是一個年青的婦人，奧杜總不會離開我的吧。』

『天啊，這是什麼話呢！我真是憤怒了，我承認我是憤怒的。奧杜——那個最好最誠實的人，世界上最慈祥的父親。她怎麼能夠說出這種話來呢？而且我也不高興聽她說起時常遇見她弟弟的事。關於奧杜的下落，她說了些什麼呢？』

寶拉煩惱着。她沒有跟他說多少話。他也只是對她說，如果她希望，他可以幫助她找回奧杜的。但是當她說起奧杜現在不住在漢堡，而住在另一個市鎮的時候，他說他不相信。有一次他又問她奧杜出走到底爲了什麼事，她也不能夠告訴他。第二次他進來，一踏進門口就說奧杜一定仍然在漢堡；他簡直可以證明的，並且他這樣子把妻子拋撇在家裏，卻又並不跟別的

年青女人鬼混的事，實在是萬分的錯誤。這是第一次使她自己覺得已不再年青了。

我看見了那個聰明的黨衛團員跟寶拉，她丈夫和她弟弟所玩的悲劇。我趕忙向寶拉告辭，因為我要跟奧杜去商酌。

然而直到六天之後我纔看見了他。在這六天之中，發生的事情又是很多的。

星期一，四月二十四日，爲了一點事情，我不能不往柏林去住些時候。在餐車中，展開了一個壯麗的場面。德國餐車的每一張桌子上，放着一份小小的刊物，都會報。那天多了一本有趣的增刊。侍者們在旅客都已人手一編之後纔發覺了出來。這本增刊是一本小小八頁的冊子，大約手掌那樣長。封面上印着一個死人的照相。然而那個死人能夠說話，雖然他永遠是啞着的——比活人更說得響。

侍者們的暴怒是很可笑的。他們的頭目，滿臉掛着汗珠，向每一個旅客去懇求，要他們放棄那本『遺憾的增刊』。他訴說着這是誰跟他玩的『愚人的詭計』。對於餐車上的旅客，這一幕倒是他們所歡迎的娛樂。我注意着大約三十個旅客中，只有三四個人交還那本增刊。但

是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說他們要讀一讀它，這是很有趣的。雖然每一份報紙中，分明有着一本增刊，可是旅客們只是乾脆地否認，只說他們一份中並沒有什麼增刊——沒有一點沒有什麼啊，那侍者頭目在找些什麼呢？我注意着一個灰髮的莊嚴的貴婦人，以及爲同伴們稱着『閣下』的一個高級官吏，許多傲慢的漂亮的女子，以及幾個挺進隊的領袖，他們都否認檢到這一本增刊。在那個時候，一些受到箝制的德國報紙，已經相當地不被人家信任了。我們外國通訊員都知道外國報紙在德國的銷數，怎樣急激地增加；有時候竟然有五十倍。民衆們都想知道正確的消息；甚至敵人們所發的確息也比受到箝制的德國報紙上的假話，更加可取得多。

以後的一兩個鐘頭中，漢堡與柏林間的特別快車的盥洗室，不斷地被人佔用着。那些傲慢的女子，他『閣下』灰髮的貴婦人，和挺進隊的領袖，一個接着一個地溜進了盥洗室，去安靜地讀完那本非法的冊子。

我也隱僻地讀完了它。那一次我跟社會主義的青年們見面，聽他們說要印行出來的，正是這一本書。封面上顯示着畫師威廉·第克生的遺容，那個被警察『審訊』的短小勇悍的

人。他被拷問着，他們要逼他說出社會主義青年埋藏軍火的地方。他的雙親禁止揭啓棺木。但是有幾個他的同志祕密地掀了開來，爲他照了一個相。現在這個臉孔就最後一次地瞻視着世界，血肉模糊，鼻子擊破，而頭骨也給折碎了。我注意那些讀完了冊子走回來的人。他們的神色是茫然的；他們不向人家看一眼。

這本非法冊子的效果，倒是相當地鉅大。目前在德國的幾千份非法的報紙，都是基於這種反抗的性質而創立的。德國人就歡喜看一份形式與內容兼顧的報紙。

結果是這樣，國社主義對於非法文字之禁止，需要更大的代價，直到希特勒在兩個月中拒絕簽字的戈林的血的法律頒布以後。那個法律是這樣說，任何一個散布非法文字的人，抓到了立即槍決。任何一個散布那種『仇視國家』的文字的人，也應該判處死刑。

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星期中，許多德國青年都在劊子手的手裏犧牲了，而他們的罪名，只是不相信國社黨的統治是一種幸福，一種恩典。德國的那個行刑者，瑪地堡的一家洗衣作工人格羅勃婁，辭去了他的高貴的職位。他說神經受不住了。可是有人還應該鍛鍊得堅強一些；戈林的神經還沒有受不住呢。

回到漢堡以後，我常常在車子裏看到尼格爾。他每天變換一個花樣，而每一個新樣子總比上一天的更傲慢。他簡直變成一個執帚子弟了。他咆哮着經過我。我卻不知道他有沒有看見；他總是那麼匆忙的。有一天，我在十字路上看見了他，那裏他是必須要停車的，因為那時正開着紅的燈。我注意到那個跟他在一起的旅客——戴着護目眼鏡，穿着皮裝的——正是溫特立奇。

他們怎麼會在一起的呢？我禁不住思索着，跟他們上了車。燈光轉成了黃色，而後又綠色。尼格爾好像要說什麼的——也許他想反對吧——卻不能不開車。他直向前去了。

他駕着一輛沙杜·格利斯勒的六座的跑車。我就坐在他旁邊。背後堆着許多的包裹，旁邊坐着溫特立奇，全給遮掩了。尼格爾不則一聲地開着車；甚至在我跳到後面去的時候，他還不開口。他到中央站，招呼了腳夫，要他把一包東西送到左邊的行李房去；他自己等在車子裏。直到他從腳夫手裏接過了票子。於是他到丹都車站，也照樣地卸去了一包。此後，他更增加了速率。過了愛爾培橋，開到漢堡，又從那裏開到了一個小小的郊野。他顯然地是認識這個地方。

的，因為他經過許多曲折的街道，沒有問過方向呢。溫特立奇瀏覽着外面，看看有沒有追蹤我們的人。

我們轉了許多彎，開足了馬力，後來沿着一家新的工廠背後的長路走着了。他撇了兩次的喇叭，在一個開着的棧房前停車了。兩個人走了出來，不說一句話，把四個大包裝到了車上。我們回來了。還是緘默着。新的包裹也像先前一樣地運到了站上。於是我看見溫特立奇把票子封在信封裏，到第二個郵筒中投寄了。

『你都弄妥了，』當車子經過了斯底芬潑拉滋後，尼格爾微笑着對溫特立奇說。『現在我們必須找尋一塊大石頭，繫住我們這裏一位朋友的頸根。』——指我——『然後連石帶人，一起沈到水底去。他幾乎把全部事業都知道了。』

『好的，假如我真要那樣被弄死的話，你應該告訴我這些傳單，報紙，和小冊子現在運到那裏去，好不好？那一個人在站上收受它，他們又怎樣拿去分發呢？』

但是他們誰都不出聲。我要等着，直到幾星期後纔從報紙上得到了消息。

我應該承認當我從報上讀到了溫特立奇被捕的消息時，那種煩惱的心緒，實在是少有

的。你以為誰把他抓住的？不是別人，卻是機敏謹飭的裝着木腿的梅歐先生。

那是一個驚人的故事，洋溢着戲劇的奇遇。國社黨情報組裏藏着一本書——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以後會知道的——裏面記載着詳細的經過，時間，地點等等，在發現了什麼非法的事情或者預備監視的時候。這裏有着一大批被疑為非法活動的激烈份子的名單，然而找不出什麼證據。所以他們就被嚴密地監視着。其結果，他們發現了那些被懷疑者曾經在站上，車待車室與月臺上見過的。也許是相同；也許並不是。

梅歐那個『國社黨情報組人事股』股長，便集中注意着車站。他自己參加了鐵路局。這是國社黨員比他們的政敵更有利的地方；他們不僅得到了跟蹤的方便，而且還可以獲得地位與金錢。他起初當收票員，後來當腳夫，最後竟做了助理的站長。他覺得那樣的路線是走得對的，但是他還不明白儘在車站裏面和車站附近徬徨着的理由。

一天，有一輛汽車從斯底芬拉滋開到丹都車站來。車裏坐着兩個青年，放着一個大提包。梅歐跑到兩個不平常的客人那裏，他們便吩咐他把這件『貴重的行李』小心地搬到柏林特別快車上去。可憐的梅歐！這纔是真正的虐政哪。他不能不把那隻重笨的提包肩到了車

上。滿臉是汗。他已撕破了衣服，弄傷了手，呻吟着，喘息着。當他最後也上了車，卻又被吩咐把那提包拿進房間去。提包的主人們彷彿很興奮，而且一直用眼睛釘着他。他很煩憂。費了好大的力量，纔把東西拿進了房間。但是他發誓不讓這兩位先生平靜地旅行了。他收了錢，被他們支使出來了。

他就留在車上，迅疾地躲到一個盥洗室裏去修補他衣服上的破綻。在車子離開漢堡以後——第一停是在惠登堡，兩小時的距離——他走到送那提包的二等房間裏。兩個旅客都不在，他真暴跳起來；他們一定在開出中央站以前就下車了。他激昂地將提包打了開來。當他最後發現了這中間既無軍火，又沒有什麼鬼的機器，卻只有一大塊花崗石的時候，我想他的臉色一定是難以形容的。在那石塊上，用紅漆塗着的是這幾個字：『送給我們親愛的間諜梅歐先生，作爲他與無產階級的活動合作的酬報。共產主義青年團謹贈。』

梅歐即刻趕回了漢堡。他也不要以後被同事們看見的時候，總是給他們所訕笑。他們都知道這個笑話的。他後來調到了斯頓囊城站，戴着一頂紅帽子，在月臺上踱來踱去了。

有一次他偶然地告訴一個旅客，說開車要脫誤鐘點。那旅客就去報告站長，於是梅歐被

召喚去受斥責了。正在這個時候，溫特立奇又開車到站上。他招呼了一個脚夫，把他的包裹送到左邊行李房去，自己仍然在車中。脚夫就往辦公處去了。

梅歐走下了階沿。有人要他到『老頭兒』那裏去服藥。因此他穿過了大廳，走到了外面的方場上。正在那個時候，脚夫把票子帶了來。溫特立奇靠在車窗口，預備給他力錢。卻被梅歐看見了。梅歐便跳了上去，拔出了手槍，瞄準溫特立奇的頭部。溫特立奇把手伸了起來；那時候他所想到的只是左邊行李房裏一捆非法的文件。他把雙手舉在頭上，一會兒把手指伸開，一會兒又合攏。脚夫看着他，懂了他的意思。梅歐的視線始終沒有離開溫特立奇，現在卻轉過一點來說，『祕密警察。脚夫，趕快把從這個傢伙那裏拿去的東西送回來。』

脚夫囁囁着，『先生，好的，』於是蹣跚着去了。溫特立奇陷入了恐懼的狀態；臉上儘在淌着汗珠。脚夫回來說，『十一點十分；三點十五分；九點二十分，但是那是特別快車，票價更大呢。』梅歐暴躁地嚷，『你咕噥些什麼鬼話啊？要是再不說，我要把你抓起來，我告訴你。你確會從這傢伙那裏拿去什麼東西的。』

但是脚夫又看着溫特立奇的頻頻開闔着的手指。那是暗示着錢。他又粗暴地重複着他

的話了。『你這麼厲叱着像我這樣的老人，是很不對的。我是一個年老的挺進隊員。我又沒有從這先生那裏拿到什麼東西；他只是問我到漢諾威，到斯丹達爾支線去的火車的時刻。』

梅歐還沒有怎樣瞭解漢堡人的性格。他相信那個腳夫的話。但是他招呼了兩個警察把溫特立奇押走了，自己跟在他們的後面。他很自慶幸着，爲了許多的理由。不僅因爲溫特立奇被認爲『暗殺秘密警察分隊長卡依叟的兇手』而已發出了拘票；而且爲了他是公認的社會主義青年活動的重心。

結果呢，我現在可以說溫特立奇是沒有被警察羈押多久的。抓進去的那一夜，他從分局移解到總局，到下一個星期一——那是五月一日的上一天——又被解往中央監獄與富斯布丹爾的司令部。在路上，他竟逃跑了。怎麼逃跑的情形，至今我還不明白。對於這一件事情，官場方面不肯發表什麼話，雖然我用了種種的方法，費了許多的時候，還是得不到什麼。社會主義青年們，他們用了犧牲許多生命的突擊，救出了他們的領袖，自然也不願意又不能夠講起這件事情的。無論如何，溫特立奇是逃走出來了。至於運送非法文件的方法，幾乎被國社黨發現的，卻仍然是一個秘密而已。

在溫特立奇最後被捕以前，我又跟他見面談話了好幾次，現在還有一句關於他的話。沒有人知道這個怕羞緘默的青年，想到自己竟有領袖與組織的天賦的才能。在勞工階級的運動中，需要領袖的時候，自然會產生出領袖的，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在需要之前，永不會產生；同樣地，也不會產生得過遲的。

● 我把這一天的事情，都描寫在我的小說祖國裏，完全根據了事實的，那部小說，在英國出版的時候，改作屠殺——在德國——原著者識。

第十一章

我得到一個消息，說是蘭白已在五月一日——這是大家懦怯地期待着的日子——前一星期到了漢堡。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從前社會主義者的代表皮特曼，要他給我排定一個謁見蘭白的日子，因為蘭白常常住在他家裏的。我想皮特曼不會阻撓我，可是當我在一兩天後接到這樣一封回信的時候，我卻驚愕起來了：

即使在今天，也請不要忘記我是決不會否認在我艱苦的青年時代，曾經遭受到多次的障礙，而為社會主義奮鬥着的，同時，我也不會否認在近幾年中，我們老同志都犯了許多錯誤，因為我們是老了，好像不必再去奮鬥的樣子。也請你不要忘記兩年以前，我還有勇氣——那是不必過多的——宣佈我們年老的社會民主黨員，變得太壞，最好我們能夠重新從黨員做起——在年青人的領導之下。先生，當我這樣宣佈以後，你以為像蘭白那樣一個商業聯合會的主要份子會跟我同住嗎？在我這個宣言發表的時候——我把這意思告訴許多的黨員——聯合會的人即刻跟我斷絕了。所以，你千萬不要以為蘭白會住在我家裏的。

接到這封回信，我就跑去訪見皮特曼，在國會選舉時，他是社會民主黨的漢堡候選人，他在最近幾個星期中，變得格外蒼老了。我跟他說了許多話。他苦笑着，說這是一件足以表示同情的事情。任何一處地方，無論他向那一方面去，他所遇到的只是敵意。老頭兒說着這話的時候，流露出控訴的眼光，彷彿要從我那裏得到一個生命上的悲慘失望的解釋。

『我要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最後這樣說。『德國、德國的文化，和一切我們的利益的命運，完全信託給你與你的同志們。可是你們把一切都攪壞了。』

『天啊！』老頭兒說。『我們做了些什麼？在我一生中，自朝至暮，竭盡我能地工作着，而且都依照我的良心。你還要我怎樣呢？難道你也跟旁人一樣，只是一個無意識的辱罵人家的人嗎？』

『可是，皮特曼先生，你想瞭解我們嗎？那我以為，德國所發生的事情，應該由你與你的同志們完全負責的。德國人選舉你，是要你實行社會主義啊。你知道，在你和你的同志們被選以前，有多少工人，喪失了他們的生命與自由。你有了權勢。社會主義，人類正義，民主主義，那是你的主張，那是你的指揮者。因為你答應大眾可以實現這一切，你纔得到現在的地位。可是你做

到了沒有？你從沒有走向社會主義，卻是傾向着詭計哪。你把授與你命令的東西，誘陷了，皮特曼先生。當我平心靜氣地觀察着，當我想到誰選舉了你，以及你怎樣對付你的選民時，我覺得只可以用一個適當的字，那是——背信。」

「但是我們有很好的意旨咧。」

「我並不否認你與一兩個旁人確有很好的意旨。但是要估計一個政治家，並不看他的好意，而要看他的成就啊。像你，既不能辯解，也無從寬恕的。我們失去了家。我們的朋友被殺了。所有我們的評價，都給破壞。外國人輕視我們。這是你們的罪孽；你們的罪孽！」

大家沈默着。老頭兒坐在靠背椅子裏；膝上蓋着一條毯子，雙手放在上面。

「你還年青，」他最後這樣說。「你說了這些難聽的話。你是對的。我們失敗了；我們也許會更加謹慎的——假如我們明白的話；但是我們竟沒有明白。當你警告我們的時候，我們還不相信你。我們只是見樹而不見林。當你們中間的一個，問我們下年度的工作計劃是什麼，我們就說，「未來的工作程序是如此如此的。」」

「所以我們坐在這裏。我也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我突然變得衰老了。假如我走到街上去，

女人們會指着我對孩子們說：「瞧那個人；他是你現在沒有父親的道理哪。」我能夠說什麼呢？除了我現在已經衰老之外，就沒有什麼了。我能夠做什麼呢？我很願意做一點兒事。我問朋友們。可是他們說，不願意再跟我做事情了。他們說這個世界是卑劣的，可怖的。他們用棉花塞着耳朵。但是我——我告訴他們關於攜帶着孩子的那個女人的事；那是在亞爾杜那的大阿里。我很想做一點事情。有人告訴我，那些年青的黨同志正在開始一種新的運動。他們要——不，他們正在做着我們年青時代所做的事；他們冒着生命的鋒鏑，在暗地裏鬥爭。我告訴他們，「我跟你們在一起。」

他停住了。「他們怎樣回答啊？」我問道。

那老頭兒便冷冷地笑了起來。他的手，懼怯地緊握着。「你爲什麼要問我這個呢？你已知道他們怎樣回答了。而我，現在卻坐在這裏。」

「但是你可以——」

「我能夠做什麼呢？我連一件事都不能做。我可以出走，縊死自己，槍殺自己，可是我還沒有那樣做，他們或許已經進來了。但是那也是不好的。他們會高興。他們又有了一個烈士。不，那

是不好的。所以我寫那封信。給我以前的朋友們。你懂得嗎？」

「他們怎樣回答呢？」

「朋友，他們的回答是我一生中，最惡劣的遭遇了，他們都是鬥爭時代的老同志。他們竟一點沒有我們曾經結合過一起的意思。我們在二十來歲的時候，就已經在一起活動了。我們是年青的工匠，細木匠，馬鞍匠，屠夫，和裝釘書籍者。我們是工人。我們是在各個市鎮上流動的。我知道德國的每一個監獄。那是在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的律法的日子。當我從監獄裏出來，我就走到——當然是用腳走了——最近的一個市鎮上，遍訪僱主，直到我找到一個給我職事的人，再做工作。晚上，我們是自由的。這裏密談，那裏也密談，信札，粗話，漫漫的夏夜，直到最後我們把社會主義者的社團組織了起來。於是警察們得到了風聲；他們把幾個人抓了去；監督愉快地癡笑了；他早已都知道；警察也愉快地癡笑了。在那些日子，這是很好的事情哪！於是在監獄裏囚閉了三星期。唉，就是那種日子！我們演講，像鬼一般地鬥爭。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沒有手槍的傷口，或是刀砍的創痕。我們一點沒有怕懼。然而在那時候，我們都沒有了家，沒有了愛人，沒有了上帝。我們不是爲自己而生活，卻爲我們的理想，以及世界的未來。後來，我們得到

了國會中的首席，可是我們從沒有休假，或者像旁人似的安靜地生活——我們寧願被黨遣往冷僻的鄉村，好像到大市鎮的陋巷中去一樣的高興。我們到醫院裏包紮了一百次，而第二天卻又在工作了。直到我們勝利為止。」

皮特曼緘默了下來。我在苦苦地思索，你已失敗了一百次，卻從沒有勝利過。他突然改變了語調，這樣說：『我常常覺得，這個充滿着鬥爭，生存，與死亡的那些日子的社會，只把我們的同志，永遠團結了起來。現在，他們把我，甚至把所有的人，陷入了困難的境地。』

『你的信沒有得到回復嗎？』

『他們大多沒有回復我。有人把信退還了，要求我以後不要再寫給他們了。有人卻回復我的——而且用掛號寄了來——他們說以後決定不再擔任政治的工作。』

『聯合會的老的領袖呢？』

『他們是最壞了。也許因為他們有許多感激我的理由。他們是最壞了。我猜想大概因為他們太跟我接近的關係。我的工作佔去他們的一半。而且提議將蘭白推薦到現任的地位，也正是我咧。』

「你嗎蘭白——像他那樣一個人嗎？讓他做德國聯合會的主要組織的獨裁者嗎？你不是出之於良心的啊？」

「還有約翰·歐倫泰，那個社會民主黨的長官，蘭白的漢堡的代表，同盟的主席——」

「他怎麼呢？」

「他把我的信交給了秘密警察。」

我離開了那個一度做過國會選舉的，社會民主黨第一個候選人皮特曼。我以後就不再見到他。三星期之後，在列格林霍森附近的鐵軌上，發現了他腦袋已經破碎的屍體。雖然他下葬的日期和時間故意保守了秘密，但是漢堡的工人卻默默地集合在奧爾杜甫的墳場。而且，不顧他們所接受的恐怖，悲慘與流血，一個青年——那是一個年老的工黨領袖的兒子，後來給人家暗殺的——突然吶喊了：「我們不會忘記這一切。讓我們期待着。未來的勝利萬歲！」在秘密警察的暗探們發現了這裏已經撒下了種子即刻會滋長而收穫之前，他已經在人羣中消失了。

我終於找不到蘭白。可是一家美國報紙的代表，一個美國同事受了我的請託，跟歐倫泰談過一次話。歐倫泰很懇切地告訴他。商業聯合會的領袖早已與政府進行談判了。在最短期間這個組織必須解散，而組成一個新的包容國社黨員的組織。他說這計劃原定於五月一日執行，但又恐怕這個工人的組織參加了那天政府的大示威運動，發行糾紛，所以展緩了。

爲了我找不到奧杜，所以我寫信去報告他這個消息。同時，我還要求他報告我五月一日共產黨預定的計劃。我的同事真是一個商人，他告訴了我訪問歐倫泰的消息，卻要我回報他『一個有趣的故事』給他的報紙去發表。在那些日子中，新聞記者也都非常懦怯的。他們微聞那個時候的非法反抗運動並不集中在柏林，卻是集中在漢堡。其結果，全部的外國記者，尤其是英國與美國的，都到了漢堡來。他們想優先地採訪到新聞。而五一那天，大家更期待着一點引起興趣的舉動。對於國社黨員從他們敵人那裏偷竊了這個紀念日的無恥，大家表示着異常的惶惑。國社黨員劫到政權的時候，曾經擊過五一的紀念。可是，這個馬克斯主義者的無產階級的紀念日，現在竟被希特勒提倡爲『國家勞動節』——對於德國勞動階級並不

實惠的敬意。

國社黨預備了很大的集會廳，講臺，和遊行的路由。耗費了幾百萬的馬克——哦，不是爲了饑餓者的麵包和馬鈴薯，卻是爲了烟火！

非法的活動也是緊張着的。他們不願恐怖，集合了起來，組織了起來，又整頓得很好。他們有了極不平常的表示，『我們還是在那裏。』但是這種事情，決不是生命與銀錢所能換取的。

我給奧杜的信，還沒有接到書面的或是其他性質的答覆。我很不安，所以到葛林第爾別墅去問他的房東太太。那個教員的寡婦說，不見他走近這屋子，已經有許多日子了。他在德國書記聯合會裏幫助他們籌備五月紀念會。所以他往往從辦公處出來，逕往好爾斯丹城去，有時候工作得晚了，不便回家，就在那兒宿夜。

『謝謝你，』我說着便走開了。

星期五早晨八點鐘光景，電話鈴響了。是龐貝的卡爾斯丹特貨棧裏打來的。圖書組即刻要我去開會。他們想規定另外一個著作家節日，在那一天上，漢堡的著作家都親筆簽字而發售他們自己的著作。這一件事情，我是否要認爲當務之急，而即刻趕去參加討論呢？我說我可

以去的，於是在一小時之後，我已到了龐貝，在五層樓上的會計室裏，有人來迎接我，那個人，經過了相當的困難，我纔認出是奧杜。他轉身就走，我便迷惘地跟着他。

奧杜一步步的走着樓梯，我也跟着。突然我們走到了屋頂花園。那裏是空着的。在欄杆邊，卻有三個女人正在眺望着野景。奧杜慢慢地走過了她們。我停住了，燃上一支烟。她們卻在疊着一大堆書，已跟人體一樣高了，那些書本，都是從她們還捏住了的竹篾裏拿出來的。她們把書本堆在屋頂的邊緣，一本疊着一本，每本只露出一半，彷彿要阻止牠們完全掉下去的樣子。燃上了烟，我又開始前進。緊跟着奧杜離開了屋頂花園，我看見那些女人也都下去了。到花園裏來的其他的客人，都沒有注意到這個。

奧杜和我在一個電梯中下了樓。到了外面，我們招呼了一下，便急急地轉了彎，走上漢堡的街道。這是早晨九點過後，漢堡的街上，充塞着汽車，自由車，電車和行人。突然這整個的人羣靜止了下來。我們聽到幾千個喉嚨裏咆哮出來的呼喊。汽車和電車都給擠住，停在路中。成千的行人，彷彿受驚的鼯鼠般地急急地走着，從上面，卻飄下了許多的傳單，在空中蕩漾，好似連漪，直把最後一張都飄下了地。

於是飛巡隊到場了。像閃電一般地，街上的人羣都給掃清。行人們退避了去，逃進屋子，鑽進電車，緊貼到牆腳底下。一兩個人把傳單摔去了。貨棧的鐵門，丟然倒了下來。在這裏面的人，統統都給抓去。

警察們工作得很敏捷。顯然是很熟練的。街道用繩索攔了起來，阻止通行。有人逃得慢些的，就給從頭到腳地搜查一遍——男人，女人，孩子們。給攔了一兩拳，有人便尖叫了，小兒坐車裏的東西，拋棄在路上。有人給抓住時拿着傳單的，便在頭上給擊了一兩下；有人跌倒了，好一會纔回復過來，立刻爬起，搖搖欲墜的逃了。

十分鐘以後，交通恢復了常態。警察卻還在貨棧裏忙着。那裏的搜查是更嚴密的。每個人必須自述生平，否則就給橡皮棒子敲打着趕進警車。

我就走進了對過的小咖啡館，當奧杜爲那三個拿着空籃的女人要了半個品脫啤酒的時候，我就搖了一個電話給那美國同事，告訴他這個故事。正在說着，奧杜走到電話室，聽着，跟我耳語了一句，『約他明天晚上六點鐘在教堂外面。』我就接着說了。那個美國人非常興奮，要知道事情到底怎樣。我笑着，告訴他如果去了那邊，一定會知道的。

我也請他在敘述星期一的遊行隊時——現在是星期六四月二十九日——不要忘記寫這一大羣英勇的人爲什麼會聚在一起。我從各處的工廠裏——在那些地方，這事情是很普遍的——知道所有的僱員和工人都被逼着參加遊行的。

（這是國社黨得到羣衆去參加遊行與示威的原因。每個人都可以探聽得到的。在德國工廠的佈告板上，往往貼着這樣的佈告：

星期二要舉行示威運動。上次示威時，尙有某人某人某人等沒有參加，早經佈告。假如此次還有無故缺席的僱員；工廠細胞一定要給審問，而且我們要考慮這些對於新德國的示威運動不感興趣的同事，是否要繼續任用，須知失業的人尙有好幾百萬，都可以任用咧。

這個佈告是貼在漢堡的勃魯姆與伏斯工廠的佈告板上的。）

那個美國人把電話掛斷了。我便走回桌子去，而與杜與兩個女人卻早已走了。

第十二章

這是星期六，街上擁塞着人羣。我從人羣中擠回寓所來。禁不住想到成千的勤勞而有思想的人，多麼容易地犧牲在國社主義之下。他們沒有一個人需要戰爭，然而都要參加亞陶爾夫·希特勒的戰爭了。這種鬥爭，在歷史中常常可以發現，所以一般屬於軍事工業的哲學家們，照例要說這是必要的事實。

於是我們又出去應戰了。那些擠塞在街上的艱苦的匆忙的女人們，會死在礮彈的窟窿裏；男人們在前線一陣礮彈之下，打得粉碎；孩子們則在敵人散播在空氣裏的毒藥與病菌中毀滅了。

一次很好的戰爭。國家的尊嚴。一個人的榮耀。任何事情只要你願意。在任何地方，他們都可以找到一個自己並不上前線，而其他的人卻在爲他流血的「領袖」。

星期日，四月三十日，我在電話簿中找到了公爵的另一個信息。這是最後一個，也是最重
要的一個。籌畫了很久的他的計策，這是最後一場了。我把這信息用密碼寄給奧杜。送信的人
並沒有回來，我卻不急，因為我知道下午就可以去看他的。

大約五點半鐘，我到好爾斯丹潑萊滋去，從那裏又蕩到了教堂。遠遠地我就看見了簇聚
着人羣。那些人們，並不是要擠進教堂去，也不像安靜地站着，可是從我立着的地方望過去，彷彿
他們在聖像面前列隊行進的樣子。

當我行近，就看見了聖像。我就混入了這個慢慢地湧壓上來的人流。這教堂的四周都
是寬廣的道路。而在每一條路上，靜靜地都有擁着的人羣；這裏一個方向，那邊又是一個方向。
挺進隊員在教堂前攔阻着，可是看得見的東西，遠遠還是看得見的，所以他們也不再驅逐了，
讓他們那麼晃動着。

在教堂的鐘樓上，臨風招展着的，是一面紅的旗。

我擠近了一個挺進隊的衛士，給他看我的報館卡片，要見分隊長。他是一個肥胖的正在
淌汗的傢伙，戴着眼鏡，我告訴他對於鮑爾希維克的可恥的行爲，我也表示異常的憤懣，於是

要求他報告詳細的情形。我的美國朋友也早已擠到我們跟前了。不過要他對於這一齣把戲的欣羨之色隱藏起來，那是十二分困難的。

「這件可惡的事情，正當做禮拜時發生，真是無恥。會衆離開教堂，纔很憤怒地發現了共產黨徒所玩的幼稚的把戲。沒有立即報告我們或警察，大家都表示着憤懣。那個牧師，好意地勸大家走出教堂。他纔一個人找了那鑰匙。吩咐一個職員去報告警察。同時，我們也已得到了風聲，即刻趕來了。」

「可怕！美國人咕噥着，可是他的眼睛裏，閃着愉悅的光芒。

「你爲什麼不記下來呢？」我很天真地問。我現在開始明白了。

挺進隊的分隊長，憤怒得臉孔發紅。「這是古怪的事情。」他呻吟着。「那些罪犯把鑰匙的孔穴都用鉛填塞了。這件事情，他們一定在那個職員出去報告警察的幾分鐘裏做的。牧師又不讓我們擊破門窗。他說那是有歷史價值的。我們把他拘捕起來，但是我不願意自己負責做什麼事。」

「用鉛填塞的，」美國人沈思地說着。「倒很驚人呢！」

「你說驚人的嗎，先生？」長官喘息着說。

「他說這是卑鄙的共產黨徒毒害行動的驚人的明證哪，」我立刻說了這一句話。

我們向這個結實的傢伙表示了謝意，重複投入排列着的人流中。我們注意着他們怎樣仰望着旗子。有許多人高聲地謾罵着。但也有許多人並不回答這謾罵，只是特殊有意義地望着那旗子。我跑到一個年青的共產黨員那裏去——他大約只有十八歲；曾經爲一次區分部會議到我那裏來傳遞過消息的。他緊握着我的手臂。眼睛裏閃着光。「我想，」他囁囁着，「一切都過去了。我從沒有得到黨裏的命令，而且他們在三月一日把我的細胞領袖都抓到了。可是現在卻有這一面旗！我知道，黨還沒有死去呢。天啊，我真快活咧！我真快活得流淚，是那樣的快活啊。只是一片破布而已，可是我現在知道我並沒有孤獨，也並沒有被這世界所遺棄。」

美國人推着我前進。他望着成千的列隊過去的人羣。消防隊員正在設法從屋頂上取下那旗子。人羣靜謐着，連喘息都沒有。他慢慢地對我說，「這個運動還沒有死寂咧。」

這旗子在屋頂上飄揚了兩天。這中間經過了五月一日。直到二日晚間，他們纔弄開了那扇教堂的門，沒有把門損壞一點。據說升旗的時候，得到牧師的默許，因此他被抓去了，但是我

卻得不到證實。

那裏我並沒有遇到奧杜，直到第二天——星期一，五月一日——我纔見到了他。他在國社黨員的遊行隊裏行進着。我還看見其他非法集團的人員也都在一起。

奧杜看見了我，便離開了隊伍——實在是跟着德國書記聯合會的——走到我跟前來。他首先感謝我給他那個公爵的消息，他說那是十二分重要的，尤其對於他的一部份，又說如果我願意，可以跟着他們走。『你可以告訴你的美國朋友，』他隔了一會說，『我聽說教堂上的那面旗，對他起了很大的影響呢。』我沒有問他怎麼知道的。

我在他的辦公處，搖了一個電話給那美國人，那辦公處就在遊行隊過路附近的商業區。他對於遊行這一件特殊的舉動和它的意義，得了很大的印象。當時在旁邊聽着的奧杜，便掬着嘴說，『跟他約一個時間。我很希望跟他那樣一個人見面呢。』我就表示了這個意思，並約定半點鐘後在斯頓達與羅皮克杜的轉角處碰頭，那也是奧杜的意思。

在我掛斷了電話，跟他一起踱往斯頓達去的時候，奧杜思索着說，『真是奇怪，這一大羣人怎麼會叫人家感動的。一次羣衆示威運動，竟然感動了許多參加的羣衆，雖然大家都知道

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被威脅與恐怖所驅使的。只要數量一多，往往會影響羣衆。希特勒也明白這一點，雖然這主意也是從莫斯科得來。幾年以來，莫斯科早已舉行了羣衆的示威運動，在那時以前，政治心理學中，還沒有這一套事情咧。」

在約定的時間，我們遇見了那個美國人。我把奧杜介紹給他，遵照奧杜自己的意思，說是霍斯先生，當那美國人用着詢問的眼光望我的時候——那種注視的神色，彷彿要知道這位霍斯先生的更詳細的情形——奧杜也望着那個新聞記者，平靜地說他自己不是一個官吏，卻是一個共產黨員，運動中單純的一員。他從共產黨合法的時候加入了黨，到現在仍然是一個黨員。他又說，美國人聽說是很公正的，所以他很直率地說了，雖然他這樣地自己承認是共產黨員，事實上是相當的冒險。但是他知道美國人是不會給他過不去的。

這真完全說中了那個美國人。他是一個無情的新聞記者，是一個信仰着宗教與秩序的家庭中的成員，當然是共產主義的有力的政敵，尤其像他那樣從德國和美國的報紙上，看到過把共產主義者誣爲「有組織的盜匪。」他想，共產主義者的活動，也跟歷史上其他進化的活動一樣，是與不合理，誹謗和憎恨奮鬥着的。所以他冒了一點生命的鋒鏑遇見一個真正的

「非法份子」時，他必然會儘量地盤詰着他所需要的東西，但是他決不會出賣一個信任他的人。

我們一起蹣跚着。奧杜與那美國人談得異常的契合。有一次，奧杜坦白地訴說着非法組織的進行上的困難，便很迅疾地對我看了一眼，微笑掠過他的面龐。

「這裏我們的朋友」——他是指着我——「是咋舌了——我從他臉色上看出來——因為我把我們工作的詳情，一起洩露了出來。假如我的頭目知道了這個，我是一定要倒楣的。但是你瞧！你和你的朋友都不是共產黨員。當然你不是；你是資產階級報紙的通訊員，但是你也希望客觀的。不論公私，你只聽到了我們政敵所思維的一切。我不想把你說服，使你改信共產主義。但是我們需要高尚的政敵。我所需要的，以及所有共產黨員所需要的，就是要使英國人和美國人知道我們不是「有組織的盜匪」，而是像你們一樣的高尚的人。我們有妻子，也有家庭；我們固然貧苦，但是也不太貧苦；我們跟你們一樣有寒冷，我們有人戴眼鏡，有人也沒有。我們不是超人；我們不是低能兒。我們有着信仰。我希望英美人士對待我們，不要當作駭人的妖怪，卻要當作有着新的啓示的人。我們跟你們所差別的，只是爲我們的孩子們

夢想着一個更愉快的未來。我們雖然不能得到，然而我們的孩子，甚至敵人的孩子，一定會得到的。這是我們準備受苦的原因。假如你們要攻擊，那就攻擊好了，只是必須尊重我們，真正的尊重我們。」

我們走到了一家小小的電影院。這時候是十二點鐘。奧杜從他口袋裏掏出三張門票，給收票員看了兩次。廣告上宣佈着放映『晨曦』，一張德國愛情愛國影片，魯陶爾夫·福斯特扮演其中的英雄。

『我爲什麼要跑進這種場所呢？』美國人驚異地問。

我注意着沒有一個人在售票處購票的。一個站在鐵耙後面的女子，我彷彿是認識她的，顯得很遺憾；他們把十二點鐘一場電影的門票，一起賣完了。她只能購到二點半一場的門票。我們三個人都走進了黑暗中。門票第三次被查驗了。閃光映着我們的臉孔。聽到一種急促的絮語；奧杜在說什麼話，我們都被放行過去了。

裏面是漆黑的一片，可是我們的眼睛漸漸地習慣了。連太平門的燈也沒有開，所以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偶然的輪廓。到處都是絮語，整個氛圍是很特別的。那個美國人沒有說什麼，只

是顧視着周遭。

一陣鈴響。一切還是在黑暗中。有人離開了座位，慢慢地走到前面去。他搖擺着到了銀幕前的小小的講臺上。我看見他是一個戴着便帽的壯健的傢伙。可是看不清他的臉。

於是他開始說話了。我的脊骨震顫了一下；聽到周圍的人們在興奮地喘息。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同志們！』

他頓住了一會。一陣心悸的嘆息流蕩在廳中。外面的太陽，正在照耀着；外面的遊行，正在行進着；外面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這是一個黯淡的小廳。無產階級的婦人們，常常到這裏來看那漂亮的黃髮明星，微笑與啜泣。可憐的打字員，愛上了高貴的伯爵，接受了他們的親吻與取媚的容顏。閃動在他們眼睛裏的是愛情。於是無產階級的婦人們嘆息了。這樣美麗的世界，結果總會在什麼地方出現的。她們要走進那樣的世界，並不禁止。便是無產階級的婦人，也有她的權利。她可以走來看電影哪。

『同志們！』講演的人又說着。

外面，挺進隊員在行進，手槍已經準備了。在祕密警察的監獄中，幾萬個人在呻吟。希特勒自己，卻在寺耶廣場上向二百萬聽衆演講着。

『同志們！斯頓達的一家電影院裏，那個人說。

這是我生平參加過的最壯烈的紀念會。那個美國人擠着我過去了。他要回家。我問他是否回到辦公處。他說，『不。』

第二天，星期二，五月二日，德國所有的商會辦公處，都給同時佔領了，傢具被毀，低級職員被擱之後都給拖了出來，經費充公，會員的名單帶去審查。高級職員則給隔離。所有的聯合會都被解散了。佔着全人口三分之二的德國工人，現在喪失了他們最後的權利。然而沒有一個人作着反抗的嘗試。

在大城市中，事情平息了下來。雖然低層民衆的情緒，仍然高漲着。在多特蒙德，在柏林，在哥尼斯堡，屋子的牆壁上，貼着跟我在漢堡所見的一樣的標語：『希特勒，給我們麵包，否則我們又要赤化了。』

希特勒發表的演說，鄭重地駁斥了『關於第二次革命的罪言。』社會主義者的非法的

報紙上，載着國家社會勞工黨確已證實了他們那個黨名的第一部份。他們已經實現了程序中的最小部，就是所謂國家的，然而社會的部分怎樣呢？

我也不需要描寫中層階級把希特勒看作偉人的那種解迷的意識。但是小資產階級仍然信仰着他們的救世主。他們說，應該讓希特勒慢慢地改好來。

非法集團的工作，還是在進行着。

第十三章

公爵在漢堡甘奇尾泰爾的一次大搜捕中被逮了。給他們發現的時候，他正穿着挺進隊員的制服，在萊登瑪區的他的寓所裏，拍攝着那張黨衛團情報組的祕密命令。不久之前，曾經有過這樣一項文告：該組的重要文件，已經給誰落到了政敵的手裏——就是我得到而傳給奧杜的文件——但那傢伙還不懺悔呢。他被帶到了總局的著名的二百零三號房間裏。在途中——從他寓所到警察總局，至多不過幾百步路——他又受到他以前的同志們的鞭笞；這最後的幾百步路，他們也押着他走。總局照例『把羣衆肅清』，公爵纔給帶進了電梯。當他走進了二百零三號房間，已經沒有站立的力氣。那個看着他受『審訊』而結果在極度憤慨之下歸附了敵人的挺進隊員，後來說公爵的背上有着一大塊血跡。但是他不能說話。他們用幾桶冷水，澆着他，直到他恢復了神志。他便睜着流血的眼睛，望着周圍的人說：『你們這些該死的傢伙！爲什麼不把事情做了啊？』於是他們把他打死了。

甘奇尾泰爾的搜捕，規模是極大的，但是因爲祕密警察的情報組，當時都跟奧杜的人們在一起，所以共產黨員早已得到舉行搜捕的消息。清晨二點鐘光景，天空還是漆黑的時候，那些警察，還有挺進隊員，消防隊員，以及正規的軍隊，在這一區域佈成了一道很大的哨兵線。一起動員了六千個人。沿着通往這一區域去的每一條街上，凡是有着出口的每一家屋頂，都給堡壘中的機關槍支隊佔據了。整個區域都已設了防，這佈置直到七點左右纔蒞事。漢堡城裏，有四十條古老彎曲的街道，都已斷絕了交通。

於是在整個區域中，開始了嚴密的搜查。假如沒有給脫光了衣服，從頭到腳地搜索一遍，誰都不放過去的。運貨車和腳踏車，尤其搜查得仔細。牛奶車上的牛奶，都給一瓶一瓶地拿了出來，把牛奶傾倒在路上，讓運貨車的輪子吸了去。但是屋子裏的搜查，還要嚴密呢。沒有一張牆上的花紙，沒有給撕破；沒有一塊牆上的灰泥，沒有給翻檢，沒有一隻鐵箱沒有給打開，沒有一套傢具沒有給摧毀，也沒有一架牀鋪沒有給折碎。

在湫隘的陋巷，在貧困和愁苦者的常到之處，有着許多嫌疑的份子。他們是很可憐的。警察查獲了一家偽造紙幣的工廠，抓到了幾個久已通緝着的人犯。然而當他們發現了這一次

鋪張其事的搜捕，並沒有得到一點關於非法活動的消息時，他們的憤怒與失望，實在是難以形容的。共產黨員早已警告着同志，也同時警告着跟他們有着聯絡的其他的集團，因此所有應該隱藏起來的東西，都早已安全地拿走了。被這六千個人所查到的，只是一些在共產黨沒有被認為非法之前印行的手冊，幾本馬克思主義者的小說，兩支從大戰中帶回來的古老鐵鏟的手槍，以及一對屬於一個學生俱樂部的格鬥用的軍刀。

大約十二點半，軍隊和警察放棄搜查了。警察長召集了各家大報的訪員，作了一個摘要的敘述。雖然他憤怒得流着涎沫，但是他還是很柔和的。這時候大概三點光景了。他拿出了一頁剛纔印成的紙張，授給他們傳觀。這是非法的共產黨報漢堡民衆的『小型版』。近來按期出版着的內容是：

甘奇尼泰爾的搜捕

此刻，警察們——他們有六千個——正在甘奇尼泰爾舉行着搜捕。我們的同志，昨夜已得到了警告。搜捕的時候，照例是異常的粗暴，無以復加的野蠻，竟把機關槍架設在該區的每一個出口，作為控制。過後我們的特別情報組會把各種發生的事端揭載出來，告訴我們的讀者，參加搜捕的警察和軍隊的番號，以及描寫當時的情形，和被警察

的破壞主義所釀成的損失，那些損失我們要向國家要求賠償的。

上面的消息付印以後，我們又得到了一項驚人的情報：

大約十一點半，他們並沒有發現什麼「秘密兵工廠」或是「秘密印刷所」。漢堡的警務委員威爾跟秘書斯杜依克列虛，商議了一個辦法，他們都是監視共產主義活動的中央組委員，吩咐部下用警務貨車到彭第街的營房裏去，載運二百支手鎗往甘奇尼泰爾。這個在電話中傳達的命令，即刻執行了。到十二點十分，這輛裝着手鎗的貨車，轉過惠爾希姆路和新市民路直往甘奇尼泰爾駛去。

十二點一刻，威爾委員在新市民路的一家屋子裏「發現」了一個共產黨的兵工廠，抄獲了二百支警察的手鎗。這個驚人發現的消息——據說「提供了共產黨危害的證據，也說明了大舉搜捕的緣由，」即刻送到漢堡的報館裏去了。於是漢堡外國新聞就把這消息發行了一張號外。

可是據我們的訪員探到的消息，當這輛警察貨車，載了二百支「從共產黨機關抄獲」的手鎗，回到彭第路營房去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這二百支手鎗中，卻有六十四支給人家偷去了。據押運貨車的人發誓說，從甘奇尼泰爾到營房去的途中，他們從沒有停過車，而在甘奇尼泰爾也分明點清了是二百支，所以這搶劫案大概是在甘奇尼泰爾發生的。對於那個警察長，我們也表示了同情。

「先生，」那個新任的國社黨警察長亞伯拉罕說，「我把這一頁粗鄙的新聞給你們傳觀，要使你們知道你們採訪新聞，不要再像過去的訪員那樣，老是往那種邪惡的地方去，而在我們這裏，也會採訪得到的。」這是對我而發的話。「那個消息實在很正確——在我們所發現的共產黨兵工廠裏，確實只有一百六十四支手槍，並不是二百支。」

「兵工廠在那一個屋子裏發現的什麼街，多少號門牌？我想去拍一個照。」說話的是一個英國的記者。

「怎麼，我親自點的是二百支，」一個法國記者獠笑着說。

「共產黨徒怎麼會得到這樣詳細的消息呢？」另一個人問。

到這裏，亞伯拉罕隊長把訪員會議結束了。

四點鐘左右，我跟海因滋·尼格爾在胡白尼咖啡館喝咖啡。他是疲累得厲害。他在民衆報館工作着；助理編輯工人的通信。可是也爲報紙寫文章，及至出版以後，又把一捆捆的報紙運到車站上去。他難得乘坐同一的汽車，往往一輛一輛地調換着。到了車站，這麼一捆捆的報

紙都給報販拿了去，分發到各個地方。這是多麼奇特的事業！在二十世紀，一個柏林大學的教授卻爲非法的報紙寫文章，自己摺疊，自己拿着報紙去分發。

『我們在慢慢地改善我們從外國去要報紙的辦法。你知道我們在德國的工作材料是多麼的簡陋。我們正進行着脫離別家印刷所，而建立自己的場所。納粹們把現有的印刷所，監視得極嚴。雖然我們仍舊利用資產階級的印刷的店鋪，可是我們已逐漸用着自己的一切。有時候，深晚闖進一家小小的店鋪去，不讓一個人知道地印着我們的東西。然而那是十分冒險的。除了異常緊急的情形外，我們現在已不再那樣做。利用資產階級的印刷所，真是愈加困難了。納粹不讓我們方便做事的，店主們照例不會得反對。他們在經濟方面總是很拮据，尤其是希特勒允許他們一個黃金時代的中層階級，他們往往感覺到不必阻難我們的吩咐。我們總是現款付帳的。但是我們到那裏去找印刷工人呢？那些店鋪裏的工人們，我們不能夠僱用。他們任何一個都是好細，即使我們自己不留心，而店主們卻耽憂着他們自己的工人，來印我們非法的文件。因此我們必須用我們自己的人，在晚上自己去工作。可是我們到那裏去找所有我們所需要的熟練的工人呢？他們大多數是整天工作的日工和夜工，他們不能兼做啊。』

『你要明白我們所感受的困難，是那樣艱巨的困難。現在我們想建立自己的印刷所，而那來的錢呢？要湊集我們失業者的錢去買印刷機，那是絕不可能的。那麼我們不能不用手印機。可是從漢諾威到丹麥邊境的華沙區，至今還只有二架很小的手印機。不過我們還是出版報紙的。』

『你們不會到外國去印來嗎？』

『哦，是的，不過我們還沒有把整個計劃弄得很好。我們目前所最需要的，就只是一張新聞報。這種出版物，現在完全絕跡了。有許多很好的資產者，化上三十馬克一月的報資訂閱了一份民衆，我們就每天塞在他們的信箱裏。也只爲了這一個原因，我們比資產階級的報紙更得到了鼓勵。事實上除了新聞報以外，所有我們的文件都是從外國印來的。當然都從最近的國家。在北方，我們總從丹麥與英國。』

『那些印件，怎麼帶進國境呢？』

代替我報告尼格爾的回答，我要翻印一頁官方的文告，那是普魯士警察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裏頒佈的一件『祕密警察向下級幹部的祕密報告』

據秘密警察最近的發現，從外國輸入的宣傳文件，是被外國水手和路員，普通旅客和特別通訊員，或者藏在貨物與車輛中偷運入境的。甚至利用了氣球與瓶子，被風力與潮水運送着。一部份的印刷品，則在偽造了一個封面之後，竟公然寄進國內。我們已經發現了許多非法的小冊子，用着下列的封面：無線電的新計劃；海爾滋冬季運動會；議德國少年叢書；藥草；性類；蒙生；羅馬史。

那份報告又敘述到非法文件在德國流行的情形，據說有的放在火車的車廂裏，有的祕密地塞進信箱，散發到人們家裏，以及由郵局寄遞出去。最後的一個方法，並不是新鮮的。但是最需要一點勇氣的是，把那些印件塞進街上行人的手裏，和拋入街上流動的車中，最近在亞爾杜那和梅因河的弗蘭克富忒，已經發現了幾次。

我沒有見到奧杜。直到星期五，我纔搖電話去約他在亞爾斯底·配微龍見面。他把一個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跟二個人坐在一起的人，指給我看。那兩個人，只要一看他們戴着的球帽，就可以知道是暗探。

『那是海勒，』奧杜說。

我輕輕地告訴他，海勒這名字我一點都不知道。

「海勒，」奧杜解釋道，「是與我們有關的最重要的人物。他是柏林「監視共產黨活動中央辦公處」的主任。他海勒是一個要人。他是秘密警察的分隊長之一，也是第爾的深資倚界的人。我想他到漢堡來，大概是要改組這裏的祕密警察。一切都是那些該死的共產黨徒的過失。」他笑了。「甘奇尾泰爾的事情也有它的結果在。我們當然早已知道了，雖然這是非常祕密地執行的。納粹耗費了巨額的金錢，遭致了莫大的恥辱，而我們卻增加了民衆的信心。於是又發生了一件二百支手鎗的趣事。假如這世界上真有幽默的意味，那麼人們一定會笑着死掉的。然而比任何事情都還重要的，是從公爵那裏得來的消息；他已付了那麼巨大的代價，可憐的人！」

「我仍然沒有懂得你所講述的話。」

但是奧杜並沒有告訴我。這真是可惜的。不過一年以後，我還是一切都知道了。

公爵知道了他所隸屬的那個最好的部隊，亞爾杜那的李希忒部隊，成立了一個海外偵探的特務組。這個德國唯一的組織，據說是由一些反對僑民工作的官吏，非正式地組織起來的同盟，因為那些僑民，在做着啓迪外國意見的危險的工作。

一年以後，我纔知道了公爵所發現的活動。許多從前的共產黨員，一些知識份子，還有許多聰明的冒險家，都被吸收進了李希忒部隊，爲了增加僑民領袖間的混亂和猜疑，以及使他們在僑居的國家中失卻人家的信仰。這些特別的部隊，是聽命於漢堡的海外組，這海外組是作着B·D·A·（德國僑民聯合會）的大本營。德國僑民聯合會，本是大戰以後組織的一個文化團體，擔任連絡祖國與四千萬德國僑民的工作。在世界的各處，只要有幾個德國人僑居着，便給聯合會聯絡了起來。及至希特勒執政以後，這個僑民聯合會就給大大地變動了。所有執行職務的人，一起給撤了職，換上了國社黨員。到今天，這個聯合會簡直成了御用的『情報』的組織。表面上仍是一個文化的團體，而實際早已走向軍事的路線。那些受了特殊訓練的國社黨員，一國一國地巡行着，去做組織的工作，而李希忒部隊，便成爲大本營和訓練的中心。

我端詳着那個柏林的警察長。『你確實知道，』我問奧杜，『海勒要改組漢堡的祕密警察嗎？』

『並不確實，但我怕他是那樣的。坐在他旁邊的胖子，也是德國的名人。那是警察委員亨

斯，他常常自以爲社會民主黨員。現在跟威爾同事，而威爾卻好說自己是共產黨的省領袖。」

情形是相當地有趣的。坐在那裏的是「新德國的正義」的代表們，而兩隻桌子以外，卻坐着那個爲他們所最畏懼而憎恨，使那些追逐者常加防備，而強迫他們解散警察企圖重新改組的人。還有的是異常傲慢的武裝了的國家的權威，他們決不尊重民衆的生命，而這裏卻是一個沒有教育和文化，沒有權勢，沒有武力，沒有金錢，沒有電話，沒有無線電，也沒有軍事力量作後臺的人。當我一桌一桌地周覽的時候，奧杜一定已經明白了我的思想，因爲他在笑了。我最喜歡聽他的笑聲；在他笑聲的背後，包含着那樣純潔的快樂。

『朋友，』他後來這樣說，『你聽我說！我們柏林的民衆，現在可以做一件大事業了。假如受打擊呢，朋友——現在，你聽——』

在祕密警察的頭目們五呎以外的地方，奧杜告訴我柏林非法情報組的計劃。他們的黨，又在首都活動而且改組了。他們不像漢堡那樣地有進步；他們那邊，沒有像奧杜這樣的人。但是他們黨員的來源，卻比漢堡來得多，所以只要他們防備着叛變的事，不久就可以成爲一個健全的新黨。我知道柏林的青年社會主義者還沒有多大的成就，雖然社會勞工黨是異常活

躍的。皇黨呢，他們也進行着非法的工作，卻也上前了。因為他們有充實的經濟，和民衆們廣大的同情。

『我們已舉辦了跟柏林方面經常地通訊的事務，』奧杜又告訴我。『常常到這裏來的史，就是一個負責的主持者。柏林的人只用專差來傳遞他們各組間的消息，以及獲得其他團體的連絡。現在柏林的民衆，很想表示他們能夠做事呢。你想，他們要灌留聲機的唱片。灌了十萬，也許至少有幾萬張。首先總是灌些音樂的片子，作爲掩飾，而後報告國會失火的背景。這些唱片，在一個日期，一個時間內帶到許多市鎮去，沿路發賣。他們把持了一家悠久的灌片公司。那是在北方。史在裏面工作過，他這樣告訴我的。那家公司維持了兩年，破產了。所有的機器都很舊式，那家公司至今還在蘭納根陶爾甫，各種用具上都給攀滿了蛛網。我們的同志，拉來了幾個懂得這門生意的工人，現在還在灌製着唱片。他們與困難奮鬥的情形，你一定想像不出來。我願意跟你拿任何東西來打賭，他們是一定可以克服困難的。』

『有人可以把關於那些日子中的一天的事情，寫成一本書，一本我們這時代冒險的實錄。他們怎樣得到唱片上的蠟的呢？如果出去買，那要給人家發現了。他們所有的原料，只是分

別購買進來的化合物，於是公司的煙囪，可以永遠看不見冒煙。朋友，這是你的計劃哪！」

每星期五，社會主義青年們總要聚一次會，而那一天晚上，我想往漢堡去參加，至少要跟他們中間一兩個人說幾句話。可是我遲到了。那天下午，當奧杜告訴我柏林方面的計劃時，約翰在柏林被捕了。這個消息即刻傳到了漢堡。爲了許多我們至今還不知道的神祕的緣故，約翰走進了祖國，那是從外地到柏林去的人們常到的大廈。有一個以前在漢堡煤氣公司當僱員的人認識了他，把他交結了警察。約翰一味否認，然而要是他並不再說自己是挺進隊員，也許倒可以撒謊開釋的。他們把他押解的時候，是有兩張身份證明書的呢。

這消息必須報告他妹妹瑪莉，她每天看見他穿着挺進隊員的制服，可是幾個月來沒有跟他講過一句話。報告消息的時候，他們要我去，所以我就跟那報告不幸消息的人同去了。她很安然地傾聽着；詢問着每一點詳細的經過，嘴脣慘白得很。於是她要求我們走開。

瑪莉已經不很年青了。她從頭就跟她的哥哥參加着活動，所以這幾年來一直得不到平靜與舒適。

「好的，」她說着，急急地揚着手。「謝謝你們，謝謝你們。我們仍然在一起工作的。但是，請

你們現在走開吧。」

我們便走開了。

爲了這個原因，年青社會主義者的集會，我是遲到了。在我到達大戲院路以前，已經近乎九點鐘。後來知道，這一次遲到，使我避免了一次不幸的遭遇。要敘述那一次經過的情形，也很困難呢。

社會主義青年們在封閉了的漢堡的辦公處集會，那是誰都不會來打擾的。而且誰都不會懷疑他們在那裏。他們那樣地堅信着，實在很對。然而這一天星期五，他們卻被捕了。這次偶發的事情，只是爲了一個不相干的人的疏忽。●星期五的天氣，凜寒得古怪，所以叛黨們不在平常集會的房間裏舉行，因爲那一間裏的熱氣設備已經壞掉了。他們移在另外一個裝置熱氣設備的房間裏。那個房間臨靠着菲蘭路。厚厚的窗幔都已垂了下來，使這室內的光線，不會透露到外面去。

八點三刻光景，一些挺進隊的巡邏隊員走到了菲蘭路。不知怎麼會這樣的湊巧，一個挺進隊員發現了一點從發行部的房間裏散發出來的微弱的火光。他知道這個屋子是封閉着

的，在他拙笨的腦筋中，想不出會有人那樣冒險地在這屋子中舉行非法的會議，所以他跟他的同伴們靜靜地走到菲蘭路的門口，只見大門嚴扃着，於是按鈴招呼着門房。無疑地當他每天照例履行着職務，檢查這座屋子的時候，一定忘記扭滅電燈了。

他們按着門鈴；再按着門鈴。兩個人在單調的巡邏中發現這點小小的瑣事，也覺得很高興，便靜靜地等候着，直到那個毫無疑慮的門房，蹣跚地過來開了門。當他瞥見了挺進隊員的制服，立刻昏亂地把門碰緊了，緊緊地撞住了，而且那樣急遽與恐怖地奔到了樓上，尖叫着警告所有的叛黨。

那當然是太遲了。兩個挺進隊員比那個門房更來得靈敏。他們知道——每一個人都知道——另一個在大戲院路的門口。於是，一個人吹着警笛，轉到了那一個門口，另一個人，也吹着警笛，守住菲蘭路的門口。這所屋子，立刻被包圍了，挺進隊員蜂擁地進去，經過一度的追逐，所有非法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們都給逮捕了。

那個時候是十點鐘。我站在挺進隊員的哨兵線後面。他們還在搜查着屋子。挺進隊員用手牽挽起來，攔成一道警戒的防線；他們都被觀眾擁擠着，推撞着。我想問問那領導搜查的長

官，從他那裏探訪一點消息，可是沒有辦法。結果我就招呼了我的美國朋友。他即刻走來了，但是他也等了許久纔從警察總局方面得到一些比其他訪員先得的消息。

一起抓去了十二個人。他們都給帶到了總局最著名的二百零三號到二百十號的房間裏，審訊了一夜。只有一兩個人是被擱的。第二天早晨，五個人又跟許多普通的人犯一同押解到富斯布丹爾的監獄去。

社會主義青年團又在祕密中改組了。他們的領袖都不給外界所知道，而且不久就跟全國其他的非法集團聯絡了起來。一年以後，他們的組織，又已普遍到全國。但是那個時候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都已非常的健全，不必互相聯結了。本來所有德國的非法政黨，都像同志一樣地相互幫助的；在危險的時候尤其聯絡得緊密。因為他們大家「反抗」着什麼，所以還是保持着團結。現在，組織既已很健全，團結便不十分需要了。然而在每個人心裏，還是希望着有一天大家一起去爭鬥。

共產黨方面，也有了不小的變遷。黨的機構，毫無阻滯地運用着。可是領袖們常常被抓去，給用嚴酷的刑罰，逼迫着招供出同志，和埋藏軍火與非法印刷的地方。但是他們會招供出來

嗎？每一個份子，只是三五個人的小組裏的職員，至多不過知道他那一組裏的幾個同志。

非法的印刷所呢？那是誰都沒有知道的。

祕密的兵工廠呢？天曉得，共產黨的兵工廠，就在挺進隊員和警察的營房裏啊。

一兩天之後，發生了一件著名的漢堡挺進隊員的事變，結果，他們的領袖布根霍把希特勒的代表高甫曼擱了幾下子嘴巴。這一次幾千個人的事變，卻是一個人的工作。主使的人就是史。

史已擢升為分隊長。他跟無產階級的挺進隊員接觸着，得到了他們的信仰。他是一個活潑直率的青年，容易叫人家信任的。自從十二歲起，他就參加了社會主義的活動。他的挺進隊員，簡直盲目地信仰他。對於事業，他是永遠不會疲憊的。他還講演過這樣的題目，『我們與馬克思主義者所瞭解的社會主義。』

他很機警地跟那些業已加入了國社黨組織的過去共產黨員相聯絡。直到今天，非法集團的人員，還是能夠在國社黨的組織中工作，這個叛黨的網，是織得非常嚴密的。這種方式，幾乎成為叛黨活動的經典了。

事變發生以後，史便失蹤。到今天，他在柏林幹着同樣的工作。他曾告訴我，有一次晚上他跟戈林握着手，便禁不住想到，他可以在那個時候對戈林說，共產黨員是能夠忍受恐佈的政策的。

『海爾曼，』——這是史想告訴戈林的話——『你瞧，瞧這個！我現在跟你並肩地走着，只因爲你自己願意跟一個挺進隊裏的部下要好啊。你是不是以爲我是怕死的呢？試問你，老頭兒，你用什麼來阻止我用槍彈打你的肚子，用挺進隊的炸彈來擲上你的嶄新漂亮的制服呢？』

『唉，』史說着，震顫着身子。『我一再忍受着跟戈林的交往，以及那樣的命運。可是你一定不知道，這也要我償付多少代價咧。』

史在柏林住了下來，尼格爾便接替了他在漢堡的工作。當時每個活動的領袖，都有好幾個接替的人，預備隨時發生了岔子，即刻填補進去的。

除了他的老幫手以外，奧杜有時還有另一個人——皮小姐。

現在到來了我所永遠不會忘記的日子，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奧杜被捕的一天。

「兩天前，我去找過寶拉，看她的情形很異樣。當我說着任何一句話的時候，她總是默默地斜睨着我，而且對於我的話總是無端地發笑。最後我問她爲了什麼。」

「什麼緣故？沒有什麼緣故。」她用着怨恨的語氣，使我異常地震懾。我攙住她的手，引她走到一張靠背椅子邊，推她坐下，然後捉了一隻小凳，我也坐在她身旁，捏着她的手。

我說，「寶拉，你不再信任我了嗎？」

她並不望我，摔去了她的手，迸出一句話，「不。」

我並沒有說下去，她突然啜泣起來。她把頭沈在手中，眼淚潛潛地流着，完全不能夠禁抑。我就讓她哭去，並沒有動靜。後來她平息了。我纔擡起了她的頭，抹去了她的眼淚。

「那個，那個！你現在告訴我一切吧。」我說。

她開始說話了，起初是很慢的，漸漸地急了起來。

「我一切都知道了。一切都給我發現了。別以爲我是瞎子。你爲什麼不把實在情形告訴我呢？我愛奧杜，假如他告訴我，要愛另外一個女人，我會讓他去愛的，我會的，只要他快活。我不是那樣的女人，在他要拋撇我的時候還是緊拉住他。即使我不應該受他那樣的對待。你想啊，

他——他已經長了鬍鬚，還有一個女人。我的弟弟，相貌似乎很傻，可是也並不傻的哪。我告訴你，我是知道的。我知道她好看，但是我現在不好看了嗎？然而假如他真在戀愛，那我也不願意在他們中間的。我現在知道一切都是謊話，什麼非法工作，都是假的；他只要跟他的情人，我的弟弟也那麼說。」

我很明白，便說，「寶拉，我就憂你要使奧杜遭到災殃呢。不過在你聽到我的話以前，請你不要動手啊。」我就出去找奧杜。我走到他的寓所，他的辦公處，甚至到一切他所常去的地方去找他。每一處我總留下一個簡短的字條：「危險。」

但是奧杜永沒有來。

我又回到了寶拉那裏。她已平靜得多了。她很沮喪地可是又很熱望地問我，我的話是什麼意思。我便儘可能的清晰地解釋給她聽，黨衛團員利用她的弟弟，使她出賣丈夫的詭計。寶拉又啜泣了；她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幾乎是耳語般地急吐出她的話來，「那是不可能的。他是我的弟弟。而且那個女人是我從未見過的最可怕的東西。」

我要她描述那個她所看見的跟奧杜在一起的女人。我立刻知道她是誰了。

「寶拉，你看見跟奧杜在一起的女人，也許跟你在同樣的情況中呢。那個女人的哥哥，在一兩天前被捕的。現在他已經死了。」

寶拉戰慄着。但是我現在不想去打攪她。我便走開了。我不能夠休息；也不能夠靜止。他們要追蹤奧杜。現在他們知道誰是最大的敵人；他們在警察總局和瑪爾威頓的褐色房子裏知道的。他們從奧杜自己的太太那裏得來。也從她自己的弟弟。他們怎樣唆使那個佃農的孩子，使他姊姊遭到那樣一件可怕的事情，使她殺了人呢？

以後的幾天過去了。我不能夠吃，不能夠喝，也不能夠睡覺。我急切地等待着消息。星期天了；於是星期一，星期二。奧杜的影蹤還是一點都沒有。黨部辦公處沒有知道他；一兩天來誰都沒有看見他。他們不能抓到他，偵探組的人也這樣報告說；那是不可能的。接替奧杜的人，這些日子忙碌得厲害，也不說什麼話，但是我相信他們一定知道一點的。然而他們不說；只很誠懇地答應我代為警告奧杜。我就做到這裏為止嗎？

星期三，六月一日，奧杜帶了幾千張『非法的』留聲機唱片，坐着運貨卡車，從柏林運送到漢堡。他很躊躇滿志地愉快。那些唱片，有的是歌舞的，可是後來你會聽到一個人說：『關於

「國會失火的真相。」在預定的日子，同一個時間，漢堡，柏林和魯爾的街上，發賣着唱片，二十個銅幣一張。

奧杜坐在司機的旁邊，嘴裏吹着口哨。

一兩天以前，漢堡的每一個挺進隊員，每一個警察，每一個士兵，都發給一張奧杜的相片，和一篇簡單的描述。因為那篇描述的文字，很不詳細，所以非法的共產黨領袖，以為這拘票是給另一個人的，於是他們叫他避開了。

誰都沒有打攪奧杜。每個人都以為他很安全的。

兩個挺進隊員正在漢堡與柏林間的大道的交叉口站着崗，履行着討厭的職務。爲了破除岑寂，他們便跟停靠在那裏的等開柵門的貨車的司機們談話。貨車很多，排成了一個長的行列。

他們兩個都爬上了司機的坐位。一個人要想抽煙，可是沒有火柴；突然地他想起他認識奧杜確是一個正在通緝的人。於是他啣着沒有點火的煙捲，慢慢地說，「你，下去！」

奧杜笑了，對司機咕噥着，「快一點開上去，」便又搜索着口袋。火車早已在面前開着了。

開過以後，柵門就開，貨車都可以行駛過去的。

「我沒有火柴咧，」他說。「等一會，朋友，我看外衣口袋裏不知有沒有。」

他的鎮靜的態度，叫那個挺進隊員吃驚了。火車已經過去，任何時候，柵門都可以開啓的。可是他的同伴覺得有點神祕，便問，「那個傢伙爲什麼下車去啊？我已經找到火柴了——什麼事情？」

「他真像那個出了拘票要通緝的人，那個懸賞五百圓的，」那個人這樣回答着，又轉過頭去吩咐奧杜，「喂，你下去啊，你要受累咧！」

奧杜又笑了。柵門已經開着。他估計了一下。或者他自己，或者那一車東西。總有一樣要給扣住的。假如那輛貨車立刻就開走，那麼貨車的號碼一定會被鈔錄下來，即刻可以給尋到。我不知道他是否再想到別的事，也許他想到現在是夏天，他可以溜跑出去，躲在草木裏，在太陽下……

他慢慢地下了車，司機把機器關上了。柵門已啓，他們的貨車，排列在長行的前面。「開吧，」奧杜安閒地說，「否則你要給擠住在這裏了。你到那邊去等我。不要開走，免得叫我步行到漢

堡。」

柵門一開，後面的車輛儘在掀着喇叭，要搶前行駛。司機答道，『好的，我就等在那邊，』於是把貨車開去了。

奧杜的傳票決定了他的命運。那上面有着肯定他罪孽的字句。兩個挺進隊員即刻抓住了他，緊緊地抓住。當他們把他上鏢的時候，他們的臉孔都發光了。『朋友，五百呢——你想吧！』那輛貨車安然地到了漢堡。兩個挺進隊員想起了它，卻早已不見了。在往監獄去的途中，奧杜也被他們問到貨車的事，可是他只說那是一輛偶然碰到的貨車，給他搭乘上去的。也許他們相信了，也許他們不相信。貨車總已經安然抵達了。

那個，值得犧牲嗎？

奧杜一句也沒有招供出來。有幾個同志走過他被審訊的房間，看見他的就這樣說，他的臉上只有一塊小小的血跡。仍然在下午，可是雲翳遮蓋了太陽。有些屋子裏，已經開了電燈了。

漢堡是一個很大的城市。一百萬以上的居民，呼吸着各條街道的空氣，而那些民衆，都是

一天到晚地勞動着的。女人們安詳而嚴肅地行走在鋪道上。今天晚上大家可以高枕無憂了。他們會揣想着，歎息着。孩子們躺睡在搖籃中。多麼美麗哪！他們的小手，他們的小趾，他們的微笑的小嘴唇，他們的聰敏的耳朵，多麼神奇哪！天，你的宇宙之美，多麼神奇呢！

只有一塊小小的血跡。奧杜的臉孔。你是不是早已死了，或者你的生命還在你背上的污黑的血泊中消耗呢？周圍的人們，把煙蒂塞在你流血的手裏，而那雙手，在痛楚之中已連戰慄都不能了——他們是亞陶爾夫·希特勒的兵士。

……你的宇宙之美，多麼神奇呢？

死亡統治着大地，流血，和恐怖。司令部裏發生過的，以及正在發生着的事情，誰都知道的。因此我們都露出了流血的給人踐踏着的臉，擊傷的腰部，打折的肋骨，損碎的足趾，我們要問：你爲什麼不吶喊出來？

在司令部裏住了十一個月，我們這位朋友卻逃到了外國。自由八天，他就自己槍殺了他

留下一張字條給我們，他說他想不到外面的世界還是那樣的無情——國會議員，高貴的人，有靈性的人，還是跟血的凶犯們握手。

你的宇宙是美麗得神奇哪！

那麼，吶喊吧！吶喊吧！

從中午到第二天早晨，寶拉就一直站在漢堡斯丹達 霍斯橋畔的警察總局四層樓的嚴扁着的門外。

然而這運動還是在行進着！

● 這件事情，實在發生在六月十七日。——原著者識。

抗戰第二年五月卅日深夜，譯完於廣西桂林。

原书空白页

作者事略

海因滋·列普曼(Heinz Liepmann)，一九〇五年生於德國，在困苦的環境中成長在一個鄰近海埠的地方。他的父親是在戰爭中被殺的，他的母親也在那個時候爲了營養不足而死了。當他十三歲的時候，就已離開了學校，有一個頗有資產的舅舅，撫養着他，預備讓他進入商界。戰事結束以後，他就出走了，搭乘第一條離開德國埠頭的船，沒有買票，這樣趁到了美國。在那裏，他作着花匠，也是一家沒有註冊的酒館裏，作着侍役。一九二〇年回到歐洲，在德國作花匠與煤炭工人。於是他度着漂泊的生活，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足跡遍滿了歐洲。

於是開始了他顯貴的時候，列普曼到了梅因河的弗蘭克富忒，在一家雜貨鋪子裏做事，晚上學習着銀行學。他顯貴了，做了一家銀行的書記，六個月中賺了幾百萬。可是好運不長，列普曼便離開了銀行，到大學裏去學習哲學與心理學。他開始寫作，進了弗蘭克富忒報館，後來又寫戲劇，擔任弗蘭克富忒戲院的舞臺幹事。

一九二八年，他的第一部小說一個老成孩子的夜間，被人家偷印出版了，列普曼即刻禁止那出版者發售，然而早已銷去了十二版。第二部小說迷霧中的徬徨者，獲得了Harper's獎金，被認為德國小說或傳記中的最好的作品。一九三〇年，他又出了一本題作和平實現了的小說。

希特勒專政的時候，列普曼爲了相信一個作家應該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便預備攻擊這個威脅歐洲文化的希特勒，雖然他自己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是任何政黨的黨員。因爲他擔任了一家美國報紙的通訊員，所以他能夠不使人家懷疑地幫助建立非法的組織。但是他的著作畢竟被燒了，到了六月，他不能不逃亡。在上船的途中，不幸被捕，給關進了監獄，受着敲打，以及殘酷的虐刑。幸而他終於越獄了，在漢堡頭涸了兩小時半的水，搭着一隻美國的小船，逃到了法國。在那裏他住了四個月的醫院，差一點兒病死。痊愈以後，他又寫了一部屠殺——在德國，那部著作，給譯成了十八國文字。

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他在美國講演，現在又給蘇俄政府邀請去參觀。邀請他去蘇俄，是跟邀請其他有名作家如蕭伯納、威爾斯等是同樣性質的。他在倫敦設了一個總部，辦

理德國僑民的事，可是也常常與德國的非法活動聯絡着。他相信這種組織就會取得政權的。
列普曼先生告訴我們，他自己並沒有確定的政治的信條，只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但是他的政
治展望卻是與左拉相仿的。

原书空白页

譯後記

八年前着手繙譯過一個U·辛克萊的長篇曼納薩斯，可是只譯出了第一部題作晨的，便中止了。我記得當時中止繙譯的原因，乃是沒有興趣，沒有勇氣。那個長篇，記得有二十多萬字，完全描寫美、洲、南、北戰爭時的情形，寫得非常動人；然而正因為非常動人，於是譯了一部，只想一口氣往下看，及至通篇看了一遍，便掩卷嘆息曰：「此誠好書也！」卻再沒有譯下去的興趣和勇氣了。所謂沒有興趣是，全篇內容早已明白，如果再讀再譯，總覺得興趣索然，彷彿有點多事；所謂沒有勇氣是，全書二十多萬字，那時只譯出五分之一，皇皇巨著，不知再要化去我多少時候；雖然當時還沒有「搶譯」之風，不必限定什麼脫稿的時日，可是一譯經年，總覺得自己也沒有那樣持久的勇氣。此後，除了譯過若干短篇之外，就從沒有遂譯過任何的長稿，所以今番把這一個十二萬字的長篇地下火全部譯竣，自己也有點驚異起來。這種興趣，這種勇氣，到底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覺得在這裏不是沒有饒舌的必要。

地下火的德文本是由 R. T. Clark 譯成英文的，一九三六年在英美兩國同時發行，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始運中國發售。我對於這位著過和平實現了和屠殺——在德國的作者，本已異常仰慕，看到了這部新著，當然即刻買了來。當時我曾費了一星期的餘暇，約略看過一遍，覺得這部新書，確是動人的作品。會想把它譯成中文，然而仔細考慮一下，認為那樣驚人的暴露，恐怕當時的我國政府，未必准許發行；加以那時我正忙着整理『詩話』的工作，本也無暇及此，於是擱了下來。然而每當晚餐過後，靜靜地聽着無線電裏放送出來的悠揚樂曲，默默地呷着茶抽着煙的時候，我仍然把地下火重讀着，將一種恬淡的情趣，引到遙遠的德國的紛擾和暴橫中去了。

「八一三」的砲火，把我從故鄉趕了出來。攜妻挈子，實在有點惶惶然；倉卒西行，只帶出了一點（真是一點）箱籠雜物，而我個人認為最可珍貴的五大書櫥的書，無論如何無法攜帶它。在我，一切東西都甘心拋撇，這些藏書是決不願意犧牲的。然而眼看着成天有飛機在頭頂上盤旋，要把那麼多那麼笨的書籍裝運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甚至可能的事；而且即使裝運出來，也到甚麼地方去儲藏呢？这一次的抗戰，是全面的，这一次的戰術，是立體的，那麼

不論何處，都有被攻襲，至少也有被轟炸的可能，想想實在沒有一個可以儲藏這些書籍的所在，於是一任自然，可笑得很的把一切都委之於從前決不相信的命運了。當我匆匆地與書室離別的時候，居然還隨手帶出了幾部預備在避亂中閱讀的書，英文的只有兩本：一本是挪威哈姆生（Knut Hamsun）的土地之成長，一本就是德國列普曼（Heinz Liepmann）的地下火。這兩本書卻一路做了我避亂生活中的患難知己。

於是繙譯地下火的企圖又復滋長起來。當時全國雖已統一，這類譯本的出版，應該不致再會發生什麼問題，然而天下紛紛，還有什麼出版家願意繼續他們的出版事業呢？但是我當時實在閒得發慌，也不顧譯本的有否去路，竟開始繙譯起來。記得那時候我正避居桐廬，除了早晚須到江邊或者山麓閒步一回外，成天閒在家裏，也就成天躲在小樓上閉戶獨坐，而壁譯書。可是沒有譯完一章，戰事消息不好，桐廬已難久居，便繞道淳安，再轉龍游，搭浙贛車離浙。途中或舟或車，總以重讀地下火為遣。兩岸山光水色，竹韻松濤，間或還有一陣陣隱約的砲聲，愈顯得自己的懦弱無能，而書中人物的英勇可佩了。

在南昌耽擱了一個星期，便循公路西往長沙。粟六遷徙，本已沒有繼續繙譯的興趣和勇

氣豈知卜居長沙以後，情形竟有些出乎意表的寧靜；不但寧靜，而且舊友雲集，新知頻交，簡直大有溫暖之感。於是偶然與朋友們談起，他們竟一致鼓勵，慫恿我繼續繙譯下去。然而當時正忙着爲報章雜誌寫文章，實在也無多餘晷，所以工作的成果殊微。及至移居湘鄉，始在江邊的村屋中續成了一點。可是正擬定下心來，埋頭苦幹，卻接到廣西來電，又催我去桂林任事了。

初到廣西，不免要略事安排，所以又把譯事懸擱起來。幸而廣西省政府對於我們的待遇，特別優渥，所以無多時日，早已安定地生活下來了。在這裏，我應該特別感謝邱昌渭和張劍芝兩先生，因爲他們的寵招，我們纔有機會生活到那樣秀麗的良豐西林公園去；而在那裏，我們竟得到了連自己都不敢置信的豐富的收穫。我所擔任的工作，非常省易，因而空暇的時間很多；於是我除了爲幾個雜誌寫一些零星文章外，幾乎把全部的餘暇化費在繙譯的工作上。我從工作中得到了無與倫比的興趣！所以不到四個星期，我竟完全脫稿了。當我努力繙譯的時候，簡直連我自己也覺得很驚異的。只要有空，我就伏案疾書；尤其在深更半夜，獨坐在一盞煤油燈旁，看着黃暈的火光，把我的碩影落在薄薄的板壁上，聽着孩子們的鼾息，在靜寂的夜空中迴蕩升沈；間或有一陣山風，穿過叢篁密樹，發出鬼嘯似的吼聲；一脈溪水，淌過亂石澗流，奏

成樂曲似的清響；或者有一陣蛙鼓，幾響促織的鳴聲，往往使我毛戴。然而無限的興趣和勇氣驅去了我怯然的心理，終於工作到一兩時左右纔睡覺。當我滅燈就寢，總覺得餘味盎然，甚至尚有餘勇可賈呢！

大概地下火的精采的內容，也有使我「樂此不疲」的魔力。我對於法西斯蒂魔手們毒辣的陰謀和瘋狂的屠殺，每覺髮指眦裂，憤慨異常；而對於共產黨人以及其他反法西斯蒂的同志們英勇地奮鬥，艱苦地抗爭，卻又覺得無限的欽敬。他們的祕密工作，地下印刷，交通控制，以及在間諜與反間諜的錯綜的密網下，不避鋒鏑地集議，起事和鬥爭，在在皆使我感動得流淚。好幾次我會擱起了筆，矚視着懂懂的燈光，呆坐着，冥想着，大半天浸沈在那樣的遐思中，直到熱淚濕透我雙眼，黃暈的燈光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纔抖擻着驚醒過來。爲什麼呢，那些寧願把家庭甚至把生命都犧牲的人爲什麼呢，那些寧願給逮捕給屠殺的志士？耳朵裏雖然聽不到前線的槍砲聲，然而我知道在這個時候，正有成萬的同胞，在我們廣漠的國土上，犧牲了家庭，甚至犧牲了生命，也在英勇地奮鬥，艱苦地抗爭。而且同樣正在打擊着一個法西斯蒂的魔手。而我，卻怯懦地躲在山明水秀的公園中，幾乎是度着隱士似的生活。跟他們比較起來，

真是太怯懦，太渺小了。於是我感到慚惡，感到惶悚，於是我重復埋頭疾書，希望我自己在這一方面稍稍有一些成就。然而此刻看着這一部業已脫稿甚至業已排竣的書，又懷疑我自己到底有沒有盡了那份責任了。

謝謝許多鼓勵我的朋友；因為他們的鼓勵，我纔有譯完的勇氣。對於讀者，我應該要求他們的寬恕和教正，假如在譯文中，難免有什麼不妥甚至錯誤的地方。